

# 人文学刊

2025年  
第二期第1卷

月刊

人文学刊

## 声 明

本刊仅作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坚决反对抄袭、伪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可靠性由作者全权负责。

本刊为开放获取期刊。所有发表内容均采用CC BY-NC 4.0协议许可。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和非商业性分享,但使用时必须明确注明作者和出处,且不得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出版单位:拾华出版有限公司  
总 编 辑:王海波  
总 顾 问:胡 斌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2C号凯悦  
商业大厦6楼602室  
E - MAIL: rwxk@shiharr.com  
联系 电 话: +852-9749-5505  
投稿 平 台: <https://ojs.shiharr.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pISSN 3104-5014  
eISSN 3104-5022  
发行范围: 全球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5年7月25日  
发行定价: 免费赠阅  
版权许可: 



更多科研资讯可关注官方公众号

2025年第二期第1卷



9 773104 501001

## **编辑部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顾问:** 胡 斌

### **【历史与哲学编辑部】**

**主 编:** 宋朝红

**副 主 编:** 曹 栋 孙苡森 崔梦泽 李伟强

**编 辑:** 曾 浩 王伟康 吴栩薇 刘宇航 许嘉杰 熊晨曦

**青年编辑:** 田宇洋 赵文雯 范记川 王芳芳 解 娇

**出版顾问:** 范宇飞

### **【法学编辑部】**

**主 编:** 刘 珮

**副 主 编:** 陆 瑶 唐旭晨 唐丽云 苏咏喜

**编 辑:** 王 正 曾 霄 裴 耘 石 鑫 汪 淇 李明旭 谷成影

**青年编辑:** 张红军 姬红杰 江 涛 张 力 田笑潇 殷 玥 左芸菲 任志鹏

**出版顾问:** 马子研 胡奕帆

### **【教育与体育编辑部】**

**主 编:** 何小兰

**副 主 编:** 龚雅哲

**编 辑:** 周鸿璋 鹿艺馨 苏文杰 刘洪铭 聂 慧 白天昊 吕文欢

**青年编辑:** 洪 阳 徐文佳 袁 骁 蒋心毅 王日娴

**出版顾问:** 曾维民 刁培鑫

### **【艺术学编辑部】**

**主 编:** 莫 岚

**副 主 编:** 王嫄媛 周白云 郝 爽 刘 飞 刘梦雨 郭胡合璧

**编 辑:** 黄 杨 刘 颖 宋彦霖 赵 洋 贾效田 刘济君 赵沃林 王镜皓 王俊翰

张 鹏 金黛彤 李一帆 何 蕴 张靖博 袁 浩 冯志超

**青年编辑:** 谢 民 成 玥 杨喜超 祝鹏飞

**出版顾问:** 胡 斌

### **【文学与新传编辑部】**

**主 编:** 侯本塔

**副 主 编:** 冯浩源 韩文涛 戚 吴 李国平

**编 辑:** 胡 港 井兴龙 包云龙 任韵灵 蒋瑀宸 王昊祥 孙玉豪 李 芮 佟 彤  
吕淑娟 田诗昂

**青年编辑:** 金宇恒 黄 芊 吴宗译

**出版顾问:** 李显坤 吴元超 颜俊志

**出版策划:** 莫 岚 桂 军

**营销策划:** 谭瑞将 孔维旭 孙玉豪 颜俊志

**技术编辑:** 范哲文 刘霜尧

**装帧设计:** 金黛彤

# 目 录

## 历史与哲学

- 01 宗号奴隶船事件与18世纪末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张秋月  
06 论庄子对邵雍理学思想的影响 曹栋、杨琳桦、周娇娇

## 法学

- 10 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三维赋能框架与实现路径 侯培森、郭骏  
16 协同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研究 郑志凤  
20 复仇、女性与民国司法：三部戏剧中的法律叙事研究 吕东睿

## 教育与体育

- 27 养性成德：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中的道德教育价值与实现途径 徐子淇  
32 基于情景模式教学在法医物证学实验课中的应用 张晓嘉、卢双、李树霖、包乌人吐亚、吴海荣、索利娅  
37 新文科背景下设计思维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中的应用 要彬、杨耀武

## 艺术学

- 43 AI技术驱动的环境艺术设计"岗课赛证"融合模式研究 王姗  
47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彭林、沈欣雅、张倩  
53 复现实践之补证：孙颖的断代史建构取向——从《中国汉代舞蹈概论》视角 王宇轩、马丽  
59 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交互设计策略：理论、实践与评估 张倩、黎文珍、伍荧荧

## 文学与新传

- 65 乐器译介与唐代音乐文化的异域体认——以20世纪初期唐诗英译选本《琵琶》《松花笺》为例 杨嘉雯

- 73 菲利普·罗斯《愤怒》中的欲望身体及其情境化 李思宇
- 80 《为奴十二年》中的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 向君如、杨月妮、吴群涛
- 86 网络热词“包的”的语义演变及流行成因 张小晗
- 92 从纸媒到智媒：时尚杂志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探析——以《时尚芭莎》为例 毕博、李英洁
- 98 数字媒体时代地域的“消失”与“回归”——从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谈起 邓梦圆

# 宗号奴隶船事件与 18 世纪末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张秋月<sup>1\*</sup>

(<sup>1</sup>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宗号奴隶船事件是一场因淡水短缺迫使船员杀害并丢弃黑奴事件。在 18 世纪末英帝国危机的语境下，这场抛弃黑奴事件为废奴主义者所利用，他们试图在法庭上将宗案从商业保险案转变为谋杀案。伴随废奴主义者在法庭上努力的失败，他们转而诉诸公共舆论，向社会各界诉说宗案的谋杀性质，以促成公众对奴隶制的观念的转变。宗号奴隶船事件经废奴主义者反复诉说，成为 18 世纪末英国废奴运动兴起的催化剂。

**关键词：**宗号奴隶船事件；英国；废奴运动；帝国危机；奴隶贸易

## The Zong Massacre and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Zhang Qiuyue<sup>1\*</sup>

(<sup>1</sup>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Zong massacre was a incident in which the crew, compelled by a shortage of fresh water, murdered and jettisoned numerous enslaved Africans.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imperial crisis, this otherwise routine practice of discarding human cargo was seized upon by abolitionists. They attempted to reframe the Zong case in court, transforming it from a commercial insurance dispute into a trial for mass murder.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ir legal efforts, abolitionists pivoted to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Zong as a massacre to the wider public to foster a fundamental shift in popular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slavery. Through its constant retelling by abolitionists, the Zong incident thus became a crucial catalyst for the burgeoning British abolitionist movement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The Zong massacre; Great Britain; Abolitionist Movement; Imperial Crisis; Slave Trade

### 1. 引言

宗号奴隶船事件<sup>(1)</sup>是一场因船长失误、淡水短缺导致船员将大批黑奴抛入海中的事件。在 18 世纪末的英帝国危机下，宗号船事件成为英国废奴运动的引爆点，并在废奴主义者的宣传下被赋予了“大屠杀”的意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英国废奴主义兴起的研究，要么强调精英人物在废奴运动中的作用<sup>(2)</sup>；要么强调长时段、结构性因素，鲜少关注具体事件在影响与改变废奴情绪中的关键作用。英国废奴史学家詹姆斯·沃尔文虽用相当笔墨探讨了宗号奴隶船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未将其置于 18 世纪末帝国危机语境下进行考察<sup>[1]</sup>。本文将宗号奴隶船事件置于 18 世纪末帝国危机激化的反奴隶制情绪的语境之下，探讨这场与奴隶贸易紧

密相关的海事保险诉讼如何演变为一场人权诉讼，以及诉讼结果如何推动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 2. 18世纪末帝国危机与英国反奴隶制情绪的激化

18世纪是英国奴隶贸易的繁荣期。光荣革命后，议会取消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贸易垄断权，英国奴隶贸易年运输总额迅速攀升。1720—1790年间，英国年均贩奴数额从每年12000-14000人增加到每年近42000人。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英国奴隶贸易主要市场<sup>[2]</sup>。

英国奴隶贸易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活动，而且深深嵌入英国经济结构之中。18世纪中叶前，鉴于英伦三岛受益广泛、远离奴隶殖民地以及种族歧视等原因，英国绝大多数人对奴隶制废存问题持冷漠态度，社会仅存在零星的“异见”。例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认为奴隶劳动是低效且不正义的。贵格会内部也较早产生了反奴隶制声音，将奴隶贸易定义为“罪恶”，并严格约束宗派内部纪律约束。但在美国革命前夕，这些零散的道德不安并未转化为持续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sup>[3]</sup>。

18世纪末英帝国危机打破了大西洋两岸废奴情绪相对沉寂的状态。七年战争后，英国议会为减轻财政负担，要求北美殖民地承担帝国防务责任，颁布了一系列新税法，直接引发北美殖民地抵抗运动的兴起。在该时期英美小册子论战中，殖民地“爱国者”借用奴隶制政治隐喻，逐渐将“印花税”“汤森税”等法律视为英国议会欲把殖民地人民变为奴隶的阴谋<sup>[4]</sup>。

然而，英国官方宣传家迅速发觉奴隶制政治隐喻的矛盾之处。他们从殖民地真实存在的奴隶制出发，将殖民地引发的奴隶制政治隐喻论战转变为对现实存在的奴隶制的批判。塞缪尔·约翰逊犀利地评论道，美国人高喊自由却奴役他人，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虚伪。约翰·卫斯理坚称种植园奴隶制是人类堕落的标准，并认为美国人抱怨被议会“奴役”的说法，与奴隶制的不公相比不值一提<sup>[5]</sup>。

面对英国官方对殖民地真实奴隶制的猛烈攻击，美国殖民地“爱国者”无法再回避奴隶制这个尴尬的问题。一方面，“爱国者”将奴隶制的责任归咎于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参与的奴隶贸易。本杰明·拉什将非洲贸易公司描述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强盗团伙”，并向其英国朋友解释，结束奴隶贸易是美国对抗“英国暴政怪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北美激进分子开始向殖民地议会请愿，要求逐步废除奴隶制，掀起了北美第一波废奴浪潮<sup>[6]</sup>。

这场由殖民地发起的，以奴隶制政治隐喻反抗英国暴政的论战，不仅在殖民地引发了“谁对真实的奴隶制负有责任”，以及“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废奴”等问题的广泛反思，而且在英国也激起同样的反思。“这种臭名昭著的贸易起源于哪里？”苏格兰牧师约翰·厄斯金问道，“它在哪里仍然以贪婪所能激发的热情继续进行？除了在英格兰，还能在哪里？”格兰维尔·夏普认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胁迫，加之英国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奴隶制，给英国带来“不可磨灭的耻辱”<sup>[7]</sup>。

对奴隶制罪责问题的反思促使英帝国内部激进主义者走上了废奴道路。美国革命后，英国废奴主义者开始谴责与寻求废除整个奴隶制度。第一代英国废奴主义者的主要实践是“司法废奴”，即将典型司法案件上升为废除英国奴隶制的先例。1772年，废奴主义者利用“萨默塞特案”宣布英国国内奴隶制不合法，但尚未触及帝国境内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sup>[8]</sup>。1783年的“宗案”成为废奴主义者寻求废除帝国境内奴隶贸易的绝佳案例。

## 3. 引爆点：“宗案”始末及其司法判决

1781年初，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egson）集团的船只“威廉号”抵达非洲，在开普敦堡海岸进行奴隶贸易。此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的尾声，英国正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交战。一艘名为阿勒特号的英国船只在非洲海岸俘获了几艘荷兰船，其中包括一艘名为佐格号（Zorgue）的荷兰奴隶船。格雷森的合伙人，威廉号船长理查德·汉利代表格雷森集团购买了佐格号，并将其更名为宗号（Zong）。格雷森集团随即购买了宗号船的保险。汉利无意亲自指挥宗号，他任命威廉号的船医卢克·科林伍德担任宗号船船长，并临时拼凑起一支船队。

1781年8月18日，宗号船载着包括船长、船员、乘客罗伯特·斯塔布斯在内的19人，以及442名黑奴，从非洲海岸出发，驶向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段航程”。到1781年11月中旬，宗号船进入加勒比海。此时，由于船长导航误将圣多明各西南部的蒂伯龙角（Cape Tiburon）视为牙买加东南海岸，继续向西行使，导致严重偏离牙买加海岸。

当船员们意识到导航失误后，他们对船上的淡水进行彻底检查，发现船舱底层水严重泄露。面对水资源匮乏的极端局面，船长于11月29日晚8点召集会议，决定为了保全船员和剩余的奴隶，杀害并抛弃部分奴隶。这场有组织的谋杀行动分三批进行，到12月22日抵达牙买加黑河的时候，共杀害了132名黑奴。1782年1月9日，牙买加报纸刊登了出售200名宗号黑奴的广告。

格雷森集团得知宗号船发生的事情后，以“共同海损”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抛弃的奴隶财产，但保险公司不认为此事属于“共同海损”的赔偿范畴，不予赔偿。1783年3月6日，格雷森集团向伦敦市政厅起诉保险公司，此案是著名的“宗案”<sup>[9]</sup>。

1783年3月6日，市政厅举行了一场陪审团庭审。庭审中，船东代表基于“共同海损”理由，即“在航行途中遭遇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将部分奴隶抛入海中是为了保全船只、船员和剩余有价值的奴隶，应由保险承保”，认为保险公司必须赔偿被抛下船只的奴隶价值。大陪审团接受了这一论断，做出有利于船东的判决。保险公司不服判决，理由是：其一，航海日志被故意丢弃，有骗保的嫌疑；其二，唯一证人斯塔布斯的记述存在矛盾之处，如“雨天后仍旧丢下了一波人”，说明不存在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保险公司于是向王座法庭上诉<sup>[10]</sup>。

对大陪审团判决不满的不仅仅是保险公司，废奴主义者试图利用该事件，将其转变为一场人权诉讼。1783年3月19日，黑人废奴主义者奥劳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将宗号船的消息告知当时最活跃的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夏普旋即欲用“谋杀罪”起诉格雷森集团，并积极担任保险公司律师的法律顾问<sup>[11]</sup>。

1783年5月，在正式开庭前，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主持召开听证会，格雷森集团的律师约翰·李得知保险公司和夏普欲以谋杀罪提起诉讼，于是，他竭力否认将奴隶丢弃的行为是谋杀。他断言“英国法律确实将我们的黑人同胞视为财产”。既然奴隶是财产，那么在缺水的情况下为保全剩余船员和奴隶的性命，杀害一部分奴隶是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被丢弃的奴隶构成了“共同海损”，保险公司必须对其进行赔偿。

然而，保险公司的律师团队并不认可约翰·李的这套说辞。首先，根据现有的商法，强调基于奴隶的赔偿只能是因奴隶起义和镇压起义造成的损失，以“海上风险”的保险原则进行赔偿。奴隶是人不是货物，无法以“共同海损”进行赔偿；其次，缺水是因为是由于船长导航失误与管理不善，是一种人为错误，并非不可避免的风险；再者，保险公司律师认为，宗船罹患之事的有力证据——“航海日志”并非离奇遗失，而是被故意损毁。且根据第一次庭审斯塔布斯的证词，“雨天后仍有一批黑人被丢下船只”，他们推断屠杀奴隶根本不是因为缺水，更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疾病等）导致奴隶价值贬损，故意丢弃一些失去市场价值的奴隶，以骗取保险<sup>[12]</sup>。

接着，他们遵循夏普顾问的建议，强调宗案并非仅为骗保案，更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在讨论供水问题时，皮戈特律师断言：“只要还有水可以分配，这些船员（非洲人）就有权分得一份，就像船长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他认为，“无论肤色与种族如何，人类的生命是等价的”。海伍德律师以“全人类事业”之名为黑奴发声，认为恣意抛弃132条生命的行为令世人愕然。皮戈特律师总结道：“如果赔偿成立，那将是针对那些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欺诈与压迫行为”<sup>[13]</sup>。

主持听证会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始终坚持由他作出的法律声明不应损害英国的商业繁荣。因此，他将此案严格限制在商法之中，避免定性为谋杀案。他认为奴隶在商法中就是财产。但同时指出此案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奴隶是否是财产”的问题，而是“由船长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他评论道：“我被告知，如果他们自然死亡，则不予赔偿；但如果他们在袭击中被杀，被保险人将获得与货物损失相同的赔偿。”宗案最终确立了一个司法原则：因船长失误造成的损失无法索赔<sup>[14]</sup>。

## 4. 大屠杀叙事的散播与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虽然夏普和保险公司律师在法庭上将宗案定性为谋杀案的努力失败了，但废奴主义者绝不允许此案在公共视野中销声匿迹，竭力让公众了解宗号船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影响公共舆论。格兰维尔·夏普成为宣传宗号大屠杀的急先锋。首先，他将庭审记录详细整理出来，借助报刊等媒体扩大宣传范围。其次，他将庭审记录副本邮寄给主要政要，以期影响当局对奴隶贸易的态度。他提醒海军部，宗号大屠杀是“极端邪恶的”，任何为杀人行为辩护的理由都是“可恶的教条”，要求他们调查这起大屠杀；并敦促首相波特兰考虑“废除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sup>[15]</sup>。最后，夏普将目光转向英国教会，向其宗教界同仁控诉宗号船发生的不人道行为。切斯特主教贝利比·波特厄斯受夏普启发，将美国独立战争视为上帝对英国不义行为的惩罚，并将奴隶制视为核心原因。因在上议院发表自由言论而闻名的彼得伯勒主教约翰·欣奇利夫评论道：“这是我读过的最不人道的暴行之一……如果宗教和人性得到关注，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交易将会中止”<sup>[16]</sup>。

受夏普等人对宗号大屠杀叙事散播的影响，一些曾与奴隶贸易利益攸关之人听闻此事后也颇为愤慨。曾在利物浦的奴隶船上工作的约翰·牛顿评论道：“一想到宗号事件就感到不寒而栗……我们听说并读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一百多名成年奴隶在船上因淡水短缺而被抛入海中”；曾为利物浦奴隶贸易商的办公室职员的乔治·格里高利也震惊于“这起骇人听闻的行为竟未受到惩罚”。他随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对于那些认为缺水是屠杀行为正当理由的人，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如果那些受害者是白人而非奴隶，他们会被扔下船吗？”<sup>[17]</sup>牛顿与格里高利的态度表明，即便曾近距离接触过奴隶制之人，也为宗号大屠杀的残忍程度深感不安。

大屠杀叙事的散播同样让非裔英国人倍感震惊。例如，黑人废奴主义者埃奎亚诺的朋友奥托巴·库加诺对执行大屠杀的英国人的自私和残暴进行猛烈地鞭挞。他认为，“英国人对奴隶犯下的谋杀罪，伴随着一种令人震惊、奇特且几乎闻所未闻的概念，根据这些行为者的观念，他们要么认为黑人是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无论生死；要么认为夺走一个黑人的生命与夺走一只野兽对生命并无二致”<sup>[18]</sup>。

更重要的是，宗号大屠杀叙事的散播影响到了新一代废奴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为剑桥大学学生的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84年，剑桥大学副校长彼得·佩卡德牧师设立了一项拉丁文论文奖，题为《强迫他人成为奴隶是否合法？》，克拉克森接受了这项挑战。在研究过程中，他被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所震惊。受良心驱使，他决定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废奴事业。他将自己的拉丁文论文翻译成英文，修订并扩展后出版，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废奴运动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经验性、数据化的证据，揭示奴隶贸易的残酷真相<sup>[19]</sup>。

在宗号船事件发生四年后，即1787年，以贵格会成员为主导，包括夏普在内的废奴主义者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收集和传播有关奴隶贸易的信息和证据，以争取公众支持。克拉克森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收集的大量数据和证人证词，通过协会的出版物（小册子、报告、文章）被广泛分发，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奴隶船上真实情况的了解。协会还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运动，成千上万的签名请愿书涌向议会，向政治家施压。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与议会内部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代表的政客的努力相结合，最终促成了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令的出台<sup>[20]</sup>。

### 注释：

(1) 国外史学界大多将该事件描述为“The Zong Massacre”，直译为“宗号船大屠杀”。但笔者认为，“大屠杀”一词实乃废奴主义者以及后人对此事件的定性与宣传，带有废奴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后见之明的道德评判。为客观描述此事件，笔者将该事件中文译为“宗号奴隶船事件”。

(2) 国外研究参见：Reginald Coupland,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3.; Roge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 Macmillan, 1975.;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Betty Fladland, *Men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Antislavery*

Cooper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2.;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国内研究参见：张倩. 威廉·威尔伯福斯与英国废奴运动（1787-1833）<sup>[D]</sup>. 苏州科技大学, 2022.; 金海. 萨默塞特案件与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的发展<sup>[D]</sup>. 安徽史学, 2020, (03):129-139.; 张旭. 英国大众废奴运动（1787—1807）文献述评<sup>[D]</sup>. 英国研究, 2021, (02):55-78.; 田小玉. 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废奴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探究<sup>[D]</sup>.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参考文献：

- [1]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 David Richardson, "The Slave Trade, Sugar, and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48-177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7, no. 4, (Spring, 1987), pp. 739-769.
- [3]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104.
- [4] 伯纳德·贝林.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M], 涂永前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135-147 页.
- [5]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15—119.
- [6]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20-123.
- [7]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55—208.
- [8] 金海. 萨默塞特案件与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的发展[J]. 安徽史学, 2020, (03):129-139.
- [9]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56-101.
- [10] Daniel H. Park, "The Zong Massacre 1781:The Legal and Public Debate Surrounding the Moralit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Vol. 8, no.1, (Jan.,2023) , pp. 11-28.
- [11]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77.
- [12] H. Farber, "Slave Trade Insurance in the Age of Abolition: Archives, Politics, and Legalities.", *Slavery & Abolition*, vol.44, no.2, (Apr.,2023), pp. 350-376.
- [13]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44.
- [14] S. Todd Lowry, "Lord Mansfield and the Law Merchant: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7, no. 4, (Dec., 1973), pp. 605–622.
- [15] Michelle Faubert, *Granville Sharp's Uncovered Letter and the Zong Massacre*, Palgrave Pivot Cham Publisher, 2018, pp. 14-21.
- [16] Michelle Faubert, *Granville Sharp's Uncovered Letter and the Zong Massacre*, Palgrave Pivot Cham Publisher, 2018, pp. 22-58.
- [17]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60-180.
- [18] Prince Hoare, *Memoirs of Granville Sharp*,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Colburn, 1820, p.63.
- [19]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1-205.
- [20] Jeremy Krikler, "A Chain of Murder in the Slave Trade: A Wider Context of the Zong Massac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57, no. 3, (Dec., 2012), pp. 393–415.

# 论庄子对邵雍理学思想的影响

曹栋<sup>1\*</sup>, 杨琳桦<sup>1</sup>, 周娇娇<sup>1</sup>

(<sup>1</sup>咸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庄子思想是邵雍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本原论看,邵雍借鉴庄子“环中”概念,将其赋予本原意义,以先天图之“中”为万物万理所生处,视“环中”为太极本体的存在形态。在认识论上,邵雍继承庄子“以道观物”的思维,将观物等级划分为目观、心观、理观,提出“以物观物”的认知方式,强调摆脱主观因素以观得万物本性。境界论方面,邵雍吸纳庄子“逍遙”精神,形成独特的“安乐”境界,通过“观物”实现身心安顿与万物和谐。明晰二者思想的具体联系,对准确理解邵雍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庄子; 邵雍; 环中; 观物; 安乐

## On Zhuangzi's Influence on Shao Yong's Neo-Confucian Thought

Cao Dong<sup>1\*</sup>, Yang Linhua<sup>1</sup>, Zhou Jiaojiao<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Marxism,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Zhuangzi's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Shao Yong's neo-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ontology, Shao Yong borrowed Zhuangzi's concept of "huanzhong", endowed it with the meaning of origin, regarded the "center" in the innate diagram as the birthplace of all things and principles, and viewed "huanzhong" as the existence form of the Taiji ontology. In epistemology, Shao Yong inherited Zhuangzi's thinking of "viewing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o", divided the levels of viewing things into viewing with the eyes, the heart, and the principle, put forward the cognitive method of "viewing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and emphasized getting rid of subjective factors to perceive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In terms of realm theory, Shao Yong absorbed Zhuangzi's spirit of "xiaoyao", formed a unique realm of "anle", and realized physical and mental settlement and harmony with all things through "viewing things".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ough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Shao Yong's neo-Confucian thought.

**Keywords:** Zhuangzi; Shao Yong; huanzhong; viewing things; anle

## 1. 引言

儒学自先秦产生,历经汉唐,遭佛老冲击而学绝道丧。北宋中前期,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一批儒家学者虽视佛老为“异端”,但又积极吸收佛道思维精华,将之与传统儒学结合,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社会伦理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并力求解决道德修养的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理学。邵雍虽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但

因其褒扬老庄且思想存在明显的道教渊源，而与其他理学家的儒者气象不同，故被部分学者视为道家学者，谓其为一“山人隐士”之流。当然，也有朱熹、方东美、唐君毅等诸多学者

肯定其理学身份。目前，学界对邵雍思想的道家渊源已有不少研究，但偏向宏观概括，而对庄子与邵雍理学思想的具体联系探索不足。本文聚焦庄子对邵雍思想的影响，从本原论、认识论及境界论等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明晰邵雍思想的庄学渊源，这对我们合理、准确地理解邵雍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2. “环中”与“中”

“环中”一词源于《庄子》：“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郭象注曰：“枢，要也。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以应夫无方也。”“夫是非反覆相寻无穷，故谓之环。”成玄英疏曰：“环者，假有二窍；中者，其空一道。环中空矣，以明无是无非”<sup>[1]</sup>。这就是说，真正的“道”是对相对的超越，无是非、无善恶、无有无，这就是“枢”。若得此“道枢”，便能得其“环中”。“环中”即圆圈中心，把握这个中心，就能向每个方向活动而应对所有妨碍。庄子的“环中”特色有三：一是此“环”是虚拟的“环”，无始终，无对待。二是此“中”是“道枢”，是“道”的存在方位而非“道体”。三是看待问题应立足于“环中”，才能超越对待，以应无穷<sup>[2]</sup>。

邵雍吸收了庄子的“环中”论并赋予其本原意义。邵雍言：“先天图者，环中也”<sup>[3]</sup>。“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无穷”<sup>[3]</sup>。其先天易学与传统易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依从文王经文与卦序以讲易理，而是依从诸多易图与数的推演。其创的先天图包括八卦、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卦气图、天根月窟图等。邵雍视“中”是诸《图》之所起处，亦是万物万理所生处，“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sup>[3]</sup>”“《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sup>[3]</sup>。先天图之“中”即圆图之中心○，它本身就是完全、正确、圆满，“代表整个宇宙全体为一圆圈”。先天圆图“循环而无穷”，无非一个“反”字，由万物皆生于“反”而言，则“反”之义同于中。“反”又为“逆”，万物之以“反”“逆”为用，故永远周流而不息，此先天图之所以为“环中”，邵雍用之于先天图，十分妥切<sup>[4]</sup>。另外，明儒王植称：“邵雍言太极，多就环中言之。”也就是说，“环中”意味着邵雍思想的本体概念“太极”存在处，天地万物如实、圆满地反映世界本真，合理且有效，完全契合太极本体的标准和要求。一切不合太极本体的观念，诸如人为的、主观的、人而不天的或天而不人的，片面的而非全面的，专业的而非通达的，一时的而非历史的，都是它所要摒弃的。人们要尽力“了解、把握、体验宇宙全体，才可以安排吾人的生命于其中，贯穿起宇宙生命全体的力量”<sup>[5]</sup>，亦即“邵雍神悟秒契到的道体”<sup>[6]</sup>。可见，邵雍的“环中”包含了自然与人事，并将之归于太极，是从本原意义上对庄子“环中”论进行的吸收与创造。

## 3. “道观”与“物观”

“观物”即对天地万物的观照与觉解，邵雍的“以物观物”是对庄子“以道观物”的继承与改造。《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道观之，何贵何贱？”庄子强调“道”本身并无贵贱差等，具有至上性与遍在性，且“无乎逃物”，所以从道的角度自上而下俯察万物，万物皆由道而生、由道而成，则无贵贱差等。但若从物的角度自我而他的观察万物，则万物皆有其存在理由与其特殊功能，可观得万物的差异性，“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万物“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即物之贵贱取决于人世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具有相对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至于其后所说的“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皆是人在不同侧面对物的相对性判断，可归于“以俗观之”之内。庄子还强调：“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境也。”庄子的“观物”特色在于：观物自下而上存在“俗观——物观——道观”三个不同等级；观物者之心应虚如明镜，惟圣人可观；应摆脱相对性的“有我”观物，坚持客

观性的“无我”观物，“有我”观得万物的差异性，“无我”观得万物的统一性。

“观物”是邵雍理学思想的核心，其《皇极经世》之篇名皆为《观物》，且其诗集多以“观物”或“观XX”为题，庄子的观物思想深刻影响了邵雍。邵雍言：“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sup>[3]</sup>其一，邵雍借鉴庄子对观物层次的划分，将观物等级划为三层：目观——心观——理观。“目观”仅能观得物之形，包括由感觉器官感知的物之色、声、气、味等。“心观”仅能观得物之情，包括不同物对人之心境的影响及人之喜怒哀乐对所观万物的情绪。而“理观”则是顺应事物的本性，返回事物本身，观得万物的本来面目，即“见物之性”。邵雍认为，目观与心观是感官与心灵对万物之性的遮蔽，观物若不去除主观因素，被情绪与感官左右，则不能实现对万物的真实认识。这就是庄子所强调的应摆脱相对性的“我”，而坚持客观性的观。其二，邵雍吸收庄子所强调的观物者需心如明镜。邵雍言：“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sup>[3]</sup>这里的“反观”即“以物观物”，也就是“以理观物”。“以物观物”的前一“物”为“物之理”，后一“物”为“物本身”。由于圣人之心如明镜，无丝毫杂念、私心等主观意识，且万物之理备于圣人一身，故其只须“反观”便能见“物之性”。侯外庐先生直接称邵雍的这种“无我”以“观物”，实际上“是窃取庄子的直观主义”<sup>[7]</sup>。

当然，庄子与邵雍的“观物”也存在很大差异，所异者有二：一是“横观”与“纵观”的区别：即邵雍强调万同一层级万物之间的观，以“一物观一物”或以“一物观万物”，观者至于万物之间而观。而庄子强调观者在万物之上，与道同体，以道的视角自上而下地观察万物，此二者不同之一；二是“见性”与“齐一”的区别。邵雍说：“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sup>[3]</sup>。又说：“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sup>[3]</sup>。邵雍对庄子称赞有加，但亦不能认同其齐物之论，庄子以道的视角自上而下的观物，观得万物齐一，即庄子执着于讲物之“齐”，但物终是不齐的，强为之齐便偏执与计较，以至于难以真正达到“和”的状态。而邵雍的观物目的乃见物之性，明万物之差异，将自身置于万物之中而“以物喜物，以物悲物”<sup>[3]</sup>，以至于“发而皆中节”，达到和于万物的境界。

#### 4. “逍遙”与“安乐”

庄子的逍遙气象是其显著特色，“逍遙”建立在“齐物”思想基础之上，强调如何获得“自由”。他将必须依赖一定条件而存在的事物叫作“有待”，而将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称之为“无待”，即超然物外，无所不适的逍遙。在他看来，能够把名誉、功业和肉体尽皆抛弃的人，才能无思无虑、无知无识，与万物浑然一体，得到最完满的自由和幸福。邵雍对庄子的知理、尽物、逍遙也十分称赞。他说：“庄子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踌躇四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皆然”<sup>[3]</sup>。由于庄子能尽万物之性，能知万物之理，故能不被名利外物所困，而将一身置于天地之间，游乐于世。这种逍遙之乐被邵雍吸收，并成为其独特气象。所以，钱穆称：“康节思想偏进道家，其实更近庄周”<sup>[8]</sup>，并认为邵雍就是“儒门内的庄子”。余敦康也说：“邵雍仰慕庄周的旷达”<sup>[9]</sup>。邵雍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庄子的欣赏，“天气冷涵秋，川长鱼正游。虽知能避网，犹恐误吞钩。已绝登门望，曾无点额忧。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sup>[10]</sup>。而庄子也正是在险象环生的人世间中为全生保身，自觉地以一种超世的精神走上了游世的道路。这也影响了邵雍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

邵雍的“安乐”境界虽有庄子的“逍遙”渊源，但二者又具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现世的态度与工夫路径不同：庄子认为，个体在充满困难挫折的人世间无法实现生命的安顿与逍遙，故只能通过“心斋”“坐忘”等工夫获得逍遙。可以说，庄子的逍遙是对现实是不满与忘却，寄以实现以己之精神的自由。如刘笑敢先生所言，庄子体现的是一种“无心无情的生活态度，以无心无情的态度安然顺命，在无心无情的基础上追求逍遙”<sup>[11]</sup>。然而，邵雍却与之不同，他强调通过“观物”的方式达到对万物本然面目的认识，进而实现对自身生命的观照与安顿，实现自己身心的双重满足，即逍遙安乐之境。邵雍言：“予自壮岁业于儒

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sup>[10]</sup>。邵雍对世间之乐予以区分，界定为三类：其一为“人世之乐”，此乐系世人在利欲层面得以满足所生之乐，侧重于感官与物质维度的享受。其二为“名教之乐”，它源于德性修养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更着重体现为在道德与名教规范框架内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其三为“观物之乐”，此乐源于天人合一于内心、万物皆备于自身所引发的超越性情感体验，专注于体道及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他还说：“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心中，则何异于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sup>[10]</sup>。这种“观物之乐”涵义甚广，“举凡赏景、吟诗、饮酒、感悟的快乐，都属于观物之乐的范围”<sup>[12]</sup>，它是自我身心和谐之乐，是人与己和谐之乐，是人与物和谐之乐，是一种“独乐”与“众乐”的和谐，乐在己、乐在人，“乐与万物同其荣”。为达到此乐境，则需通过“复静”的修养工夫与“明诚”的致知工夫两端并进而实现<sup>[13]</sup>。

钱穆先生说：“庄子是脱了人的地位来观万物，康节则是提高了人的地位来观万物，庄周是消极的，康节是积极的。……庄周要把人消融在天地万物中，康节则要把天地万物消融在人之中。所以成其为儒”<sup>[8]</sup>。二者观物方式的差异源于二人不同的人生态度，由此导致他们人格气象与境界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邵雍的这种安乐境界是对庄子逍遥的吸收与改造。

## 5. 结语

综上，庄子思想对邵雍理学的影响贯穿本原论、认识论与境界论：“环中”为邵雍“先天图”提供了超越对待的思维原型，使其“中”成为统摄万物的太极本体；“以道观物”启发邵雍构建“目观—心观—理观”的认知层级，形成“以物观物”的理性认识论；“逍遥”精神则转化为邵雍“安乐”境界的底色，使其在儒学名教框架内实现了对世俗与超越之乐的融合。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移植，而是邵雍以儒学为基对庄学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庄学的超越性品格，又赋予其伦理实践的现实维度。进一步探究邵雍融合庄学与儒学的具体机制，或可深化对理学多元思想渊源及内在张力的理解，为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

### 参考文献：

- [1]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 魏崇周.庄子“环中”论对后世文论及哲学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12,20(02):95-97.
- [3] 邵雍.皇极经世[M]//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方东美.原始儒家与道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宋锡同.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8] 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9]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10] 邵雍.伊川击壤集[M]//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1]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2] 李震.邵雍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23.
- [13] 曹栋.复静与明诚：邵雍先天工夫的两种进路[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5,47(03):120-128.

# 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 三维赋能框架与实现路径

侯培森<sup>1\*</sup>, 郭骏<sup>1</sup>

(<sup>1</sup>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514)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深化与三全育人理念落地，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力量，其职业能力直接影响育人成效。社会工作理念与辅导员育人目标高度契合，其个案、小组、社区等方法能显著提升辅导员的沟通共情、危机干预及资源整合能力。当前实践中存在专业壁垒、制度掣肘以及文化冲突等困境。基于此，本文构建三维赋能框架：在理论层面，强调社会工作与辅导员工作的理念耦合；在方法层面，聚焦个案、小组、社区方法的场景化应用；在能力层面，指向沟通共情、危机干预与资源整合、团队协作与系统思维的协同提升。通过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优化管理机制与文化协同、重塑专业育人文化等路径，可加速辅导员工作专业化转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关键词：**社会工作；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三维赋能；实践路径

## Enhancement of Colleg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Framework and Realization Paths

Hou Peisen<sup>1\*</sup>, Guo Ju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5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oncept of three-pronged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as the frontline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concept of social work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goal of counselors' education, and its casework, group, community and other metho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unselors'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empathy,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current practice, there are professional barrier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uilds a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framework: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emphasizes the conceptual coupling of social work and counseling;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focuses on the scenario-based application of casework, group, and community-based methods; and at the competence level, it points to the synergistic enhance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empathy,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eamwork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By building a systematic training system,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cultural synergy, and reshaping the professional nurturing culture and other paths, we can accelerate the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nselors' work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 10 -

**作者简介：**侯培森（1996-），男，安徽亳州，硕士，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郭骏（1990-），男，浙江杭州，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通信作者：**侯培森；通信邮箱：2391402575@qq.com

## 1. 引言

在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深化以及“三全育人”理念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辅导员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力量、引领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以及守护学生健康生活的知心伙伴，其职业能力的水平直接影响高校育人质量与学生发展成效。研究表明，大学生普遍存在学业适应障碍、人际关系等多方面成长困惑，并且该群体的心理问题呈现出低龄化与隐蔽化发展趋势<sup>[1]</sup>。当前大学生思想观念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心理需求复杂化的特征日益凸显<sup>[2]</sup>，这就使得传统管理型、说教型的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成长需求<sup>[3]</sup>。与此同时，辅导员工作面临日均行政事务耗时过多挤压思想引领精力，以及缺乏系统性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培训导致育人方法储备不足、育人实效受限等现实困境<sup>[4]</sup>。

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理念，作为融合专业理论、方法与技巧的学科实践领域，在解决个体与群体问题、促进社会融入、青年发展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近年来，学界积极探索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引入高校辅导员工作体系。但研究多聚焦单一理论（如优势视角）或方法（如个案工作），缺乏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整合，难以应对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基于此，本研究在充分吸纳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突破单一理念或方法探讨的局限，构建更具整体性的分析视角，揭示社会工作赋能的内在逻辑与多维面向。探索社会工作对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的赋能路径与实施策略，对于借助专业的理论视角与干预方法，精准识别学生需求、有效化解成长困境，推动辅导员工作模式从经验主导转向专业引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2. 现实困境：社会工作视域下辅导员工作的挑战

### 2.1. 专业壁垒：知识断层与操作失范

高校辅导员队伍中系统接受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比例长期处于低位<sup>[5]</sup>，这种专业教育的结构性缺失导致双重困境：一方面，辅导员对“优势视角”“人在情境中”等理论的认知停留在概念层面，在学业指导中仍沿用“问题矫正”思维。而由于这种专业教育的缺失，使得辅导员对社会工作方法的认知流于表面，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在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等具体工作场景中，缺乏专业理论框架和实务工具的支持，辅导员往往难以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干预策略；另一方面，缺乏“需求评估—介入策划—效果跟进”的实务框架，如在心理疏导中常陷入倾听不足以及建议主观的低效模式。更值得关注的是，职业道德规范认知的模糊性，导致部分辅导员在处理学生隐私等问题时操作失范，这种专业能力的断层本质上反映了教育供给与职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sup>[6]</sup>。

### 2.2. 制度掣肘：管理体系与专业服务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现行行政化管理流程与社会工作“需求导向”逻辑的冲突，在危机干预场景中表现尤为突出。高校现行的行政化管理流程与社会工作“需求导向、动态调整”的服务逻辑存在显著差异<sup>[7]</sup>。这种制度性延误背后是机制失灵：统一管理标准无法适配学生个性化需求以及繁琐审批程序消解了危机干预的时效性；学工、教务、心理中心的“数据孤岛”现象。具体来说，当处理学生心理危机时，学工部门、心理咨询中心和院系之间的配合往往不够顺畅。由于缺乏统一的工作框架，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完整的情况时有发生<sup>[8]</sup>。而这种部门间的沟通障碍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可能给学生带来额外的风险。

### 2.3. 文化冲突：传统管理文化对专业理念的消解

“师道尊严”的文化惯性与社会工作“赋权增能”理念形成深层对立。这种文化基因深

深刻影响着当代辅导员的管理实践，使得部分辅导员在班级管理中难以充分践行社会工作“赋权增能”理念。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班级管理实践中很多辅导员更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制定班规、组织活动还是实施奖惩措施，往往都是辅导员单方面做决定。这种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很明显：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特别是在处理学生矛盾时，很多辅导员习惯直接给出处理意见，而不是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缺乏共情与沟通的处理方式，极易引发学生的抵触与消极对抗情绪。这不仅无法有效化解矛盾，还可能激化师生矛盾，严重削弱高校育人工作的实际成效<sup>[9]</sup>。

### 3. 三维赋能框架——理论基础、方法应用与能力提升

#### 3.1. 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与辅导员工作的理念耦合

社会工作的核心理论与价值理念，为重构高校辅导员的专业认知与实践范式提供了系统性支撑。深入剖析其与辅导员育人目标的内在一致性，是赋能实践的理论起点。

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与“人在情境中”理论，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形成呼应。优势视角的关键在于引导辅导员突破“问题标签”思维。这种思维转型的本质，是育人逻辑从“矫正偏差”到“赋能发展”的范式革新。当辅导员以积极眼光识别学生优势时，不仅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更能重构师生互动的价值基础。“人在情境中”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学生问题本质上是个体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环境要素互动的产物<sup>[10]</sup>。这要求辅导员必须超越单一归因模式，在学业预警、心理干预等场景中，同步分析学生行为、环境以及支持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在处理学业困难时，单纯强调学生努力不足往往收效甚微，而系统评估课程难度、家庭期望、朋辈影响等变量，才能制定出真正精准的干预方案。

社会工作倡导的平等、尊重、赋权价值观，推动辅导员工作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深层转型。这绝非简单的定位调整，而是要求辅导员重构与学生的权力关系<sup>[11]</sup>。例如在班级事务决策中，传统模式下辅导员的“决定权”实质是权威意识的体现，而践行平等理念则需要建立“学生议事会”等参与机制，让学生从决策接受者转变为共创者。当学生获得学习计划制定、资源共享的自主权时，其内在学习动机的激活效果远超外部督促<sup>[9]</sup>。

社会工作的理论与价值观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赋能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理念基石，驱动其工作向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其精髓在于系统性思维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正是当前辅导员能力提升亟需强化的核心维度。

#### 3.2. 方法应用：从实践技术到模式创新

社会工作方法的引入，为辅导员突破传统工作模式、提升干预效能提供了多样化技术支持。而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核心方法，其转化应用的关键在于不是简单的技术挪用与模仿，而是实现方法技术与育人场景的深度融合。

##### 3.2.1. 个案工作的精准干预

个案工作融入辅导员工作的核心并非流程标准化，而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干预方法。成功的个案干预需要辅导员具备“双维洞察能力”——既要通过需求评估挖掘问题的表层症状（如学业成绩下滑），更要穿透表象分析深层成因（如自我认同危机、家庭支持缺位）<sup>[12]</sup>。而事实上，在当前方法应用实践中，辅导员应用个案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将个案工作的接案流程异化为填表作业，却忽视“优势视角”对个案目标的引导。如果单纯的按照社会工作接案流程来进行反而会使引导效果达不到理想情况。因此，通过建立个案思维与辅导员日常工作的链接机制。将个案评估融入日常深度辅导，开发“学生问题”档案，可以帮助辅导员可视化呈现学生问题的“表面症状-深层成因-环境影响”，从而避免干预方案的碎片化。

##### 3.2.2. 小组工作的群体赋能

小组工作方法的独特价值在于利用“群体动力学”，从而实现自助与互助的统一。小组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方法，在大学生主题教育、团队建设以及辅导员职业发展方面具有多方面

的积极作用。这种工作方式的结构化特点和互动性特征，符合高校育人工作的实际需求。

高薇的生涯规划工作坊与张建人的巴林特小组虽目标迥异<sup>[13, 14]</sup>，但均证明：小组效能的核心在于利用同伴影响和群体动力解决共性或发展性问题<sup>[14]</sup>。但需要注意的是，小组工作在高校中的应用存在形式化的风险。如果只是一味强调组员之间的经验分享，这就可能导致互动流于形式。而成功的小组一方面应该区分目标设定，区分“发展性”（如生涯探索）与“治疗性”（如心理支持）的不同逻辑，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创造适度挑战，激发成员的深度参与。

总的来说，小组工作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是促进学生成长的专业手段，也是提升辅导员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其特有的互动性和系统性特征，为构建师生共同发展的教育生态开辟了新的思路。

### 3.2.3. 社区工作的场景营造

社区工作的本质是通过“环境改造”来实现“人的发展”。史渊艺的“宿舍社区自治”与张璐滢的“参与式预算”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要点：当学生从校园环境的“消费者”转变为“共建者”时，其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将得到显著提升<sup>[3, 15]</sup>。而社区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系统视角和资源整合逻辑，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调动多元主体（学生、家庭、社区）参与育人<sup>[15]</sup>。该方法要求辅导员具备宏观视野和跨界协调能力；其最大潜力在于营造支持性环境，为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创造有利条件。而当前社区方法应用的主要障碍是“行政化惯性”——辅导员常将社区自治简化为学生干部代行管理，而这并非真正的赋权。

因此，社区方法是赋能辅导员系统思维与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载体，对构建“三全育人”协同体系具有独特价值。

综上，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一个针对不同层面个体、群体、环境问题的干预谱系。辅导员需根据情境灵活选择或组合应用。其成功转化的核心在于辅导员对方法精髓的理解和内化，而不仅是技术模仿。

## 4. 能力提升：从专业技能到素养提升

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有效融入，最终体现为辅导员核心职业能力的质变。基于实践观察，沟通共情、危机干预与资源整合、团队协作与系统思维三大能力维度，构成了赋能成效的关键因素。

### 4.1. 沟通共情与关系建构

专业的沟通与共情能力，是打破师生心理壁垒、实现深度干预的前提。这种能力的核心并非技巧堆砌，而是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协同转变。在认知上，辅导员从问题解决者转为意义建构者；情感上，培养不评判的包容心态；行为上，通过积极倾听、同理心回应等技巧，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的主体性。这些技术通过将沟通方式从直接批评转变为客观描述和情感理解，能够降低学生因外界评价而产生的抵触情绪。而通常来说，辅导员在沟通中常常“双重错位”：既用管理者思维替代教育者立场，又用成人视角忽视青年心理特征。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建立沟通能力发展阶段：初级阶段，通过情景模拟训练掌握积极倾听、同理心回应等基础技巧；进阶阶段，学习运用隐喻对话等青年适配性表达；高级阶段，形成“沟通即干预”的专业直觉，在日常交流中敏锐捕捉潜在问题信息。沟通共情是社会工作赋能辅导员实现平等伙伴关系（理念耦合）和有效运用个案、小组方法的微观基础。

### 4.2. 危机干预与资源整合

在数字时代浪潮奔涌与社会竞争白热化的叠加影响下，现代大学生正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场域。学业内卷催生的持续性高压、亲密关系中的情感纠葛、家庭经济差异带来的生存焦虑，以及职业赛道选择的迷茫困惑，多重问题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应对复杂学生问题，这不仅要求其具备敏锐的风险识别嗅觉，更需要精准的资源判断眼光，快速定位适配的支持渠道，同时必须拥有强大的协调组织能力，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起覆盖心理、学业、生活等多维度的跨部门支持网络。这一能力的核心要义在于系统干预，而非传统的单点应对。

以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为例，优秀辅导员往往会启动三层递进式干预机制：在即时层面，迅速联动心理咨询中心，确保及时的专业介入；中期依托班级互助小组，提供常态化情感支持；长期则聚焦家校合作，从根源上改善学生成长环境。这种整合式资源的思维突破了问题处理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将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理论深度应用于危机干预实践，把个体问题置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系统中统筹各级资源进行解决。

### 4.3. 团队协作与系统思维

现代高校育人场景的复杂性，决定了辅导员必须具备“跨界协同”的系统视野。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建立学校各部门、校外机构和家庭之间的联动机制，来整合资源和共享信息。特别是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时，这种三方联动机制能够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快速响应通道，大大缩短干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辅导员在协调教务处、后勤部门、心理咨询中心等行政单位与专业服务力量时，需要处理好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他们既要履行管理职责维护校园秩序，又要增强服务意识关注学生需求，避免陷入“重管控、轻服务”的“管理主义”误区，以此构建良性互动的校园治理生态<sup>[16]</sup>。

沟通共情、危机干预与资源整合、团队协作与系统思维构成相互强化的“能力三角”：缺乏共情的协作会沦为机械流程（如家校沟通变成“告状式通知”）；没有系统思维的资源整合会陷入“资源堆砌”（如给经济困难学生同时发放助学金、勤工岗、心理补助，却未考虑时间分配冲突）；而脱离团队支撑的沟通则难以形成长效改变（如个案干预成功但班级氛围未改善，导致问题反复）。

这三维能力的提升路径，恰好回应了现实困境的破解需求：沟通共情能力消解文化冲突中的“权威主义”，危机干预与资源整合能力突破制度掣肘中的“流程僵化”，团队协作与系统思维能力弥补专业壁垒中的“知识断层”。从本质看，社会工作赋能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核心，就是通过这三大维度的协同发展，推动学生工作从“行政管控”向“生态共治”的范式转型——这既是应对当前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三全育人”体系的必由之路。

## 5. 赋能路径优化：三维能力提升路径

### 5.1. 构建系统化专业培训体系，夯实能力提升基础

当前辅导员培训存在理论悬浮于实践技能碎片化等突出问题，亟需建立理论认知、方法实训、实践转化的三阶递进体系，实现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内化的质变。首先，在理论认知层面，着重夯实基础理论知识。在理论认知阶段，核心不在于覆盖所有社会工作理论，而要聚焦“优势视角”“人在情境中”等与学生工作高度适配的核心理论，通过“案例反转”教学深化理解，帮助辅导员直观感受思维转型的实践价值。针对00后大学生的特点，可增设“代际沟通理论”模块，破解“成人视角”与“青年语境”的认知断层<sup>[17]</sup>。其次，在方法实训环节，采用工作坊结合情景模拟的培训方式。培训内容聚焦个案管理、小组动力激发以及社区资源整合等实务技能。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模拟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矛盾纠纷调解等真实工作场景，使辅导员在实践中掌握需求评估、沟通协调以及方案设计等核心技能。最后，依托校内实践基地开展项目化运作。要求辅导员将所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案，应用于具体的学生工作中。通过检验培训成效，来促进专业能力的实际转化与应用。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系统训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体系。理论学习指向方法创新，方法实训服务实践需求，实践转化反哺理论深化，最终实现从“知道”到“做到”再到“做好”的能力跃迁。

### 5.2. 推进管理机制与文化协同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行政化管理与专业化服务的结构性矛盾，需通过流程再造、资源整合以及协同网络的多层次改革破解，核心是建立“学生需求导向”的响应逻辑。

流程再造的关键是“减法”与“加法”并举。精简行政事务并非简单减少工作内容，而是通过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将辅导员从表格填写与数据统计等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增加

个性化指导时间；资源整合的突破口是打破信息孤岛。建立学生成长档案不能仅停留在数据汇总，而要构建学工、教务、后勤的数据交互系统，为辅导员提供立体化的信息支持，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而协同育人网络的核心是权责边界厘清。与家长沟通不能沦为“问题告状”，而要建立“成长信息共享”机制，如定期推送学生的“优势发展报告”而非仅通报问题；联合社区、医院等社会力量时，需明确高校的主导角色与社会机构的协同定位，避免出现责任推诿或过度干预的极端情况。

### 5.3. 重塑专业育人文化范式，促进理念深度融合

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文化是社会工作理念落地的主要障碍，而通过管理模式革新与评价体系重构的双向发力，可实现育人文化的深层转型。一方面，管理模式革新的核心是赋权空间的制度化设计。学生议事会不能仅作为形式化的意见箱，而要赋予其决定权，例如允许学生自主制定班级活动预算分配规则、学业帮扶计划等。在学业指导下，能力赋权理念的实践需突破教师主导辅导模式，组建学科互补型互助小组，让学生在共享学习资源、共创复习方案的过程中培养自主能力。另一方面，在评价体系建设方面，构建制定科学的辅导员考核标准。制定涵盖个案服务数量、危机干预效果、专业方法运用等维度的量化评价指标，要把社会工作能力作为职称评定和评优的重要依据。这种评价导向能有效引导辅导员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提升，真正实现专业能力的内生性增长。

### 参考文献：

- [1] 李治廷.社会工作理论在大学新生适应问题中的运用研究[J]. 公关世界, 2024(10): 101-103.
- [2] 周志峰,卫爱国. 学校社会工作融入高校辅导员育人工作创新路径[J]. 秦智, 2023(12): 118-120.
- [3] 史渊艺.民办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创新路径研究——基于社会工作的视角[J]. 教育教学论坛, 2023(46): 37-40.
- [4] 李平.职业本科院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困境与突破[J]. 大学, 2023(22): 177-180.
- [5] 谢君君,谢昀昀.论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困境及解决路径[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6, 5(5): 8-13.
- [6] 张静.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嵌入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创新性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0, 19(06): 246-247.
- [7] 刘毅.高校学生工作与学校社会工作的相互关系及联动机制[J]. 河南科技, 2015(23): 249-250.
- [8] 时莎莎,黄舒清,侯美羽.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危机突发事件的建议与反思——以北京B高校辅导员工作为例[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22(03): 100-104.
- [9] 苏芡.浅析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辅导员学业帮扶工作中的运用[J].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2020(02): 29-30.
- [10] 姚远.如何运用学校社会工作法解决新生学习适应性问题——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为例[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2023, 32(01): 79-82.
- [11] 易钢,蔡若佳,曾雅丽.学校社会工作嵌入：高校辅导员功能拓展与角色重塑[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5, 15(1): 63-66+91.
- [12] 杜娟.论个案工作法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7, 30(2): 86-87.
- [13] 高薇.团体社会工作在高校辅导员育人工作中的运用[J]. 品位经典, 2020(7): 70-71.
- [14] 张建人,周彩萍,周玉霞,等. 巴林特小组在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5): 1134-1137+1129.
- [15] 张璐滢.辅导员应对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的思考——基于社会工作视角[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6, 18(05): 88-91.
- [16] 魏文景,钟敏.校园治理视阈下的高校辅导员伦理困境及对策——基于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经验[J].区域治理, 2019(39): 179-181.
- [17] 陈盼盼.学校社会工作方法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探索[J]. 教育现代化, 2020, 7(52): 152-155.

# 协同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研究

郑志凤<sup>1\*</sup>

(<sup>1</sup>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本文基于协同理论分析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独居老人支持网络的建构。独居老人存在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神陪伴和社会互动等多方面需求,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呈现规模与分布失衡、需求层次断裂、系统脆弱性、支撑体系不足以及协同治理困境等问题。协同理论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与社会工作的“增能赋权”理念相契合。在此框架下社会工作通过激发自组织内生动力、序参量培育与涨落引导服务模式创新、倡导政策保障支持网络构建以及理论创新与实践升级双轮驱动等路径促进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满足独居老人的多重需求,为破解老龄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创新路径,促进实现积极老龄化。

**关键词:**协同理论; 社会工作; 独居老人; 社会支持网络

##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Zheng Zhifeng<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Synergetics to examine social work's role in building support networks for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who face needs in daily care, healthcare, companionship, and social engagement. Current support systems exhibit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hierarchical fractures, structural fragilit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hallenges. Synergetics' "whole > sum of parts" principle aligns with social work's empowerment philosophy. Social workers construct networks by: stimulating self-organization, innovating service models through parameter cultivation, advocating policy safeguards, and integrating theory-practice advancement. This addresses multifaceted needs, offers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aging society governance, and advances active aging.

**Keywords:** Synergetics; Social work; Elderly living alon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 1. 引言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双重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独居老人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层面的需求亟须得到有效满足,因此构建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重要议题。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独居老人达到2994万户<sup>[1]</sup>,独居老人群体数量增长快速,这不仅体现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更体现了当前中国独居老人社会支持需求

总量的不断增加。在以大数据为物质资料的智能化时代，社会架构转变远远滞后于老龄化社会形态转变，智慧经济文化的快速变迁与严重滞后的“适老化”制度供给仍然并存<sup>[2]</sup>。独居老人的多元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亟须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来促进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满足独居老人的生存和发展性需求。而协同理论作为解释复杂系统内部运作的重要范式，其强调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与社会工作“增能赋权”的专业理念契合，为破解“独居老人支持网络建构”难题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 2. 协同理论与社会工作介入的契合性

协同理论（Synergetics），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理论部分，主要包括自组织、序参量和涨落三大核心概念。协同理论强调系统中的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整体效应，社会系统中存在着的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提升系统的功能性和有效性。

### 2.1. 协同理论与社会工作结合的必然性

社会工作采用个案管理、资源链接和服务递送等微观的方式方法来积累实践经验和推动中宏观层面的发展，协同理论则揭示了这些微观干预如何通过序参量的培育来达致宏观系统的质变，两者的实践逻辑具有共通性。在独居老人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加大老龄知识和服务宣传，完善社区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服务，传递给独居老人来自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善独居老人的心理状态，提高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sup>[3]</sup>。进一步促进社区老年互助组织孵化，从而推动社区建立持续有效的服务模式，这种从微观实践到中观协调再到宏观变革的立体化干预模式，体现了协同理论“自上而下”系统演化，因此两者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 2.2. 协同实践场域的多元主体，能够有效治理复杂系统

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等多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任何主体的单个行动都可能引发整个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改变，只有提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性，打破主体之间的信息和资源壁垒，才能有效提升服务系统的效能。构建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在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优势的基础上，把项目服务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之中，由社会工作协同各种社会力量，用项目服务统领企业公益服务、志愿服务以及互助服务，形成“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格局<sup>[4]</sup>，实现资源整合和有效分配的动态过程。

## 3. 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与挑战

### 3.1. 规模与分布失衡：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错配

中国独居老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农村尤甚，地域分布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特征，形成资源配置均衡的深层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务工，而农村独居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sup>[5]</sup>，部分农村地区呈现“留守村”现象，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消失。城市地区虽拥有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但受到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家庭文化观念的影响，城市独居老人数量也不断上升，且成为社区治理的“隐形群体”。农村地区财政投入不足，养老服务覆盖率低；城市地区需求过度集中，养老服务出现排队拥堵现象。这种格局易引起资源配置的城乡倒置，促使农村独居老人因服务缺失加速流向城市，但由于社会网络的重建和保守意识使老年流动人口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当地社区生活<sup>[6]</sup>，加上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迫使部分老人返回农村养老，形成两栖困境。

### 3.2. 需求层次断裂：从生存保障到自我实现的未满足

独居老人的需求结构包括基本的生存保障需求和发展性的自我实现需求，目前的服务供给体系主要服务目的是满足独居老人基本的生存保障需求，服务供给体系呈现结构性不平衡。在生理需求方面，饮食供给、医疗保障等生存保障服务仍然存在缺口，社区食堂等日均服务不足<sup>[7]</sup>；在安全需求层面，居家安全监测体系覆盖率不足，独居老人家庭意外事件发生率普遍高于普通家庭；在归属与爱需求层面，部分独居老人与亲属关系不够紧密，交往不够密切，社交圈狭窄，生活照

料、情感支持匮乏<sup>[8]</sup>。虽然生存保障层面的服务存在缺口，但是补足性不断增强，而自我实现需求则呈现出系统性忽视，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社区非常稀缺，老年教育更是参与率低下，老年志愿服务、技能传承项目等自我实现类服务更是近乎空白。

### 3.3. 系统脆弱性：家庭—社区—技术支撑体系的不足

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正面临着家庭功能弱化、社区支持碎片化和技术适老化不足等危机。在家庭层面，传统代际支持网络因子女外出务工加速瓦解，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子女在父母居住地赡养的概率不断降低；在社区层面，大部分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为政府购买项目，缺乏持续性运营，缺乏具备丰富工作经验、优秀服务能力的社会工作者，这与老年人复杂多样的需求之间互相冲突<sup>[9]</sup>；在技术层面，数字化服务排斥现象严重，独居老人智能手机使用率低，手机等智能设备适老化改造滞后，老人无法独立操作血压、血糖仪等健康监测设备，支撑体系无法有效协同运作，提高了独居老人生活的风险系数。

### 3.4. 协同治理困境：多元主体互动失效的深层矛盾

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存在主体割裂、动力缺失和结构僵化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主体割裂方面，主要体现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模糊，社会组织参与空间被挤压，民政、卫健、医保等部门数据共享率较低，形成“数据孤岛”；动力缺失则表现为以盈利为目的社会资本开展具有福利性质的农村养老，往往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社会责任<sup>[10]</sup>；结构方面表现为僵化低效，服务供给呈现线性化特征，应急机制滞后。

## 4. 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路径

### 4.1. 创新政策保障支持网络建构

政策保障是支撑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基石，社会工作通过倡导立法保障、财政支持和技术赋能等方式来建构系统性保障。在立法方面，社会工作者应积极与政府合作，积极调整、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方案，及时终止过时、无效的旧政策，制定出台专门针对独居老人的社会政策<sup>[11]</sup>；在财政方面，设立相关的老年服务创新基金，促进良性竞争的公益创投模式发展，完善政府购买和服务机制，倒逼服务机构提质增效；在技术方面，积极推广智慧养老服务，建立服务认证标准体系，创新技术支持方式，打造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 4.2. 构建立体协同治理格局

为实现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建构和有效治理需要打破主体壁垒和限制，需要建立多元高效协同治理的格局。在政府主导方面，建立有效的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将老年服务纳入服务评估绩效考核体系；在社区主责层面，有效整合已有养老服务资源，有效增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互补性，最大程度发挥各资源主体的优势作用，促进独居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效提供<sup>[12]</sup>，而社会工作在其中扮演联系沟通的桥梁，促进多主体高效合作，建立多维协同机制，演绎协同理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原理，为破解老龄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创新路径。

### 4.3. 激发自组织内生动力

自组织是复杂系统演化的核心机制，社会工作通过赋能个体、培育组织和激活社区等方式来激发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支持系统的内生动力。在个体层面，社会工作者运用认知疗法和优势视角等理论，开展智能手机学习、线上小组学习等提升技能和增强社会参与的项目；在组织层面，社会工作者协助老年人孵化互助型、兴趣型和治理型的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发展，向更专业化、规范化、实务化的道路发展<sup>[13]</sup>；在社区层面，社会工作推进社区空间适老化改造，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增强社会互动机会，重塑社区文化生态。

### 4.4. 序参量培育与涨落引导服务模式创新

序参量培育与涨落引导是独居老人服务模式创新的核心机制，在此之下社会工作运用专业实践将培育社会意识与建设规则作为序参量培育的关键载体，以系统性干预引导服务模式创新。在社会意识层面，社会工作以专业价值观为内核，通过社区宣传、代际互动项目等具象化载体，激活系统内“积极老龄化意识”等涨落因子，为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思想基础与社会动力；在规则体系层面，将社会意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服务规范，明确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及老年群体自

身的权责边界。针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突发健康事件、资源供给波动等涨落现象，设计弹性调节机制，使规则体系既能保持稳定性，又能通过适应性调整局部转化为系统优化的契机。

#### 4.5. 理论创新与实践升级双轮驱动

理论和实践是构建完善的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双轮，社会工作通过动态评估、本土经验参考和前沿技术等方面来推进。在评估方面，开发有效的协同评估工具，构建以服务对象为本、服务主体为支撑的动态评价体系；在经验方面，借鉴优秀国际经验，开展老龄化治理国际合作的同时，总结因地制宜的本土经验，探索中国本土化模式；在技术方面，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线上独居老人服务平台，推动老龄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与制度设计一样，共享平台的建立也需要政府主导，整合线上、线下各类社会资源，使困境养老服务实现从点到面的转变，形成区域内困境老年人社会支持资源的共享互助网络平台<sup>[14]</sup>。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升级的双轮驱动，推动实现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从各自服务走向协同服务的效法发展。

### 5. 结语

独居老人在基本生活、情感支持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求未满足，亟须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回应。本文基于协同理论视角，在探究协同理论与社会工作理念契合性的基础上，分析独居老人支持网络建构中的资源错配、需求断裂、系统脆弱及治理失效等现实困境，针对这些困境，社会工作通过激发自组织内生动力、培育序参量引导服务创新、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赋能等路径介入到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建构，有效整合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等主体资源，关注独居老人从生存需求到心理需求的多层次需求，探寻社会工作介入独居老人支持网络建构的路径。

####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基本情况[EB/OL]. (2021-05-11) [2025-07-12]. [http://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http://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 [2] 李熠煜, 杨旭, 孟凡坤. 从“差距”到“融合”: 社会“智”理何以“适老化”? [J]. 学术探索, 2021(8):96-103.
- [3] 黄乐萍, 方贻儒, 汪作为, 等. 社区独居老人的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的相关性分析[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15,25(2):73-77.
- [4] 赵立新. 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的社会协同机制研究[J]. 人口学刊, 2024,46(4):86-98.
- [5] 崔家鑫.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独居老人孤独感缓解的个案工作研究——以通辽市某村为例[J]. 村委主任, 2023(8):146-148+152.
- [6] 李秋莎.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23,40(4):530-534+539.
- [7] HUANG X. Research on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Service Poverty" for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A Case Study of County S in Jiangxi Province[J]. Advances in 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2024,8(1):10-17..
- [8] 牛丹. 协同治理视角下独居老人健康照护问题研究[J]. 国际公关, 2024(18):101-103.
- [9] 王博菡.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与对策[J]. 国际公关, 2024(13):32-34.
- [10] 魏晓轩, 蔡定昆. 协同理论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J]. 实事求是, 2024(6):14-21.
- [11] 吴婉华. 独居老人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27(1):37-40.
- [12] 马国瑾, 汪怡.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生活照料服务困境及对策研究——以 X 社区为例[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24,45(4):28-35.
- [13] 唐兰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研究[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10):38-41.
- [14] 李长文. 协同视角下困境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及其实践——基于“公益 1+1”之溢彩星光项目的案例研究[J]. 老龄科学的研究, 2022,10(6):42-53.

# 复仇、女性与民国司法：三部戏剧中的法律叙事研究

吕东睿<sup>1\*</sup>

(<sup>1</sup>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编的音乐剧《赵氏孤儿》中，故事情节将复仇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比依据莎翁经典IP创作的音乐剧《哈姆雷特》，不同形态的复仇给法律提供了一定的讨论空间。作为原创剧作的《庭前》则是直接将民国时期中国法律的发展呈现给当代观众，其中的法律发展进程和女性法律从业者的方向值得思考。中国戏剧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华法治文化研究的蓝本，本文将根据戏剧作品中涉及的法律元素出发，着重从中国的戏剧作品中探讨“法律与戏剧”的研究路径与当前的局限性，寻找中国文化法治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关键词：**法律与戏剧；《赵氏孤儿》；《哈姆雷特》；《庭前》

## Revenge, Women, and Republican Justice: a Study of Legal Narratives in Three Plays

Lyu Dongrui<sup>1\*</sup>

(<sup>1</sup>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In the musical “The Orphan of Zhao”, which is adapted according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toryline closely links the revenge with the law. Comparing with the musical “Hamlet”, which is based on Shakespeare's classic IP, the different forms of revenge provide a certain space for discussion on the law. As an original play, “The Law’s Amour” directl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w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o contemporary audiences,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leg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female legal practitioners are worth thinking about. Chinese dram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a blueprin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ule of law culture. Based on the legal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drama work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exploring the research paths and current limitations of “Law and Drama” from Chinese drama works, and searching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rule of law culture.

**Key Words:** Law and Drama; The Orphan of Zhao; Hamlet; The Law’s Amou

## 1. 引言

中国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都将复仇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西文化对正义、生命和道义不同维度的考量；作为北大“话剧九人”的民国续曲暨终章，《庭前》通过串联诸桩案件将民国时期法律的发展呈现给当代观众，对时代救亡、

- 20 -

---

作者简介：吕东睿（2001-），女，上海，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法、文化法

通信作者：吕东睿；通信邮箱：2311090551@ecupl.edu.cn

思想革新和女性地位给出了答案。本文将从“法律与戏剧”的关系出发，以中国戏剧剧本为依托，分析法律在戏剧创作中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以及法律在戏剧台前幕后的不同体现，以及时代裹挟下法律和戏剧的相互作用。

## 2. 法律与戏剧的交汇

法律与戏剧同属人文社科领域，法律为戏剧提供创作选题和演出保障，戏剧为法律的传播和教育锦上添花。戏剧中的法律元素表达值得我们探究，如何通过法律推动戏剧的发展也需要我们思考。

### 2.1. 戏剧中的法律观念与制度

文学经典是通过语言文字给予读者心灵的洗涤和陶冶，当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被以一种声形并茂、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为戏剧。戏剧是舞台上的无彩排直播，当文学作品，尤其是民间经典文学改编为戏剧脚本，登上戏剧舞台，不仅是信息呈现形式的转变，而且是叙事逻辑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戏剧表演要如何艺术化诠释文学作品的主旨<sup>[1]</sup>。

法律与戏剧的牵绊存在已久，中外艺术家们已经创作出许多蕴含法律元素的戏剧作品，中国的代表作品有元代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剧三十种》、明代关汉卿的《窦娥冤》，西方的代表作品有《十二怒汉》、《法外之徒》。戏剧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法律是直截了当维护现行制度，戏剧往往是批判的、暗讽的，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对法庭审判中的荒唐之处的描写来讽刺人心<sup>[2]</sup>。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的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是在“表演”落于纸面的法律文本，这就需要戏剧对法律提供说服性、劝诫性的感性“表演”指导<sup>[3]</sup>。

### 2.2. 法律对戏剧的塑造

每个时代的戏剧作品都带着所处时代的法律元素。在内容上，西方自然法思想在莎士比亚剧中得到充分表达：《威尼斯商人》的法庭桥段，《一报还一报》中的“法律虽然已经暂时昏睡，但它并没有死去”，以及《裘力斯·恺撒》中“恺撒的葬礼”会引人联想到陪审团制度等<sup>[4]</sup>。在形式上，世界各国的最高法院通常都建设得宏伟庄严，法庭内的案情不断推进；而国家剧院也大都坐落在首都核心区域，舞台上的演员用表演展示善恶美丑；一个是柔性审视，一个是刚性审判，形成观感上的呼应。从整体来看，剧院内部的剧场也可以被视为艺术的法庭，无论是舞台上常见的法庭审判情节，还是舞台下与现实庭审的听审团位于相同位置的观众席，体现了法律对戏剧的全方位渗透<sup>[5]</sup>。

## 3. 复仇中的“道”与“义”

提及“复仇”，我们经常会联想到两部经典戏剧作品——中国的《赵氏孤儿》和西方的《哈姆雷特》，《赵氏孤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东方王子复仇记”，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都想通过“复仇”实现内心的正义与秩序；但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赵氏孤儿得到了一个家族的保护与庇佑，哈姆雷特却是独身一人；赵氏孤儿最后是胜者为王，哈姆雷特是无憾的视死如归。

### 3.1. 《赵氏孤儿》中的复仇与命运观

#### 3.1.1. 戏剧舞台上的《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的故事雏形记载于先秦时期，《左传》和《史记》中对故事中的晋王朝、赵家、韩家都有记载，但内容有所差异；元代纪君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杂剧的艺术创作，搬上戏曲舞台，进而被多次改编成多个戏剧版本和荧幕作品；《赵氏孤儿》在西方观众中熟悉度高的原因是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改编，他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引入欧洲，植根于人文主义土壤，赋予其法国的人性关怀，舍弃掉充斥着暴力情节的复仇情节，希望儒家文化中的爱和宽容能够成

- 21 -

作者简介：吕东睿（2001-），女，上海，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法、文化法

通信作者：吕东睿；通信邮箱：2311090551@ecupl.edu.cn

为另一种结局。而徐俊导演的音乐剧《赵氏孤儿》在以元杂剧版本为基础的同时，更多取材于詹姆斯·芬顿的话剧《The Orphan of Zhao》，音乐剧版赋予了历史故事以当代思路，程子灵魂贯穿全剧，程氏父子最后的隔空对话与团聚，表达了导演对原本只是一个“工具人”的生命的重视，是对生命重量的认可，也是让观众从程子灵魂视角看到程婴抉择的艰难、每个人牺牲的价值<sup>[6]</sup>。

从传统的元杂剧到当代的音乐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内核始终认为——儒家伦理和传统道德高于皇权，皇权受制于一定的是非标准之下<sup>[7]</sup>。无论是最初记载的门客身份的程婴和公孙杵臼，亦或是音乐剧版本中的一介平民程婴和赵家好友公孙杵臼，他们都代表了皇权、世家之外的普通民众，是普通人推动的这场“正义”的复仇。音乐剧《赵氏孤儿》与各种话剧版本均有所不同，音乐剧在人物自由意志明显的基础上进化了角色自我意识的升华，充分展示了“命运与选择”的主题：第一，程婴从接受公主的请求、恳求韩厥将军放行、跪求妻子用自己的孩子交换，到与公孙杵臼谋划如何以程子瞒过屠岸贾、保全全城婴儿的姓名，再到正面与屠岸贾 16 年的周旋委蛇、最后对程子灵魂的忏悔与赎罪，主动或被动地做选择，被命运无情地安排着；手无寸铁的程婴选择“挺起自己的胸膛，抱住那些更弱的光”的不归路，隐忍多年，坚持“以恶之名，荒诞不经，滥杀生命，绝不可以”的家国大义，只是无法去爱“另一个孩子”。第二，音乐剧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更加细腻，公主与程妻都是爱子的母亲，公主的极力争取为赵氏孤儿争取了一线生机，也是她的信念和笃定，支持、推动成年后的程勃（赵氏孤儿）重拾身份、为家族报仇，但是公主只是告知“你就是赵氏孤儿”，而非迫使程勃无脑复仇，带给观众的感受是温暖、强大的；程妻的情感落差是最剧烈的，从程子呱呱坠地到铃铛落地，程妻不仅要接受这份使命，而且要掩饰悲恸情绪、配合丈夫瞒天过海，“无权做选择”，把母爱给了别人。第三，赵盾自刎、程婴换子和不命的屠岸贾最终被杀，选段的台词都蕴含着“天命”的力量，将尘世间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与“命运”连结，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审美习惯，又连通了西方莎士比亚戏剧哲学，使音乐剧《赵氏孤儿》兼具当代性与开放性<sup>[8]</sup>。

### 3.1.2. 复仇制度的文明化

正如苏力老师所讲，“司法制度的基础动力就是人们的复仇本能”<sup>[9]</sup>，中国古代的复仇通常基于家族伦理的一种行为，《赵氏孤儿》就是典型案例。如若人人面对亲人的飞来横祸或蓄意谋害麻木、无感，那么复仇也就不复存在，司法制度替代和制约复仇的作用也不复存在。复仇在人类历史上常以古老、血腥等形容词来修饰，但实际上，复仇是一种理性、文明的产物，与“报复”的暂时性不同，复仇往往具备缜密的筹谋和安排。在任何缺乏有效公权力防止和制裁行为的社会中，复仇具备满足社会需要的特定功能，对于维护公共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人从来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使得人们大多在一个分享基因的亲属群体中生长和发展起来，一旦群体之间发生不可逆转的冲突，“斩草除根”便成为了复仇的首选目标，“斩草除根”是一种理性的行动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剥夺对方的复仇能力，这与今日“杀人灭口”是为了剥夺受害者宿主法律进行复仇的能力有着相似之处。时至今日，我们会认为赵氏孤儿的复仇已经伤及无辜，如同当年屠岸贾的所作所为，甚至若有遗漏，赵氏会再次面临灭族之灾，两个家族的仇怨永无了结之日；因此我们会建立严格的制度对“复仇”行为进行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实现“复仇”。例如，秦朝采法家思想，对复仇行为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汉承秦制，当国家公权力能够伸张正义的时候，擅自复仇属于违法行为<sup>[10]</sup>。因此，复仇从野蛮的合理到文明的合理经过了实践检验，并实现制度化发展，逐渐具备合理性。

### 3.2. 《哈姆雷特》中的复仇与秩序观

与《赵氏孤儿》形成对照、以“复仇”为主题的另一部戏剧是莎翁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展示了西方世界“复仇”的伦理逻辑，主角哈姆雷特是有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的王子，而他的政治理想与法律理性逼迫他无法选择野蛮、非法的手段复仇。与赵氏孤儿相同的是要为父手刃仇人，但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背负的不仅仅是家事，他清醒地知道“复仇”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是不同于中国家族集体复仇的传统对象；他负担的更是国事，他要以程序正义的法律审判方式重建王国命运共同体，维护王国的安全与稳定，进而合理合法地实现复仇。因此，哈姆雷特必须要把个人的血亲私仇与重塑筋骨的社会公义进行综合权衡、高瞻远瞩，让他的复仇被民众理解，也必须在民众那里取得最后的效用。哈姆雷特选择以法律为准绳，实现拯救社会政治理想的理性复仇，即儿子与王子的身份决定他要把为国王（血亲私仇）复仇与为王国（公义、政治理想）复仇

融合起来，并纳入程序正义中。复仇本身就是一个原始的、血腥暴力的、非理性的行为，如何把这非理性的激情行为框范到文明理性的法律程序中，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有所助益，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经典出自哈姆雷特的独白。在哈姆雷特的时代，他作为王子无法诉诸公权力来复仇，依照《赵氏孤儿》的复仇逻辑，哈姆雷特有着作为死者直系亲属的义不容辞的复仇义务，但是哈姆雷特的复仇显然不是杀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需要昭彰真相、履行程序正义的审判才能完成对世道人心的扭转、重整。面对母亲和叔叔的错误，他需要为了父亲进行报复，但依据复仇的逻辑，他又必须作为母亲和叔叔的复仇者对自己（母亲和叔叔的杀害者）复仇；面对举国民众，哈姆雷特不能变成克劳狄斯式欲望的魔鬼，也不能成为莱阿提斯那样非理性情感的俘虏和奴隶，或者小福丁布拉斯那样的野心的仆从。这些行为都将导致善的理想跌落恶的深渊，沦为罪犯则丧失维护正义的身份，从而丧失其维护正义的身份立场，无法实现复仇的社会目的和法律目的<sup>[11]</sup>。

苏力老师在《赵氏孤儿》中探究“复仇”与当代刑法制度的关系，认为复仇制度的有效威慑力主要在于惩罚的确定性，而并不在于其严酷性；《哈姆雷特》的复仇充分展现了，当“复仇”与家族利益、社会制度深度杂糅时，惩罚的确定性、严酷性已无实际意义，如何维护国家制度、民心所向更为重要。

## 4. 戏剧中的法律宇宙

戏剧与法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虽然此研究领域较为小众，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广阔的探讨空间，戏剧能够向大众直观、形象地传递法律精神，法律能够为戏剧提供创作、改编素材，二者相辅相成。戏剧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戏剧作为一种现场演出，能够即时性地把情绪价值提供给观众；戏剧的文本和场景布置中也蕴含着法律。戏剧与法律最直接的互动就是以法律为舞台内容的戏剧作品，比较经典的法律戏剧作品有音乐剧作品《Legally Blonde》（《律政俏佳人》），话剧作品《控方证人》《12个人》《Prima Facie》（《初步举证》）等，通过将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真实的开庭过程搬进剧场，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法律严肃外表下包裹的温度。

### 4.1. 《庭前》中的民国法律演进

北大九人话剧院 2023 年度创作的话剧《庭前》，以民国三十年间司法体系变革为时代背景，以郎世飘、尤胜男这一对律师夫妇为主要人物，以成长为贯穿全剧的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采用开放式戏剧结构，讲述了民国司法体系的变革史与男女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庭前》聚焦时代之救亡、思想之革新，与前作《四张机》、《双枰记》呼应；郎尤夫妇在家庭、法庭和一生浮沉中寻找答案——纵使迷惘踟躇，纵使生命与名利终将熄灭，纵使社会往返迂回，然山河若能永存，精神之星辰若能指引后人之路，火把便生生不息。

《庭前》依托的背景是清末民初，三十年间，我国逐渐建立起一套国家司法体系、庭审流程与法律法规，逐渐在法律庭审中获得话语权，也争取到了女性律师上庭的权利。从“大人”到“法官”的称呼转变，从惊堂木到法槌的变化，从会审公廨的中外悬殊地位到完整的庭审程序，《庭前》向观众展现了特殊时期下中国司法体系的日渐完善、中国律师的峥嵘岁月和中国女性的自立自强。

《庭前》通过一个个案件向观众铺陈书写了民国法律的峥嵘岁月：以“《青年日报》编辑部控告经理部案”为开端，拥有海外法学背景但从事编辑行业的郎世飘辩护失败，亲身经历了民国初期立法体系的薄弱和法院庭审流程的不规范；以“布朗诉王生案”为导火线，成为律师的郎世飘虽证据确凿，但司法公正依然被“在租界里，凡是涉及到洋人的案子，十件有九件是中国人输”的民族压迫禁锢着；人到中年，郎世飘为了“郎尤律师事务所”能站稳脚跟，为杜先生谋划“马水仙撤诉”事件，与尤胜男的立场激烈碰撞，司法又沦为政治博弈的权宜之计……中国现代司法体系自诞生起便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清末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生，并未实现“戊戌变法”对政治方面的改革抱负；1912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是近代第一步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但是没有反帝反封建的规定，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缺乏群众基础；司法体系薄弱、外国法官歧视和自身观念的落后，中国司法体系的曲折成长历程在戏剧文学中被娓娓道来。

舞台上灯光变换，由暗淡渐变明亮，一件件案件庭审的再现，见证了民国司法体系的变迁，见证了律师在法庭上从被忽视、被歧视到据理力争、为弱势者发声的转变<sup>[12]</sup>。

#### 4.2. 《庭前》中的女性角色

《庭前》也演绎了民国律师，尤其是女性律师的蜕变成长。郎世飘为了守护心中正义立誓成为一名律师，但在“洋人的法庭”上，作为被告，虽有同为中国人的原告翻译——尤胜男的帮助，仍然败诉。同妻子尤胜男一起，从上海北上，郎世飘成为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负责人，在官场上沉浮，面对好友程无右身陷女师大“驱杨”风波，郎选择平衡法律正义与政治周旋，逐渐在意输赢与得失。学生运动中，郎宅被砸、女儿走丢，郎世飘再回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为了获得案源成为杜月笙的门客，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郎世飘在一次庭前调解中以绑架挟持原告撤诉，与妻子大吵一架后分别，孑然一身。故事的最后，郎世飘因为好友重判二十五年的结果受到重创，告诉媒体不再做律师。郎世飘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茕茕孑立的中年人，他在律师道路中收获了爱情和名利，也失去了挚友、家人和自己；但是郎世飘的成长经历也激励了一代青年法学生励志成为优秀律师，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律师制度和辩护体系。

《庭前》中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律师成长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打破男性长期主导话语权的律师行业，更重要的是刚柔并济地处理来自社会各界的评价和偏见。同样拥有海外法学背景的尤胜男，即使以巴黎大学法律硕士身份回国，却因为性别限制在国内无法找到心仪的、专业性强的工作，只能为外国律师做翻译工作。起初，她怀抱青云之志归国，即使深谙世道对于女性的不公仍旧想要“竭尽所能说话做事”。在“布朗诉王生案”中，她认识了郎世飘，对郎世飘满纸夸赞，却自嘲“有不思上进之嫌”，其中包含着对女子身份的诸多无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曾习惯性地明确将女性拒之门外；1927年正式颁行的《律师章程》最终打破男性千年法律职业垄断的藩篱，被誉为“中国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之起点”<sup>[13]</sup>。自该法案颁布后，女性可以以律师的身份出庭，尤胜男成为一名女性律师。郎世飘与尤胜男共同建立起“郎尤联合律师事务所”，在舞台左右两侧，两桌并峙，他们承接案件，邓氏姐妹案、绑架案、救国会十君子案……在法庭中为维护法律正义与人民权利而努力。

无论东西方，最初很默契地都以性别为依据进行社会分工，即使在最先提出“自由”“平等”的西方，女性的地位也经历了曲折的崛起。在古希腊社会，妇女不是公民，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女性与孩子、奴隶、财产归为一类，可以被男性随意处置。因此，基于这种性别上的社会差异，男性和女性在感知世界、处理政治法律与家庭伦理问题上也是天差地别<sup>[14]</sup>。起初的男女分工，主要是适应农耕文化的生活模式，但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极端且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男尊女卑逐渐成为糟粕，严重阻碍了女性事业发展，所谓的“女权主义”实际上是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在尤胜男最后的两篇日记中，她记录了自己联合律界女性为女子争取权利的斗争，表露出对于时局动荡下正义之人处境的担忧……当胜男面对丈夫郎世飘“你执业以来，帮助弱者、帮助女性，你难道就没有私心吗？”的责问，她没有很强烈的情绪宣泄，只是淡漠地看着陌生的丈夫，冷静地说：“我自私，我只是作为一个母亲，担心小斐吃不饱、穿不暖，担心她嫁人以后被丈夫欺负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尤胜男在与郎世飘组成家庭、生下女儿小斐后，日记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有女儿成长的欣喜，也有家中容易遗忘的琐事；但造化弄人，女儿走丢，向来理性的她成为写下“世间若有神佛，求你护着她”的破碎母亲，日记本上的短短两行字残存着数滴泪迹。

可见，在经历过妻子、母亲的身份更迭之后，她又回归至了最初的自己；几次身份变换之下，是生长在尤胜男身上的坚韧。无论是选择嫁给郎世飘退居其后照顾家庭，还是选择离开他走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道路，尤胜男每一次都是在思考后符合本心的自愿，她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慎重地决定自己的未来<sup>[15]</sup>。

### 5. 戏剧与法律的互动

“法律与艺术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积极的、持续的、辩证的关系”<sup>[16]</sup>，法学的理性世界与

戏剧的感性宇宙看似没有交集，但戏剧的文本、音乐、布景却都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具有法律语言特色的判词到符合法律严密逻辑的音乐，再到遵照一定程序和秩序的舞台布置，戏剧一直在不同方面与法律进行着有来有往的互动。

### 5.1. 法律中的戏剧张力

#### 5.1.1.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复仇正义

《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都围绕着“复仇”这一核心主题展开，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都因父亲的被害而走上复仇之路。两位复仇者面临着不同维度的道德和心理困境：赵氏孤儿在成年得知自己真实身份之后，不仅要忍受失去亲友的痛苦，还要步步筹谋，以确保复仇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样，哈姆雷特也在复仇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心理斗争，他的复仇对象就是自己的亲人，内心的犹豫和不安斗争更甚，最终导致其精神状态的崩溃。赵氏孤儿最终通过一场血腥的复仇实现了正义，哈姆雷特的复仇同样以一场大屠杀结束，展示了复仇的毁灭性力量。

两部作品的结局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赵氏孤儿》中，复仇尽管带来了痛苦，但最终恢复了家族的荣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正义的重视和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而《哈姆雷特》的复仇则以更为悲剧性的结局告终，展示了复仇的复杂性和人性的脆弱，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个人命运和人性矛盾的深刻思考。

#### 5.1.2. 千万人奔赴的《庭前》日夜

以《庭前》为收官作的九人民国宇宙，交代了《双枰记》中对程无右的判决是 25 年的刑罚，《四张机》中凭借一篇文言文深得古鹤箴喜爱的考生关沥海对鸦片爱不释手，在千万人来回穿梭的民国岁月，《庭前》以法律为主题，涵盖了家国命运、个人前途、理想与现实、女性主义和平正义等宏大却浅尝辄止的思考。《庭前》想要传递的是一中“纵有万般妥协、迂回、往复无常，仍愿勇者得胜，‘大庇天下寒士’之志一往而无前”的气概，以及尽管理想化、乌托邦式但心向往之的纯粹世界。

在展现以个人绵薄之力无法撼动、但在努力自我革新的法律同时，《庭前》将更多的目光停留在女性的多面性和真实性，这与 2024 年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缓缓升起的女性金色雕像遥相呼应，升起的雕像中有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的女权运动先驱 Simone de Beauvoir（波伏娃），有为女性的“堕胎合法化”而奋斗的法国律师 Gisèle Halimi（吉赛尔·阿里米）和推动《堕胎法》通过的法国政治家 Simon Veil（西蒙娜·韦伊），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起草的《妇女权利宣言》、反对奴隶制的 Olympe de Gouges（奥林普·德·古热），也有电影史上首位女性导演和制片人、奠定现代电影基础的 Alice Guy（爱丽丝·盖）……“世界诞生于女性的裙摆之下，却不许女性的裙摆飘扬”，被世界记住的女性需要冲破男性和社会设置的壁垒，还有千千万万的女性被束缚在所谓的舒适区，戏剧艺术中的女性困境映射到现实，是法律需要关注的领域。

### 5.2. 法律与戏剧的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法律与戏剧都是描绘世间百态的工具，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考察真实的社会生活关系，继而做出更好的调整和变革；戏剧是基于表演，通过人物的对白、音乐的衬托、场景的布置等，在剧场空间内演绎社会生活；戏剧描述的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提醒着法律制度做出有效回应。

#### 5.2.1. 局限性

大众对戏剧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艺术层面，法律与戏剧的关系更多是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戏剧作品的完整性。由于法律题材对专业性的要求程度较高，法律方面的剧目数量也较少，因此学界从法律戏剧的角度切入研究“法律与戏剧”的素材很少、难度很高。实际上，固然研究蕴含审判、刑狱等法律元素的戏剧有直接思路，但是戏剧的台前幕后都可以与法律有关联，都值得去探究。

#### 5.2.2. 未来展望

法律是庄重严谨的，戏剧是自由洒脱的，法律与戏剧仿佛一静一动，但二者可以动静结合，法律的理性可以帮助感性的戏剧挖掘表演背后的社会意义，法律的刚性可以在戏剧中得到柔化处

理，再以剧场为起点，让观众对法庭的规则意识与客观价值产生普遍认同，对社会、对个人起到正向的引导和规范作用<sup>[18]</sup>。

## 6. 结论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法律画像的《庭前》，几部戏剧作品中均蕴含了“法律与戏剧”的互动，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复仇与争议、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对抗。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也是在中西不同的法治文化土壤中作出的最符合正义的复仇选择；郎世飘和尤胜男从相识、相爱到相离，其中有时代浪潮的推动，也有个人面对时代洪流、面对“法律为何物”的思量与抉择。

结合法律视角，我们应该思考法律体系对个体权利的平衡，以及对爱情与人生抉择的尊重；我们应该思考不同法治文化环境下对人性的思考和符合大众认知的社会价值观；我们还需要瞻望，未来的法治发展和法治队伍的人才储备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平衡，首先实现内部的平等。在法律与戏剧的交汇中，周旋、迂回、妥协，生命的底色是一次次的困境又解决，从古至今，从台前到幕后，从戏里到戏外，我们或许能够逐渐摸索到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发展路径，也能够创作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法律戏剧作品，实现戏剧与法律的有效、良性的衔接与互动。

### 参考文献：

- [1] 雷咏祺. 大数据时代戏剧影视文学发展路径探析——评《文化影韵：影视文学改编现场》[J]. 当代电影, 2023(12): 184-185.
- [2] 袁娜, 何云波.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文学与法律之间[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7(1): 155-161.
- [3] 陈文琼. 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J]. 河北法学, 2009, 27(7): 41-46.
- [4] 周琳宇.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然法思想[J]. 大众文艺, 2020(6): 31-32.
- [5] 宋铮. 剧场与法庭的伦理类质性[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5, 36(6): 106-111.
- [6] 李涛. 法律制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律制定为分析中心[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21, 25(3): 121-128.
- [7] 周长军, 张瑞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J]. 法学, 2023(2): 121-134.
- [8] 蔡静. 庄周梦蝶的哲学意蕴[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3, 27(12): 83-85.
- [9] 倪佳祎. 法律与戏剧研究初探——以小剧场话剧《关系》为材料[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9(6): 33-37.
- [10] 欧阳鹏婷. 音乐剧《赵氏孤儿》：传统历史剧的当代改编[J]. 戏剧文学, 2022(10): 97-102.
- [11] 王怡. 无界之沟通 音乐剧《赵氏孤儿》的跨语境表达[J]. 中国戏剧, 2022(6): 76-77.
- [12] 池小青. 新视角下的经典重塑 音乐剧《赵氏孤儿》的创作革新[J]. 中国戏剧, 2023(4): 64-66.
- [13] 殷啸虎.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冲突的法律协调[J]. 政治与法律, 2022(8): 151-161.
- [14] 戴春雷. 再为哈姆雷特声辩：一个被误解的“行动的巨人”——共同体重建视域下的“哈姆雷特之谜”[J]. 戏剧文学, 2022(11): 73-79.
- [15] 史欣冉. 庭前日夜，千万人愿赴之——评话剧《庭前》[J]. 东方艺术, 2023(5): 43-48.
- [16] 王瑞超.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执业困境与自我成就[J]. 交大法学, 2021(1): 76-90.
- [17] 薛雪. 庭前梨花窥旧梦，月照芳林逐春寒 评话剧《庭前》[J]. 上海戏剧, 2023(6): 33-35.
- [18] 刘星显. 当法律遇见艺术——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形成及发展趋势[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1): 244-253.

# 养性成德：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中的道德教育价值与实现途径

徐子淇<sup>1\*</sup>

(<sup>1</sup>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阳光小学，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蒙学教育传统，从西周起就有设立官办小学的记载，在《礼记·保傅》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太子教育的主张理论，是后世蒙学教育发展的主要起源之一。文人阶层重视蒙学对儿童在社会伦理、道德修养、知识技能发展上的关键作用。本文探求传统蒙学道德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价值与实现途径。基于对中国传统蒙学教材的文本分析，从世俗伦理德育因素、实现道德教育的途径两个方面评价蒙学德育的现代价值。传统道德教育至今依然有着大量适用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

**关键词：**传统蒙学教材；道德教育；实现途径

## Cultivating Temperament to Form Virtue: The Moral Educational Value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nlightenment Textbooks

Xu Ziqi<sup>1\*</sup>

(<sup>1</sup>The Sunshine Primary School Affiliated to Wuxi Normal College, Wuxi,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radition has a long history.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records of official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Book of Rites · Baofu proposed a series of theories on crown prince education,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main origins of late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literati class emphasized the key role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children's social ethics, moral cultivation, and knowledge & skil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raditional enlightenment moral though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nlightenment textbooks, it evaluates the modern value of enlightenment moral education from two aspects: secular ethical factors and moral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still retains many value orientation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applicable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Traditional Enlightenment Textbooks;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 1. 引言

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几千年中各家学派思想碰撞，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

中国教育特色的、成熟完整而又价值卓越的民族道德观，沉淀出了培育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温床，“礼仪之邦”的美誉响彻世界。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教育极为依赖于道德教育的作用，“德育为先”的教育取向不仅能够培育出道德修养高尚，符合传统社会发展的人才，而且起到了维护社会和谐、文化道德伦理稳定的作用。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德育始终占据着教育体系的核心位置，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传统蒙学德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例如杨玉厚主编的《中国课程变革研究》，该书对我国古代蒙学课程的特征、蒙学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及古代蒙学的课程规划进行了全面总结与细致阐释。近年来，以李明高所著《传统蒙学德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化研究》为典型代表，相关研究开始系统梳理传统蒙学德育思想，深入剖析其内在价值与时代局限，为当代德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实践思路。然而，当前学界在蒙学教材德育体系的构建研究方面，仍缺乏系统性的挖掘与探索。随着世界文化的快速融合，西方现代教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给我国的启蒙道德教育理论带来了全新的观察视角。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儒学传统道德观与西方普世道德观进行相互碰撞、影响、融合，使得社会中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改变。

## 2. 传统蒙学教材中的伦理德育因素

传统蒙学教材中有丰富的伦理德育因素，能够使得儿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伦理道德的教育在实质上是维持从“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秩序，各个时期的蒙学教材都坚持使用教化的手段将伦理和道德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教育活动。

### 2.1. 《孝经》中的蒙学道德教化因素

蒙学教材的编写建立在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和古代道德教育思考基础之上。古人认为儿童天性纯真，宜于及早施教可以使其更好的养成道德。如果说伦理道德是传统蒙学的基石，那无疑“孝”的教育就是构成中国传统人伦道德教育中最为基础的部分。

孝道的三个阶段是对父母的服务、对君主的服务和对自我的肯定，这三个阶段的顺序是由低到高。《孝经》将这三个阶段组合成了两套关系，其中一套将个人发展与对父母的孝道联系起来，另一套则将对父母的服务与对君主的服务联系起来。在《孝经》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sup>[1]</sup>”人们认为，珍惜健康和生命是孝道的最初体现。“修身养性”即为孝道的最高体现，听从父母与珍惜自己生命是相同的。使父母因自己得到荣耀，事亲之孝与事君之义是本质上一样的，《孝经》中常常渗透着诸如此类的教育思想。《孝经》中针对“事亲”有着五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的伦理教化功能不止于此，以家庭关系为基础，以孝道的全过程和五种社会关系为思想的核心基础，父子、君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各样伦理被详尽地探究。《孝经》在事实上是整体的伦理体系，它探究家庭伦理并将其扩展到社会伦理。

汉代在乡一级设置庠序，并且安排孝经师为进行社会伦理和道德教育的考察。自此，《孝经》正式用作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教科书。汉代后，《孝经》仍广泛用于儿童启蒙道德教育。直至宋代，《孝经》依旧被用作儿童道德伦理启蒙的读物，在《童蒙训》中诸多故事依旧来源于《孝经》、《论语》、《中庸》、《孟子》等蒙学教材中。《孝经》作为思想根基，促使《二十四孝》于元代产生，并广泛传播，它成了《孝经》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在普通民众的道德教育中发挥了作用。

《孝经》提到“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都把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把爱和尊重亲人作为爱和尊重他人的前提。应说是一种博爱精神，教育所有人，反映了儒家正统伦理道德建设的核心特征。同时，孝道还包括爱、尊重、谦逊、真诚、忠诚和服从等美德的要求。可以说，《孝经》是一部全面的正统伦理道德体系。

### 2.2. 诗乐审美下的伦理道德

基于对儿童天性纯真有理性的认识，蒙学教材的编写形式和内容都考虑到儿童的兴趣，符合儿童的接受水平，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明代吕德胜在编撰《小儿语》一书时就考虑到在形式上，

应做到“谐之音声”“使童子乐闻而易晓”。

诗歌和音乐用于教育，其主要目标是道德教育。《礼记》记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这都是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孔颖达将《礼记》中的德育目标凝聚为“教之诗乐所以然者”<sup>[2]</sup>。即为“中、和、祗、庸、孝、友”，郑玄对这六种目标进行评注释义“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sup>[3]</sup>”这实际是对儿童提出对待亲人的行为要求，这比起姻亲等复杂人伦关系，儿童对父母兄弟相处道德要求力所能及，更易于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乐是为为一体的综合美育，《尚书》中诗、歌、声、律作为诗歌美育陶冶的代表，而在《礼记》则被冠以“乐语”之名。深邃的思想往往以诗歌的形式作为载体，强大感染力是通过鲜明的节奏所表达给大众。节社会伦理与和谐的音乐诗歌相契合，进而实现和谐统一的道德教育境界。音乐教育包括诗歌、音乐、舞蹈等多种因素，是以全面美育为基础的德育教育范例。司马迁将音乐教育原则论述为，“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sup>[4]</sup>”这是种十分有趣且效果显著的教育方法，能够将道德品质浸润学习者的身心，接受效果也往往优于道德说教。

诗歌作为古代音乐重要组成，广泛应用于教育活动。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小子”既指弟子，也泛指平民与年轻人。由此可见，孔子所论《诗》的教育功能涵盖启蒙教育，是对道德教育的概括。它涉及到《诗》的技巧、启蒙、社会秩序引导等特征。它的最高教育目标是为君父服务，即要求学习者掌握诗歌中所包含的道德要求。“诗”的教育目标孔子分成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事父事君，另一方面是识别鸟兽草木之名。前者属于系统伦理教育，目标层次明确，后者则明显低于前者。这种教育目标的区分在后世蒙学道德教育中持续发展。但由于《诗》内容对儿童而言过于深奥，后世蒙学很少将其直接作为初学教材。尽管如此，后世多种蒙学教材仍包含《诗》的教学目标并良好体现，因此可以说，《诗》的诗歌教育目标即为后世诗歌的道德教育目标。

### 2.3. 子史故事中的道德文化

道德是社会行为规范的抽象体现，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需要合适载体。在诸多流传于世的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除了记诵识字的文本，绝大多数以子史故事的叙事形式来阐述社会行为该遵从的准则。儿童喜爱听故事，尤其是蒙学故事是将人物与事件进行了简要概括，或用寥寥几字的短语将故事穿织在一起。虽然较为简略，但是由于蒙学教学的特殊性，将篇幅缩短，提高内容含量是有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说明或解释，蒙学教材中最初的短句故事被扩展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人物身份、时期和事件过程。这种教学转化依托于“文本简括-教师阐释-儿童内化”的三层机制，其中教师需兼具“经师”解经义与“人师”导品行的双重角色，其具体操作可从教学方法与模式两方面展开。

从故事类型上看，道德伦理故事中可分为圣贤、家教、忠良、修身、烈女、孝子等子类。传统蒙学教材中的伦理德育因素多样，但大都以“忠孝”“乐”“史”为主要的教育价值载体。《孝经》以“孝”作为维系伦理的纽带，《诗经》以“诗乐”作为实施道德教育关于社会人伦等级制度的关键。子史故事则通过社会道德故事提升蒙童伦理道德水平。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采用多种讲解方法，具体如下：

**情景还原法：**教师以《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为例，通过绘制挂图呈现王祥卧冰的场景，让儿童直观感受故事画面；组织儿童进行角色扮演，模拟王祥卧冰的情景，使其身临其境地体会故事中的情感与行为；同时结合方言童谣吟唱故事梗概，利用韵律和节奏强化儿童的记忆，让道德教育更加生动有趣、易于接受。

**问题引导法：**在讲解《龙文鞭影》中“曾参教子”故事时，教师抛出“若父母许诺不兑现，儿童该如何做”的问题，引导蒙童进行思考。随后组织蒙童分组讨论，让他们各抒己见，在交流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最后教师以“信者，人之本也”总结道德要点，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诵-解-行”三段式：**诵读阶段：每日晨读时，让儿童用平仄声调吟诵故事短句，如“融四岁，能让梨”，并配合击节（用竹板打节拍），通过节奏强化记忆，让儿童在诵读中感受语言的韵

律美，同时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讲解阶段：教师结合《礼记·曲礼》“年长以倍，则父事之”等经典，深入解析故事中的伦理规范，将故事与经典文献相结合，让儿童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加深对道德准则的理解。

践行阶段：教师布置“洒扫应对”实践任务，如帮家长洗碗、向邻里长辈行礼等，让儿童将所学的道德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下节课时，组织儿童分享践行心得，对儿童的道德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促进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 3. 蒙学教材实现道德教育的途径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蒙学几乎由士大夫地主阶级所办，并取得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显著效果。本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蒙学在道德教育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古代蒙学实现道德教育的途径：注重依序教学、养性成德和智德并举三方面。通过对古代蒙学实现道德教育途径的分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3.1. 依序教学，注重渐进性与同步性

传统蒙学提倡依序教学，不要求急功近利的跳跃性学习。道德教育是渐进的，前提是识字、写字、吟诵、背诵的基本功训练，再学习礼仪训诫，对传统文化社会规范进行了解。紧接着在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后，通过教师讲解或自行阅读蒙学教材，了解历代的文化常识和典故，增强文化道德认同感。儒家文化所提倡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宏观上表述了道德发展的渐进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相应的道德要求。

道德教育是同步性的。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是通识教育，是与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历史教育等教育内容同步进行，相互交织影响。像《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篇》《龙文鞭影》等等蒙学教材，无一例外的涵盖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读书等丰富内容。蒙学教育中的德育不孤立道德本身的内容，而是使儿童了解到了道德、历史、地理、政治密不可分，提倡道德修养，与亲近自然，了解生活，了解社会是一致的。

#### 3.2. 养性成德，注重人伦性与社会性

蒙学要求道德教育首先需要顺应儿童的天性，才能来成就实现后天的人文之德<sup>[5]</sup>，在这样以“养性成德”为要旨的教育观念引导下，蒙学教材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则依靠人伦性和社会性。

《千字文》中所论“四大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个人则要做到“以五常之道，思之于心，而力行之。”想要达到“五常”则必须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实现，“仁为父子之德；义为君臣之德；长幼有序，即礼之德；夫妇之有别，即为智之德；而信又为朋友之德也。<sup>[6]</sup>”五常以内的事，都无法脱离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这五对人际关系。这表明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不仅是个人在知识和思想上对道德的重视和提高，而是与社会各类人际关系产生连结时候的修养。道德修养是在和他人密切的社会关系中或说是在人伦关系中逐步生成完善的，使仁义礼智信逐步固化为人坚定的德行。虽然这只是《千字文》中养性成德这一德育途径的体现，但其实质是在诸多蒙学教材中相通的。

#### 3.3. 智德并举，注重统一性与综合性

蒙学教材作为实现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具备多种教育功能的，智德并举是德育的宝贵经验。蒙学教育目的有三个方面：第一，首要实现使学生能够进行阅读和写作；第二，蒙学教育让学生掌握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这是理解道德的基础；第三，也是蒙学最主要的教学目的，即促使学生形成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和认同社会伦理。

目前流传最广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全文一千五百余字，侧重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丰富且兼具礼仪、经典教育意义。全书分为五个版块：一是阐述教与学的关系，强调教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二是提出道德修养要求，以生活实例论说道德标准；三是介绍地方历史与文化常识；四是梳理历代学法与宗谱；五是探讨学习态度与学习意义。除直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外，智育内容也服务于儿童对道德修养的综合认知。

蒙学德育中，识字、授知、德育是思想修养的一体三面，具有统一性；蒙学教材兼具识字、

叙事、传授知识和道德教育等多重功能，是综合性的教育载体。

总之，蒙学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和教化儿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注重依序教学、养性成德和智德并举作为三种实现传统道德教育的途径是与现代教育学中倡导的教育顺序性、渗透性和综合性原则在精神上是相吻合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手段上中国传统蒙学教材更重视教育手段的实效性，即迅速促进儿童融入道德社会的速度，促使儿童掌握道德伦理的秩序并能够依照执行。

## 4. 结语

步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教育担当，系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教育理念的守正创新，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明确提升至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地位。一个国家或民族若要实现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自主发展，绝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国外教育经验的学习模仿层面，而应立足自身文化根脉，将世界先进教育理念与本民族思想传统有机融合。否则，教育发展就如同根系未深植沃土的大树，既难以在科学化进程中扎下稳固根基，更会在盲目追随中丧失民族教育的主体地位与文化特色，导致“民族魂”的逐步消解。

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中的道德教育智慧，提炼契合时代发展需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精华，不仅对当代德育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价值，更在文化基因传承、民族精神延续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这一研究既是对教育本土化发展路径的探索，更是守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实践。

### 参考文献：

- [1] 胡平生,陈美兰.礼记孝经[M].中华书局,2016:207.
- [2] 阮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89.
- [3] 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63.
-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
- [5] 申鹏.古典蒙学教材的现代意义浅议[D].天津师范大学,2016: 33-34.
- [6] 周兴嗣,周艺点校.千字文[M].长沙,岳麓书社,2022:58.

# 基于情景模式教学在法医物证学实验课中的应用

张晓嘉<sup>1\*</sup>, 卢双<sup>1</sup>, 李树霖<sup>1</sup>, 包乌人吐亚<sup>1</sup>, 吴海荣<sup>1</sup>, 索利娅<sup>1</sup>

(<sup>1</sup>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医学院、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要:** 法医物证学是法医学中主要的分支学科, 司法实践性非常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专业技术的发展, 传统法医物证教学培养的人才已不能满足公检法及社会鉴定机构的需求。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综合分析并解决问题能力更强的法医学专业人才, 已成为当前法医学教学的重点。实验教学是法医学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环节。本文将基于情景模式教学方法运用到法医物证学实验课中, 模拟案件场景让学生转换到实战人员的角色,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 完成现场勘验, 构建综合性实验教学体系,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情景模式教学; 法医物证学; 教学改革

## Application of Scenario-Based Teaching in the Forensic Biology Laboratory Course

Zhang Xiaojia<sup>1\*</sup>, Lu Shuang<sup>1</sup>, Li Shulin<sup>1</sup>, Bao Wurentuya<sup>1</sup>, Wu Hairong<sup>1</sup>,  
Suoliya<sup>1</sup>

(<sup>1</sup>Baotou Medic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40, China)

**Abstract:** Forensic Biology is a major branch of forensic medicine with strong practical relevance in judicial practice.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Forensic Biology education can no longer meet the talent demands of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and judicial organs as well as social forensic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forensic professional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tronger comprehensive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has become the current focus of forensic medical educ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serves as the core component in developing practical competencies for forensic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applies scenario-based teaching methodology to Forensic Biology experiment courses, simulating crime scenes to immerse students in practical investigator roles. By apply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complete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s, we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cultivates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skills, and teamwork capabilities, achieving significant pedagogical outcomes.

**Keywords:** Scenario-based Teaching; Forensic Biology; Educational reform

## 1. 背景学情分析

法医学是一门高度应用性的学科，而法医物证学是其重要分支，通过鉴定生物检材的成分和特性来证明案件事实<sup>[1, 2]</sup>。法医物证学课程理论内容难度大，抽象枯燥，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兴趣、有畏难情绪<sup>[1, 3, 4]</sup>。法医物证学课程实验内容主要是验证性的实验，重点培养基本实验技能，要求严格操作规范，杜绝差错，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训练，但不能从整体宏观上把握鉴定流程，对于独立思考能力和综合能力训练较差。另外，对于传统的教学评价，学生重考轻用，逻辑思维和实践技能较弱，职业认同感不足，进入基层实战工作后，发现无法迅速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sup>[1, 4-7]</sup>。因此法医物证学实验课的开展应突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近年来，各专业院校也围绕法医学人才培养做了一系列探索，开展多种注重实操的教学改革模式，包括虚拟仿真、虚拟现实+PBL 教学、模拟现场的情景教学等。新式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的改革更加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基础知识转化能力，为法医专业学生岗位胜任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形式<sup>[8, 9, 12, 10]</sup>。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模拟命案现场实践教学<sup>[6, 11]</sup>，虚拟仿真（VR）实验教学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sup>[6]</sup>。虚拟现场的优点是：案件场景更多样，重置场景只需在计算机进行简单操作，更高效，在专业学科的综合实验场景更具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虚拟现场初期的设备和技术投入较大，需有资金支持，难以普及，仅有少数院校应用<sup>[2, 13]</sup>。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有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PBL 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VR 技术结合 PBL 教学具有极强的情景性和仿真性，增强学生“沉浸式学习”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 PBL 教学质量。尽管虚拟仿真实验能模拟真实实验环境和操作过程，但它仍无法完全复制实验的真实感受和直观体验。

情境式教学 (situational teaching, ST)<sup>[2, 3]</sup>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具体场景使教学内容演化成直观体验的一种教学方法。情境式教学作为一种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授模式，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构建贴近实战的学习场景，深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探索的动力。这种模式将理论知识融入具体情境中，既能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知识内涵，又能引导他们在实践应用中深化认知，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衔接。同时，情境式教学注重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让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学会跨领域整合知识、主动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教学改革不仅能让学生更扎实、更灵活地掌握所学内容，更能从根本上推动教学水平向更高层次跃升，真正实现从“教知识”到“育能力”的转变<sup>[2]</sup>。

## 2. 情景模式教学前准备

教师应注重建立动态案例库，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具有代表性的司法鉴定实例，并依据教学目标的迭代及时更新教学素材，使模拟现场教学始终与行业发展保持同步。这种以情景模式教学，不仅能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更能通过情境化教学促进知识内化，实现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sup>[14]</sup>。案例的设计和选择要遵循科学的设计原则。首先，案例筛选应兼顾典型性、真实性与知识覆盖度，所选案例既要源于实际工作场景，又要系统涵盖教学大纲的核心知识点，特别是课程的重难点内容。其次，案例设计需构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通过创设模拟现场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以两种路径深化认知：既可依托典型案例开展实务操作，在验证教材理论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应用能力；也可通过模拟现场自主发现问题，经历“问题识别-理论溯源-方案构建”的完整探究过程，以此强化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 2.1. “\*\*案模拟现场”案情简介：

甄某（女，23岁，户籍\*\*\*\*，现住址\*\*\*\*，身份证号\*\*\*\*）于2024年6月7日夜死于出租屋内，甄氏弟/妹去找其姐索要生活费，到达其出租屋后，发现甄某死亡，随之报警。接报警现场发现一具女性尸体，脖颈处有绳索，室内有打斗痕迹，并展开现场勘验。

## 2.2. 场景布置：

设置 2 个布景，按卧室的布局放置简易家具（床、衣柜、桌子、椅子等），在床上放置模拟的卧位女性“尸体”一具（塑料人体模特）。现场生物物证设计：上课前由教师制备物证检材，按强奸案案发现场的特点放置多种生物学物证，包括血痕、精斑、毛发等。

## 2.3. 教学实施：

### 2.3.1. 现场勘验

将学生分成 7 组，每组 4~5 人，每组现场勘验时间为 40min，2 个场地同时进行。由学生自己进行现场勘验的分工，包括拍照、记录、提取送检人员、演员等，所需勘验和物证提取器材由教师提供，放置于现场勘验箱中，包括现场勘验记录、剪刀、镊子、手套、鞋套、帽子、防护服、比例尺、棉签、多波段光源仪、物证袋、标记笔、签字笔等现场勘验所需物品，由组长领取后分发给组员。到达案发现场后拉警戒线并划定现场勘验范围，进入现场开始勘验工作。

### 2.3.2. 未知斑痕检测

教师供可疑斑迹样本，包含可疑血痕、精斑、毛发。可疑血痕包含：血痕、酱油斑、番茄汁、铁锈斑。可疑精斑：精斑、牛奶、蛋清、果汁。提供可疑毛发：头发、狗毛、猫毛、人造纤维。

提供初检试剂耗材和仪器：血痕的预试验（联苯胺试验、鲁米诺试验）、确证实验（血色原结晶实验）、种属实验（抗人血红蛋白胶体金试纸）；精斑的确证实验（精子显微镜检出法）、种属实验（抗人前列腺抗原胶体金试纸）；光学显微镜毛发的形态学分析。

### 2.3.3. 案件流程设计

结束勘察后，学生对案件的生物检材写出检测流程，以检验其对案件处理流程的掌握情况。

## 3. 情景模式教学分析和总结

### 3.1. 教学评价

（1）学生对现场勘验和生物检材的发现、提取、包装和送检，这一过程由教师和学生评委进行评价。重点考查的知识点包括：①对现场出现的情况考虑是否周全，是否注意质量控制，检材提取、包装送检过程中戴手套、帽子、鞋套的佩戴；能否全面的提取物证：比如现场的烟蒂、水杯、指甲内的生物检材等；②提取检材的方法是否合适，如受害人颈部的绳索是否整件提取等注意事项；③检材是否单独包装防止污染，编号与检材是否一一对应；

（2）学生对检材的送检、接收、实验室检验、检测流程报告由授课教师进行评价，通过学生填写相应表格、记录，对实验操作（未知斑痕检测）是否规范以及检材检测流程是否科学、规范、完整等进行综合评价。考查的知识点包括：①未知斑痕检测中：种属实验试纸阳性/阴性对照设置完备性，可疑精斑检测无精样本如何处理；②结果分析中：什么是混合斑？混合斑检验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最后，教师基于模拟现场观察记录，首先对各组的共性操作失误和常见错误开展反馈，通过典型案例回放与操作流程拆解，系统分析失误、错误。在此基础上针对性解析规范操作要点与典型失误、错误间的问题原因，运用对比教学法同步强化正确操作模式的程序性记忆，使学生从失误、错误中建立理论知识向鉴定技能的转化，最终形成规范化操作认知体系。该闭环反馈模式不仅实现操作经验的理论升华，更通过认知冲突的主动建构，有效达成教学大纲要求的深度理解与技能内化目标。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以期达到会寻找、会取证、会固定、会提取、会分析的目的<sup>[2]</sup>。

### 3.2. 学生反馈

课后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情景模式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收集了 20 级法医班问卷 31 份，调查结果见表 1。学生在评价法医物证学情景模式教学时，这种授课方式认可度高，提高了学习兴趣，教学难度适中，互动性好；有少数同学认为内容相对简单，学生们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这样的课程中。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针对不同认知层次的学生群体，应有有针对性地

增强案例的挑战性。

表1 法医物证学情景模式教学学生问卷

问题	选项(占比)	选项(占比)	选项(占比)	选项(占比)	选项(占比)
你对课程的内容满意度如何?	非常满意 (93.55)	满意 (6.45)	一般 (0.00)	不满意 (0.00)	非常不满意 (0.00)
你觉得课程的难度如何?	太简单 (6.45)	适中 (77.42)	有点难度 (16.13)	非常困难 (0.00)	
你觉得课程的节奏如何?	太快 (6.45)	适中 (90.32)	有点慢 (3.223)	太慢了 (0.00)	
实践操作清晰易懂吗?	非常清晰易懂 (80.65)	比较清晰易懂 (3.23)	一般 (0.00)	有点晦涩 (0.00)	非常晦涩 (16.13)
你觉得课程的实用性如何?	非常实用 (80.65)	比较实用 (16.13)	一般 (3.23)	不太实用 (0.00)	完全没用 (0.00)
你对老师的授课方式满意吗?	非常满意 (93.55)	满意 (6.45)	一般 (0.00)	不满意 (0.00)	非常不满意 (0.00)
你觉得课程的互动性如何?	非常好 (93.55)	好 (6.45)	一般 (0.00)	不太好 (0.00)	很差 (0.00)
你觉得课程中的情景教学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	非常有帮助 (96.77)	有帮助 (3.23)	一般 (0.00)	没什么帮助 (0.00)	完全没帮助 (0.00)
你觉得课程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	非常合理 (87.1)	合理 (12.9)	一般 (0.00)	不太合理 (0.00)	完全不合理 (0.00)
你对课程的学习收获满意吗?	非常满意 (96.77)	满意 (3.23)	一般 (0.00)	不满意 (0.00)	非常不满意 (0.00)
你觉得课程的资料和资源是否丰富?	非常丰富 (90.32)	丰富 (9.68)	一般 (0.00)	不够丰富 (0.00)	不丰富 (0.00)
你对课程的组织架构满意吗?	非常满意 (96.77)	满意 (3.23)	一般 (0.00)	不满意 (0.00)	非常不满意 (0.00)
你觉得课程的练习安排是否充分?	非常充分 (93.55)	充分 (6.45)	一般 (0.00)	不够充分 (0.00)	不充分 (0.00)

### 3.3. 局限和反思

受学时和仪器的限制：学生没有对自己所提取检材进行遗传标记检测，形成完整的鉴定意见书。增加对遗传标记检测、鉴定报告撰写的内容，将会使过程更加完整。

教师资源不足：对整个现勘分组进行过程性评价，需要每组有至少两名教师全程参与，增加学生互评，可缓解教师不够的压力。

案例多样性不足<sup>[2, 15]</sup>：目前只设置了一个模拟情景，未来应增加情景模式教学案件的多样性。教师要时刻关注该领域的国内外应用和科研状况，并且经常向一线的公安学习交流及时发现新的典型案件并进行整理归纳保持情景式教学中的案例资料常换常新，情景的设计布置中注意突出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内容，避免程式化<sup>[14]</sup>。

鉴定流程的完整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鉴定结论形成环节应当给予学生充分的分析思考时间。首先，学生应当通过自主分析、文献查阅、相关规范的查询、小组讨论及教师指导等多种途径独立完成鉴定过程；其次，在得出初步结论后，应当组织集体汇报与讨论环节，由教师进行针对性提问和点评，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同时鼓励同学之间提出不同见解，开展互动讨论。这样的流程设计不仅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更能有效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责任意识以及专业素养，实现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该方教学法适宜放在学期末，法医物证学课程的主要内容都已学完，学生已完成知识结构的

系统化建构，具备开展综合实践的先备条件。在情景模式中使学生认知经验、共享经验，并在其过程中扩大学生社会认知的知识面以及激发学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愿望和相关能力。

## 4. 小结

法医学专业的学科特殊性，能直接参与实际检案的机会较少，学生只接受理论知识而无法深入现场进行实践活动，使学生不能系统地理解并实践理论<sup>[15]</sup>。因此，如何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sup>[4]</sup>。情景模式教学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借助情景式教学模拟案件现场，增强学习体验，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实现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转化，有良好的教学效果<sup>[2]</sup>。第一，引入情景模式教学，采用模拟案件现场的方法，使学生身临其境，主动带入角色进行探索，主动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习的积极性<sup>[4]</sup>。第二，情景模式教学，按照实际法医检验程序设计和实施，从检材的发现、检材的提取包装送检、实验操作、检测流程，使学生对过去学习的理论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操作，分析解决不同情境中的实际问题<sup>[4]</sup>。教学评价涉及整个教学过程，不仅重视实验操作的过程性评价，而且关注结果及证据的解读，实现对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第三，在整个课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检验、分工协作的能力，认真仔细的责任心，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增强学生对法医职业的认同感。第四，法医物证实验课一般是小班授课，更适合情景模式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全面加强实践检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符合我们的培养模式为“早实践、多实践、反复实践”。通过情景模式教学希望可以培养专业水平较高、应用型的高素质法医专业人才。

## 参考文献：

- [1] 张璐.法医物证学实验课实战式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广东公安科技,2012,20(04):10-12.
- [2] 王启燕,李明超,任峥,等.模拟现场在本科法医物证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上旬刊),2021,(01):71-73.
- [3] 郭飞,宋立渠,张龙年.法医物证学情境模式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思考[J].中国法医学杂志,2016,31(06):659-661.
- [4] 王亚丽,顾捷,周圆圆,等.法医物证学实践性、综合性实验教学设计初探[J].法医学杂志,2019,35(04):472-473.
- [5] 柯技,王树法,邱照.公安院校法医学课程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J].法制博览,2021,(09):172-174.
- [6] 马陈骏,谭勇,张清华.日本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借鉴[J].法医学杂志,2024,40(03):284-290.
- [7] 侯一平,云利兵,诸虹,等.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9,21(02):84-88.
- [8] 洪亮,李怀斌,叶明全,等.虚拟仿真技术在法医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21):106-107.
- [9] 李开,陈峰,袁艺标,等.基于 PBL 模式的法医实验课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9,(23):265-266.
- [10] 叶懿,陈帆,王勇庆,等.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法医现场实践教学[J].基础医学教育,2020,22(11):843-845.
- [11] 朱英,李永国,赵敏珠,等.模拟现场教学法在法医物证学实验课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医药卫生,2019,35(07): 1092-1095.
- [12] 朱永生,周雅婷,寻兮,等.基于 VR 技术的 PBL 混合教学模式在法医物证学教学中的探索[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3,37(04):433-437.
- [13] 尚艳杰,吴超,张祥彦,等.“互联网+教学”应用于法医学教育改革的思考[J].检验医学与临床,2022,19(02):277-279.
- [14] 刘泉.“案例—学导教学法”在公安法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6,29(06):116-121.
- [15] 霍塞虎.公安院校法医物证学情景模拟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06):1162-1165.

# 新文科背景下设计思维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中的应用

要彬<sup>1</sup>, 杨耀武<sup>2</sup>

(<sup>1</sup>天津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天津 300387; <sup>2</sup>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天津 300387)

**摘要:**“新文科”理念旨在推动传统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转型升级，倡导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不仅为新时代高校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美术作为一门兼具综合性与交叉性的学科，对于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作为培养未来美术教师的主阵地，需要进行教学变革以顺应时代需求。设计思维强调以人为本，旨在探寻问题解决的新方式。设计思维的介入预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为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与新内涵，为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美术教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新文科；设计思维；高校美术教育专业；跨学科

##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 the Art Education Majo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Yao Bin<sup>1</sup>, Yang Yaowu<sup>2</sup>

(<sup>1</sup>College of Fine Arts & Desig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sup>2</sup>Faculty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ew liberal arts" aim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dvocat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hich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s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al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As the main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future art teachers, the art education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Design thinking is human-centered and aims to find new ways to solve problems. The interven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dicate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 new path and new conno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art teach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design thinking;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

## 1. 引言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委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将“四新”建设推向系统化实施阶段。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新文科理念的兴起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转型。这一转型不是简单的学科交叉或技术更新，而是从认知的角度对传统人文学科进行系统性的重构。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新文科的建设既是对学科固化的突破，也是对人文教育理念的诠释，进而引发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

高校作为学生构建应用型知识体系的重要场所，需要发挥其应有的责任。特别是美术教育专业，更要以实践为基础，挑起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科学技能人才的重担<sup>[1]</sup>。艺术学科是人文学科中对“人的要素”最为坚守的学科，以创造想象力和满足人内在情感需求为发展动力。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美术教育专业视角审视人文素养的发展，对于艺术教育的转型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2. 新文科视角下的高校美术教育专业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新文科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知识传授范式的转变。以往的人文学科教育通常将知识划分为独立的学科体系，遵循线性的知识学习路径。然而，未来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已经从单一学科的知识掌握转向为具有综合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新文科的建设方向已经在“跨学科”的基础之上向“超学科”的方向发展。所谓“超学科”，是在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上协调教育系统中的所有学科和交叉学科<sup>[2]</sup>。新文科的构建将打破学科知识的产权边界，强调在真实问题情境中重构知识网络。新文科正是一座横跨学科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力图实现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有机统一。这种转变要求教育者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认知的引导者，其核心使命不再是传授既定的学科内容，而是培养学习者构建跨学科学习和多维度认知的能力。

贯彻新文科理念有助于美术教育专业打破学科壁垒。美术教育正处于人文性与技术性并存的张力之中，其面临着以技术训练为主的技术主义倾向和以理论学习为主的理论主义倾向。然而，新文科的建设可以充当平衡两种倾向的角色，将促进美术教育专业与“大艺术”观的契合。第一，超越艺术技巧训练，重视内在人格的涵养；第二，超越艺术作品观赏，强调人生层面的阐释；第三，凝铸审美情感之大爱，培养博爱之心<sup>[3]</sup>。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重塑人类认知方式的背景下，新文科的建设面临着“技术宰制”与“人文困境”的双重挑战。这要求新文科理念下的美术教育要培养学生无法被机器替代的能力，将过去培养目标中的“专业能力”转化为“多重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思维能力、审美能力、跨学科能力和教学能力。新文科理念既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科技文明的简单迎合，而是对人文教育本质的重塑。这种重塑既需要打破学科制度的路径依赖，更需要在变革中守护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当美术教育跳出技法传承的窠臼，真正成为培养“完整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时，新文科理念的深层价值才得以彰显。

## 3. 新文科理念与设计思维的共通

当前，知识生产模式日新月异，让新文科理念与设计思维产生了密切关联。这两个理论共同指向突破学科边界的跨学科认知框架。在该框架中，美术教育的转型升级不再是被动的适应性调整，而是主动的认知变革。设计思维是一套关于创新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体系，包括调查研究、量化分析、头脑风暴、群智创新等，有助于人们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它也是一个集定义问题、解决问题、评估结果为一体的整体分析和创造的过程。设计思维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论，更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是人的知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现实问题的联结来完善人们的知能结构。因此，设计思维是新时代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发挥设计与思维的双螺旋结构的作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sup>[4]</sup>。在新文科建设中，同样把“创新”作为根本导向，突出知识生产的原创性，强化对“人”认识的深刻性，把“融合”作为核心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因此，以人为本，以创新为导向，跨学科、

综合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即为新文科与设计思维的共通之处<sup>[5]</sup>。新文科理念与设计思维都指向对传统知识认知模式的突破。二者都将知识生产视为持续的建构过程。新文科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构建认知系统，通过构建跨学科的学习框架来突破学科边界。设计思维是以问题为导向并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发展演化<sup>[6]</sup>，跨学科知识整合提供了方法。二者的共识表现为从“正确答案”导向转为“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性”的培养。将知识生产从学科规训中解放出来，建构起基于问题域的弹性认知框架。

新文科理念与设计思维的共通，正在触发美术教育专业的范式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涉及教学方法的改良，更指向艺术教育知识生产模式、价值评判体系与认知结构的根本性重构。设计思维已超越工具性应用层面，日渐成为推动美术教育专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设计思维融入美术教育专业，是将设计思维的理念、过程、方法以及技术工具具体落实到课程与教学中，是对美术教育专业的重构<sup>[7]</sup>。

## 4. 设计思维应用于美术教育专业的价值

设计思维作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能力，将其引入美术教育专业中正是对于新时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回应，也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对于人才需求的呼应，其价值如下。

其一，教育范式转型。传统美术教育的知识生产遵循“技法传承-风格演进-理论阐释”的线性逻辑，这种学习逻辑使得美术教育专业知识局限于绘画技法与教育理论中难以自拔，使得专业知识不能与现实相结合。这种循环往复的再生产机制，使专业教育长期困囿于绘画技法与教育理论的二元论框架，形成与社会现实脱节的封闭系统<sup>[8]</sup>。这种基于学科规训的知识体系在新文科语境下面临转型发展的需要。设计思维通过问题导向、原型迭代、反馈评价等实践过程，重构美术教育的认知框架，使技法训练服务于现实问题解决，理论教育对接社会实践需求，推动美术教育从教技传授转向认知提高。

其二，复合型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渗透，使艺术创作从个体表达转向系统创新，要求学生要具备审美判断、技术理解、文化洞察与跨界整合能力。设计思维强调的“同理心洞察”“系统思考”“原型验证”等方法论，构建起连接艺术直觉与技术理性、文化传统与当代语境的认知桥梁。通过培养学生定义复杂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美术教育真正回应数字时代对“艺术+科技+人文”复合型人才的核心需求。

其三，知识生产模式转变。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学科壁垒，而设计思维为美术教育提供了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论工具。其“可视化思维”“迭代创新”“用户体验”等核心要素，能够有效串联艺术本体研究与计算机科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知识流动。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艺术介入社会创新、智能媒介艺术创作等前沿领域，设计思维驱动的跨学科协作机制，使美术教育突破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艺术为体、科技为用、人文为魂”的立体化知识生态系统。

其四，强化美术教育社会价值。设计思维将美术教育从技法与教育理论的单一循环中跳脱出来，发挥其社会价值。例如，通过“社会创新设计”“参与式艺术实践”等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关注老龄化社会的审美需求、乡村振兴的文化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现实命题。这种价值转向使艺术教育超越个体创作范畴，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创造性力量，在文化传承、技术伦理、公共福祉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验证艺术的社会效能。

## 5. 设计思维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中应用的实现路径

### 5.1. 重构知识生产体系

学科价值决定着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不同的学科价值取向生成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经打破“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知识创新逻辑。知识生产和创新知识的价值取向在于发现和应用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用来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sup>[9]</sup>。有学者提出，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基于应用性逻辑，以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为服务取向，以弥补科学研究和社会决策中间的知识鸿沟。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则指向了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性的生活世界<sup>[10]</sup>。因此，美术教育专业的知识生产要面向现实社会，发挥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

设计思维需要通过项目实践得以验证。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主题需要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中<sup>[11]</sup>。因此，设计思维的引入，需要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机制和以项目化学习为依托的实践模式，推动美术教育从封闭的学科知识再生产转向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构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目的在于建立美术教育专业课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将学习成果进行创新性转化，服务于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知识学习的目标。在美术教育专业中，实施项目化学习是一系列集合问题导向、情境创造、学科交叉、实践应用等特征为一体的综合化学习模式。在课程体系设计中，首先注重学习问题的引导。例如，关注艺术本体的认知重构，如数字媒介时代的造型语言嬗变；关注文化传承命题，如非遗活态化传承的视觉转化；关注社会创新需求，如老龄化社会的公共艺术介入。这些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实际问题使得专业知识的学习从固有的知识框架中跳脱，转向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同时，这些问题均是跨学科知识流动的载体，使学科知识自然融入专业学习，实现知识传授向认知建构的范式转换。其次，问题情境的创设需要虚实结合，模拟现实困境与建构实践场景，使专业知识在具体语境中获得实际意义。再次，开展具有实践性的学习活动，将目标清晰的学习问题转化为实践的最终成果。在实践活动中，主动运用多学科知识，体悟其在实际过程中的自然运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质量。

## 5.2. 创新教学方法论

新文科理念指导下的美术教育专业教学变革，需要突破“教师中心-学生模仿”的传统模式，建立支持自主认知建构的教学方法论体系。这种变革本质上是教学方式从知识传递向自主认知的转变，设计思维在此过程中发挥认知脚手架功能，通过结构化工具与流程设计，培育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与创新思维品质。这种转型包含两个关键维度。

第一，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设计思维教学法的理念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发展学生的设计思维模式。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设计思维有利于促进高阶思维的发展，其中包括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sup>[12]</sup>。设计思维的引入，重点是要通过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来促进对于美术教育专业的学习。因此，教师需要改变其教学认知方式，明确自身为教育的引导者。在项目化的学习过程当中引导学生去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培养思维能力。教师要善于运用思维可视化工具，帮助学生将艺术直觉转化为可操作的认知框架，实现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的交互增强。思维可视化工具包括传统的便利贴、白板等，通过学生在这些工具上将学习问题、想法、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分享，记录学生的思考过程，有利于促进思维的反思和优化解决方案。最后，构建反思性实践循环系统。将设计思维中的迭代机制转化为教学反馈节点，通过阶段性评审与过程档案记录，使创作实践成为显性化的认知发展轨迹。

第二，设计跨学科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建设是专业发展的核心。美术教育在设计思维的引领下，需要构建跨学科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建设需要从知识选取、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特别是要融入跨学科的内容。以美术教育核心需求为导向，运用设计思维，注重学科课程建设中知识与思维的深度融合<sup>[13]</sup>。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提高科学相关内容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占比，构建“美术+科学”的课程体系，以跨学科教学的方式来激发学生艺术思维、科学思维等多方面思维的全面发展。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对于设计学科的影响甚大，对于美术教育而言也同样值得重视。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方法，领会其在激发绘画创意、理解教育理论、建设虚拟课堂等方面的作用。

## 5.3. 建立跨学科实践场域

新文科的建设致力于构建学科共同体和学科集成体，其本质是学科之间的认知与知识的互动，对于重构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模式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该理念下，美术教育应建立专业联动发展机制，突破学科边界，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这就需要以设计思维为依托，建立跨学科的学习场域。这种场域具有空间弹性大、主体多元、知识流动性强等特征。最为典型的学习场域为“文科实验室”。

新文科理念下的文科实验室具有跨学科、网络智能化、应用领域广、体系化设计、平台智能化等特征。文科实验室的建设重点在于建立“专家+学者+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来开展科研活动<sup>[14]</sup>，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网络化的知识生产节点。顺应新文科建设内在逻辑的

文科实验室，将重构传统画室的属性。教学的地点不再仅限于画室，而是在实验室内通过利用新技术，发挥多学科的优势来进行学习。特别是综合类大学，要充分发挥校内多学科的优势，积极搭建学科之间的合作学习机制，鼓励多学科、多专业的学生合作学习、开展研究。美术教育专业在文科实验室内与计算机专业合作，不仅是学习AI智能工具的使用，掌握AI智能工具的运用逻辑，更重要的是提高对于AI教学的认知水平，培养技术批判性思维；与历史学专业相合作，将美术史置于整个人类史当中进行横向排列，突破美术史线性的叙事方式，理解美术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文化促进作用；与人类学专业相合作，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促进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新文科实验室的深度发展，将是对美术教育专业的重塑。这种转型不仅培育出具有跨学科视野的创新人才，更在知识生产层面形成“艺术+科技+人文”的认知共生体，使美术教育成为综合性的多学科载体。在人工智能重塑人类认知范式的时代，这种基于学科共同体的教育创新，为艺术保持人文温度与技术理性间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发展案例。这种跨学科融合实质是美术教育认知体系的重构过程。传统画室单一的技能训练，被实验室多维度的学科合作逐渐取代。这种培养方式，使美术教育突破形式美学的范畴，升华为培育文化认知与创新思维的系统工程。

#### 5.4.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新文科理念与设计思维的结合，需要建立多维度的教学评价体系。学生的学习发展是高校教学评价的目的和归宿，教学评价的目的应不局限于对学生进行考核，更多的在于激励，通过合理的教学评价来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sup>[15]</sup>。结合斯坦福大学的设计思维方法，将发现、解释、构思、体验、进化五部分充分转化，使美术教育专业的教学评价以学习过程、学习结果、思维与能力发展、认知转变这四个评价方式为重点，贯穿整个学习活动<sup>[16]</sup>。

传统美术教学的过程评价多聚焦技法训练进度，而融入设计思维后，评价重心转向创作认知的演化逻辑。例如，在素描基础课程中，评价维度需突破造型准确性的单一标准，转而追踪观察方式的转变过程：如何从机械摹画转向结构解析，从视觉复制升维至空间想象；在色彩学习中，记录学习前后色彩运用方式，分析色彩运用决策过程，使隐性的艺术思维获得显性化呈现。这种过程评价不仅有助于教学了解学生的绘画能力的提高，更着重评估学生是否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绘画认知提高的意识。

设计思维导向的成果评价需突破传统作品评价的审美闭环，注重艺术本体与社会效能之间的联系。例如，在油画创作课程中，评价标准既要考量色彩语言的创新性、笔触表现的情感张力等艺术维度，也需检验作品是否承载有效的社会议题介入，能否引发文化反思或情感共鸣。这种评价模式推动学生超越技法完善的表层追求，在作品创作中自觉平衡形式探索与文化表达，使艺术作品既保持审美独立性又具备现实对话能力。评价中通过关注学术作品中的观念突破点、技术融合度、文化转译效能等要素，量化绘画创新的综合价值。

思维维度聚焦艺术思维范式的结构性转变，通过解构创作过程中的认知操作，评估学生是否形成可持续进化的思维框架。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运用思维可视化工具记录学生从灵感捕捉到方案落地的决策逻辑，分析其如何平衡感性直觉与理性分析，如何整合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绘画语言。评价重点包括：跨媒介转换中的系统思维能力、文化语境解读中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技术伦理抉择中的价值判断能力。通过阶段性思维自评量表，追踪学生从形式创作者向文化解读再向社会问题解决的认知转变，使思维发展可视化成为可能。

认知维度核心在于关注学生思维方式的变化。重点关注学生能否构建起融合艺术表达、教育方法与社会现实的多维度认知框架。这需要考察学生对艺术概念的理解与关联能力，审视其认知观念如何从关注学习绘画技巧，转向培养艺术思维培养、关注教育现状以及回应社会需求的综合素质发展。

### 6. 结语

新文科理念所倡导的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在设计思维的方法论框架下获得实践路径。美术教育突破传统画室的空间局限与师徒传承的认知边界。项目化学习方式、文科实验室的虚实交融场域、跨学科团队的协同创新机制、四维联动的评价体系，共同促进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科发展。面对人工智能新技术对艺术领域的持续冲击，设计思维为美术教育提供了坚守人文温度的方法论

保障。它既不是对技术理性的盲目追随，也非对传统价值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创新实践中冀求的动态平衡。其核心使命始终清晰：培养能够以艺术思维破解复杂问题、以人文关怀引导技术应用、以文化自觉参与文明对话的新时代艺术人才。这种教育范式的创新，不仅为美术教育注入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更在新文科建设的宏大图景中，勾勒出艺术学科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 [1] 杨思华,李玉福.新时期高校美术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探析[J].美与时代(中),2022,(01):91-93.
- [2] 吴聪.新文科背景下设计思维引导设计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包装工程,2022,43(S1):341-347.
- [3] 王潇宁.丰子恺“大艺术”观审美超越性质与现代启示[J].艺术研究,2023,(03):47-49.
- [4] 林琳,沈书生.设计思维的概念内涵与培养策略[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6,(06):18-25.
- [5] 吴聪.新文科背景下设计思维引导设计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包装工程,2022,43(S1):341-347.
- [6] 陶金元,陈劲.设计思维创新：发展演化、过程机制与实践原则[J].科研管理,2024,45(05):43-55.
- [7] 王志军,严亚玲.设计思维如何指导教学创新？——项目化学习设计的视角[J].开放教育研究,2023,29(01):26-36.
- [8] 张永康.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教育科学,2022,38(05):91-96.
- [9] 白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逻辑[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40(06):52-59+121.
- [10] 郭晓丽,孔照胜.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大学学科建设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09):8-12.
- [11] 林琳,沈书生.设计思维与学科融合的作用路径研究——基础教育中核心素养的培养方法[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05):12-18.DOI:10.13811/j.cnki.eer.2018.05.002.
- [12] 林琳,董玉琦,沈书生.设计思维教学法的理念框架与支撑技术[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04):73-82.
- [13] 朱郁闻.高等艺术教育“艺科融合”的逻辑、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J].江苏高教,2024,(04):94-99.
- [14] 孟天广,严宇.文科实验室：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02):21-30+157.
- [15] 卢婧.我国高校教学评价的现状及未来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36(10):83-86.
- [16] 张应韬,单琳琳.新驱动：设计思维的发展赋能与教育实践[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3,(01):61-71.

# AI 技术驱动的环境艺术设计“岗课赛证”融合模式研究

王姗<sup>1\*</sup>

(<sup>1</sup>焦作大学 艺术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地驱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变革,高职教育也在向智能化、数字化与可持续化转型。面对行业智能设计工具普及率数字化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当前地方高职院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仍存在部分课程脱节、教学资源较滞后、教师及学生对AI技术的应该不够深入和广泛等问题。本文基于政策导向与行业实践,提出AI赋能的“虚实融合”实训路径,通过VR/AR、生成式AI等技术构建仿真工作场景,并依托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1+X认证实现“赛证融通”。研究显示, AI在竞赛训练中可优化学生的手绘设计表现、同时大大的提高了施工图绘制及版面的整体布局效率,强化“人机协同”能力;师资转型需通过多学科团队、技术培训及制度保障,向“技术赋能型导师”角色演进。最终, AI技术将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 环境艺术设计; 虚实融合; 产教融合

##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i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Driven by AI Technology

Wang Sha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Arts, Jiaozuo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t and design major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lso transition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digit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Face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rate of intelligent design tools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emerging digital field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nvironmental art and design majors of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disjointed courses, lagging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AI technology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virtual real integration" training path empowered by AI based on policy guidance and industry practice. Simulation work scenario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echnologies such as VR/AR and generative AI, and "competition certification integr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and 1+X certific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AI can optimize students' hand drawn design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 training, while great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ayout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drawing and layout,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staff requires the evolution toward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empowered mentors"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technical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Ultimately, AI technology will 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employment, and serv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43 -

作者简介: 王姗(1988-)女,河南焦作,博士,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及教育

通信作者: 王姗; 通信邮箱: 329485988@qq.co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Virtual real fus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 1. AI 驱动教育变革的必然性

### 1.1.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面临行业变革与教育挑战

环境艺术设计行业正经历由智能化、数字化、可持续化驱动的深刻变革。据最新数据显示，智能设计工具在行业内的普及率已突破 67%<sup>[1]</sup>，其中参数化设计、AI 辅助方案生成，MidJourney+CAD、VR/AR 沉浸式渲染 Enscape、Lumion 等技术已成为企业招聘的核心技能要求。同时，随着空间设计、数字孪生建筑、低碳智能景观等新兴领域的崛起，行业对复合型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

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仍存在结构性脱节问题：78%的院校课程尚未系统整合 AI 设计模块<sup>[2]</sup>，实训内容仍以传统手绘、静态建模为主，缺乏对智能设计流程、数据驱动决策、跨平台协作等关键能力的培养。此外，师资队伍的技术更新滞后，仅 32%的专业教师具备 AI 工具教学能力<sup>[3]</sup>，导致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严重错位。

在政策层面，国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2025）》明确提出“推动 AI 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并鼓励院校构建“岗课赛证”一体化培养体系。这一政策导向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撑，但如何落地实施，仍面临课程重构难、实训资源缺、评价体系旧等现实挑战。

### 1.2. AI 赋能的必然性路径：虚实融合与智能认证的协同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向“虚实共生、学用一体”的模式转型。在实训层面，AI 通过 VR/AR、数字孪生、云端协同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行业工作场景<sup>[2]</sup>，如虚拟工地勘测、智能家居交互设计、元宇宙展厅搭建等，不仅突破了传统实训的时空与资源限制，更通过接入企业真实项目数据，让学生在“做中学”中掌握智能设计工具的应用逻辑<sup>[4]</sup>。这种虚实融合的实训模式，使学习过程与行业实践深度绑定，有效弥合了教育与就业的鸿沟。

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也需要设置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的课程，虚拟交互空间设计。课程容围绕虚拟场景空间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展开，包括虚拟场景的概念、分类、设计原则，以及三维建模、材质贴图、灯光渲染、交互设计等核心技术，同时融入对不同应用领域的虚拟场景特点的分析。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三维建模软件，以及 Unity、Unreal Engine 等实时渲染引擎的专业操作技能。系统研习虚拟场景空间的构图原理、色彩理论体系与光影表现技法，深入探究用户体验设计与场景功能实现的协同机制，构建完整的虚拟场景空间设计知识与实践体系。通过系统学习，使学生具备独立完成虚拟场景从创意构思到最终呈现的全流程设计能力，能够根据不同需求打造富有沉浸感和艺术性的虚拟空间，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意识，为其在数字艺术、虚拟现实等领域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sup>[5]</sup>。

在评价体系方面，AI 驱动“赛证融通”机制的智能化升级，通过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全国室内设计技能大赛、1+X 职业技能认证等赛事与课程考核动态挂钩，构建“学习—竞赛—认证”的闭环反馈系统<sup>[6]</sup>。AI 算法可实时分析学生的竞赛表现与认证成绩，生成个性化的能力提升建议，使人才培养始终与行业技术演进同步。

这两大路径的协同推进，形成了“虚拟实训夯基础—真实项目强应用—智能认证验能力”的完整赋能链条，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更确保了人才输出的精准性，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范式。

## 2. AI 赋能竞赛训练的创新路径

基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核心理念，AI 技术正深度重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竞赛培养体系。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历年获奖作品，AI 可精准提炼构图、色彩等评分要素规律，并结合生成式 AI 模拟“碳中和主题展厅设计”等前沿命题，构建虚实结合的竞赛训练环境。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环境艺术设计赛项中，AI 技术为传统手绘技法注入了创新动能。在 2

小时的手绘竞赛环节，学生在平时的练习时可借助 AI 工具实现设计构思的快速迭代与优化：通过草图智能识别技术，将手绘线稿实时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底图，运用风格迁移算法，即时生成写实、马克笔等不同表现风格的方案变体，结合生成式 AI 快速产出多版设计衍生方案，极大拓展创意可能性。这种“手绘+AI”的协同工作模式，既保留了手绘的艺术表现力，又融入了智能技术的效率优势，要求选手在保持扎实手绘功底的同时，具备智能工具的应用能力，体现了数字化时代环境艺术设计人才“传统技艺与新技术融合”的培养方向，完美契合大赛“考查学生创新思维与技术应用能力”的竞赛宗旨。AI 评委系统依托决策树分析提供实时修改建议，使备赛过程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有效提升学生应对行业真实项目的能力。

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环境艺术设计赛项的“效果图与施工图绘制”模块中，AI 技术显著提升了竞赛效率与作品质量。在 CAD 制图环节，任务 2-1 至 2-3，AI 智能插件可自动识别手绘草图并生成规范化的平面图、顶面图初稿，通过参数化工具快速优化空间布局；构造节点绘制中，AI 材料库能智能推荐符合地方规范的标准节点做法，并自动生成三维构造详图；主材清单，任务 2-3



图 1：高职组“环境艺术设计”方向赛题构架图

制作时，AI 系统可基于设计风格自动匹配推荐材料组合，实时核算用量与成本。在效果图制作，任务 2-4 阶段，选手运用 AI 渲染引擎，输入 CAD 模型后即可获得多角度光照模拟效果，通过风格迁移技术快速呈现写实、手绘等不同表现风格，大幅缩短传统渲染耗时。AI 工具的应用使选手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创意设计而非技术操作，符合大赛“考查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的评分要求，同时通过智能合规性检查确保图纸质量，体现了“人机协同”的新型设计人才培养方向。

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环境艺术设计赛项的模块三，参赛选手运用图形图像后期处理、文字处理等软件，合作完成任务 3-1. 编写 600 字以上设计总说明，包括设计依据、主题表现、设计构思、创新亮点等；这里 AI 技术就可以很好的帮助选手根据重点概念、灵感来源来提前准备设计说明，AI 大模型技术有效的帮参赛选手节约了组织语言及文字的能力，甚至是根据图形的排版上也可以有效的进行前期的删选，大大提高了作图的效率。

AI 技术驱动的设计竞赛可以提升职业院校师生技术技能水平、培育工匠精神为宗旨，培养具备行业特质、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综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 3. AI 赋能的师资转型策略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当然也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对于设计专业的教师更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 AI 技术给课程和设计带来的变化。但目前在高职教育中还是有部分老师缺乏智能化的教学经验，甚至是年龄较大老教师对 AI 技术的操作不熟练，无法运用 AI 工具辅助教学，这都需要用系统性的培训和实践来改变。

为应对 AI 技术带来的变革，地方高职院校需构建多维度师资转型策略。首先要强化技术应用与操作，可以建立工作坊、虚拟实训室等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可以到工作坊、实训室实践操作，另外鼓励教师参加信息化教学比赛同时组建多学科融合的教学团队，教师之间可以交流经验，同时老中青的教学团队既提升了教学经验又将新的 AI 技术应用了教学。此外，学校管理层应完

善制度保障，制定配套政策、配备专业技术维护人员，并为教师提供持续的组织支持，以减轻其技术应用的后顾之忧<sup>[7]</sup>。

高校教师的角色将向“技术赋能型导师”转型，其核心能力体现在智能化教学设计、动态学习数据分析及人机协同教学等方面。教师需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将AI工具融入课程开发、评价反馈等环节。同时，高校需推动“技术—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鼓励教师通过产学研合作探索AI教育创新应用，最终实现教学质量提升与教育公平的双重目标<sup>[8]</sup>。这一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教育理念的重构，需要教师、学校和社会协同推进。

## 4. 结语

AI技术驱动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坚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局面。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AI技术的驱动下深化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引领环境艺术设计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模式的不断创新；满足本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要；达到检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展示职业教育改革成果的目的。

人工智能时代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培养具备“新质生产力”能力的人才提供更大可能<sup>[9]</sup>。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中教师可以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传统课程体系融合，教学中师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感受及经验，建立起全新的学习支架和知识链，从而更好的体现服务学生、提高学生知识及能力等多维发展的核心素养，通过智能导学系统等，促进大规模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勇敢地应对不确定世界和高效地服务社会生产，实现全面发展的理想。

AI技术驱动可以帮助大赛项对应行业设计师与设计员职业岗位。以实际工程项目为比赛载体，把行业的真实工作过程、任务和要求融入比赛环节。推进和实现学校实践教学与企业生产实际无缝对接。对环境艺术设计行业的前期草案设计，方案图、效果图、施工图绘制职业岗位能力。大赛标准对接行业规范和标准、企业用人要求，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满足产教协同育人目标，引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 参考文献：

- [1] 彭反霸等. 人工智能大模型对设计企业的影响[J]. 中国勘察设计, 2024(06).
- [2] 陈虹宇等. 新文科语境下环境设计专业“多维重构”实践课程体系探索[J]. 建筑与文化, 2025(04).
- [3] 李延峰. 基于岗位需求的高职网络课程体系优化与重构技术研究[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5(03).
- [4] 王钰演.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博物馆室内交互体验设计[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25(05).
- [5] 焦作大学艺术学院 2025 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5.
- [6] 李琼. 混合式教学过程性评价体系重构与实证研究——以《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J]. 2025(02).
- [7] 封顺. 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的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02): 142-143+147.
- [8] 王华璐. 智能技术时代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发展路径研究[J]. 大众文艺, 2025(04): 205-207.
- [9] 高盼望, 路书红.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概念重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05(06): 50-60.

#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彭林<sup>1</sup>, 沈欣雅<sup>2\*</sup>, 张倩<sup>3</sup>

(<sup>1</sup>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设计与工艺美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00; <sup>2</sup>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25; <sup>3</sup>武汉东湖学院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12)

**摘要:**本文聚焦于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研究, 旨在探索提升教学成效的有效实践路径。此项研究选取不同民族的服饰色彩当作具体案例, 采用把理论分析同实证研究相互结合起来的办法, 以此来剖析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里呈现出的表现形态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机制。论文一开始便从相关概念着手, 清晰地阐述民族服饰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同时指出其在设计环节所具备的独特价值。随后依据理论分析所提炼出的指导原则, 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应用的具体原理。借助精心策划的实证研究, 精心挑选出典型案例, 运用问卷调查还有访谈这两种方式来收集相关的数据, 以此来检验理论的实际有效性, 进而归纳出相应的教学策略。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为优化教学设计提供了具体依据。论文对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总结, 同时也指出了当下研究当中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之处, 并且对未来的研究方向给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族服饰色彩; 创意设计教学; 实证研究; 教学策略; 文化传承

##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ostume color in creative design teaching

Peng Lin<sup>1</sup>, Shen XinYa<sup>2\*</sup>, Zhang Qian<sup>3</sup>

(<sup>1</sup>College of Design and Arts and Crafts,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00, China; <sup>2</sup>He Xiangn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Zhongka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25, China; <sup>3</sup>College of Media and Art Design, Wuhan East Lak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ethnic costume colors within creative design teaching,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route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s. The study takes various ethnic costume colors as cases, and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to uncover their modes of express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in creative design teaching. The paper starts by elucidat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ethnic costume colors and their unique value in design from a conceptual aspect. Then,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puts forward guiding principles and delves into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By means of meticulously designed empirical research, typical cases are chosen, data is gather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authenticate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y and compil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ifferent ethnic costume colors exhibit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their effectiveness in creative design teaching, offering specific ways to optimize teaching. The paper sums up the research outcomes,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 and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fu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s.

**Keywords:** Ethnic Costume Colors; Creative Design Teaching; Empirical Research; Teaching Strategies;

- 47 -

作者简介: 彭林 (1983-), 女, 湖南娄底, 硕士, 研究方向: 服装设计

张倩 (1992-), 女, 湖北武汉, 博士, 研究方向: 交互设计

通信作者: 沈欣雅; 通信邮箱: shenxinya20040803@qq.com

## 1. 引言

民族服饰色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在创意设计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色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服饰色彩凭借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质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所在。将其引入教学，既能丰富教学内容，又能促进学生理解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契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需求。设计教育应注重展现民族特色，以此驱动设计创新。开展服饰色彩研究，对促进文化传承和提升教学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种设计素材，它完全能够起到激发设计师灵感的作用，还能促使设计师运用多元化的手法去创作，进而培养起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自信心，让人们更加珍视那些本土的资源。所以说，深入探讨服饰色彩在教学当中的具体应用情况，这既是学术层面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领域里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sup>[1]</sup>。

尽管该领域所受到的关注有所提高，然而依旧存在着不少的挑战。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较为表面的层面，对于民族服饰色彩形成机制以及其在设计方面的应用往往缺乏那种更为细致且透彻的剖析，尤其是在实践探索环节，在教学以及案例研究当中，其系统性更是显得颇为不足。跨学科融合方面做得不够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能够达到的深度以及所能涉及的广度形成了限制，就好比现有的相关研究常常会被局限在单一的某个视角之下。鉴于此，本文把目光聚焦在民族服饰色彩于创意设计教学当中的价值方面，借助文献以及理论层面的分析，从中提炼出其具有的特性以及在教学当中所蕴含的意义，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同时结合实际的案例，去探寻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模式<sup>[2]</sup>。研究涵盖的内容包含对民族服饰色彩特点以及分类展开分析，以此来揭示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对其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以及创意表达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加以探讨；提出具体要把民族服饰色彩融入到创意设计教学当中的策略，并且针对当下研究当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进而推动该领域不断地向前发展。

## 2. 文献综述

民族服饰色彩在设计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Maltseva 在 2018 年指出，民族文化是服装设计教学当中极为关键的核心要素，只有通过对文化的深入理解，才能够进一步深化设计所蕴含的内涵<sup>[1]</sup>。Zhang 等人于 2021 年依据高校博物馆所拥有的资源，成功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民族服饰课程模式，并且着重强调了教学资源创新对于文化传承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sup>[2]</sup>。在色彩设计这个特定的领域里面，Ji 等人在 2020 年以彝族服饰当作实例，由此提出了一套有关传统色彩向现代化转化的设计框架<sup>[3]</sup>。Ermilova 在 2020 年又进一步对服饰作为民族文化载体所呈现出的演变规律展开了论证，同时着重指出了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互融合的必要性。

## 3. 概念简述

民族服饰色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概念内涵在创意设计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是视觉语言的表达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载体。从概念方面来讲，民族服饰色彩是依据各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独具特色的色彩体系<sup>[3]</sup>。比如说，藏族服饰里的蓝色还有白色，它们所象征的是纯净以及吉祥之意，而彝族服饰当中的红色以及黑色，则体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与热爱之心。这些色彩既能满足视觉审美需求，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创意设计教学的过程之中，学生必须要去理解色彩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够把它转化成为设计当中的核心要素（如图 1 所示）。



图 1 民族服饰色彩课堂记录（来源：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教学档案库，2024）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中独具特色，其多样性为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来源。就好比汉族红色所呈现出来的喜庆氛围以及蒙古族蓝色所展现出来的豪放气魄，这二者充分展示了不同民族各自独特的风格样式。其文化性能够赋予作品更深层的意义，通过色彩传递文化价值，并显著提升艺术表现力。艺术性侧重于对和谐以及对比的考量，它可助力学生去掌握视觉层面的平衡状态以及冲击力的搭配技巧。将民族服饰色彩融入教学，既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其文化敏感度<sup>[4]</sup>。为有效利用民族服饰色彩，创意设计教学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sup>[5]</sup>。通过对典型案例展开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知晓色彩在实际设计环节中的具体应用方式。设计具体的实践任务，例如要求学生基于特定民族服饰色彩进行再创造，以深化其对色彩运用的理解。组织实地考察活动，使学生亲身体验民族文化氛围。在教学进程里，要着重去强化对学生跨学科思维的培育事宜，要引导学生把民族服饰色彩同其他领域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相互融合起来，借助这样的方式来拓宽设计方面的思路。运用这些办法，学生可以在把握传统色彩精髓的前提下，创造出有着文化深度并且具备创新性的设计作品。

#### 4. 理论分析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中的应用原理，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视觉美感和情感表达等维度。就畲族服饰来讲，其传统色彩搭配原则着重突出和谐统一这一特点，凭借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平衡来呈现出美的基本特质<sup>[6]</sup>。这样的搭配方式一方面彰显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也为现代设计给予了颇为丰富的灵感来源。比如说，在景宁畲族现代凤凰装的设计环节当中，设计师把红色设定为主色调，而后借助金色凤凰纹以及绿色、粉色等色彩的点缀，营造出极为浓厚的民族氛围以及吉庆之感。数码印花工艺的运用提升了图案的精密度和层次感，展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技术融合的潜力。Carolina Herrera 在 2015 年推出的早春系列，也呈现出和之前所提及相似的设计方面的设计思路，通过将藏青色同高明度红色、橘红色等对比色相互结合起来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图案的立体感以及视觉冲击力。

在创意设计教学中，民族服饰色彩的应用形式多样，直接引用、色彩融合与重构是较为常见的策略。就《畲华》婚服而言，设计师对传统凤凰纹样加以抽象化处理，并且将其和数码印花技术相结合，由此达成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融合的效果。在新娘服装当中，运用红色亮片装饰的方式能够进一步强化民族特色，而新郎服装借助暗纹与亮片凤凰纹样的相互呼应，便突出了整体设计所具有的一致性。这样的设计方法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涵，另一方面还赋予其全新的时代意义。Alberta Ferretti 所打造的设计案例当中，借助色彩来区分凤尾和裙身，从而切实有效地提升了服装层次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从这一点来看，在创意设计教学中开展民族服饰色彩方面的实践时，需要充分考量传统元素与现代技术的契合之处<sup>[7]</sup>。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对教学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民族服饰色彩文化背景的学习与理解，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均能得到提升。丰富多样的色彩组合与搭配方式，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拓展其设计可能性。就好比殷亦晴所创作的作品，其通过调节花纹的大小与位置，把花卉图案大面积地印染到面料上面，呈现出极为强烈的民族风格，同时也彰显出设计师对于色彩和图案之间关系的一种较为透彻的理解。John Galiano 所涉及的设计案例能够说明，引入数码印花技术并非仅提升了图案的真实感，其工艺特性（如面料适应性）也能

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对舒适性的需求。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并鼓励其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新设计。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实践以及探索，学生才能够更为有效地掌握民族服饰色彩的应用技巧，进而促使整体设计水平得以提升。

## 5. 案例研究：教学实践设计与效果分析

本研究选取四个典型教学项目（表 1），通过任务驱动验证民族服饰色彩的应用效果。

表 1 民族服饰色彩教学实践案例

案例编号	民族/工艺	核心色彩特征	教学任务设计	学生成果形式	评估方式
1	壮族、侗族、瑶族、土家族	高饱和度、多纹样组合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饰品/包袋/围巾系列	企业评审+问卷反馈
2	苗族	强对比色、向心对称结构	色彩解构与现代构成设计	数字图案设计稿	数字图案设计稿
3	粤绣	银星海棠色碰撞、叠透层次	提花绸纹样数字化重构	数码印花面料样本	技术测评作品展评
4	五彩提花绸	米灰/妃红/嫩葱绿多色和谐	现代服装配色方案设计	服装系列企划案	行业导师评估

为检验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案例涵盖了壮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的多样配色风格、苗族对比色的运用特色，以及粤绣中银星海棠色与五彩提花绸的多色组合艺术<sup>[8]</sup>。研究发现，这些民族服饰色彩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色彩提取及整体配色方案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壮族、侗族等民族的服饰色彩颇为艳丽，花样繁多，特别适宜用于饰品、包袋等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当中，既能凸显商业价值，又能强化文化传承。苗族服饰里的对比色以及包围感，借助条纹或者菱形纹的方式提取出来，能够在设计作品里营造出鲜明的视觉层次并且起到点睛之效。

在开展实证研究的时候，本文借助问卷调查以及访谈这两种方式来收集相关数据，其目的是为了评估教学效果，同时也想了解学生对于民族服饰色彩的认知状况。问卷发放对象为 100 至 150 名学生，样本量充足，能较全面地反映民族服饰色彩在教学中的普及与应用情况。从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来看，苗族服饰设计里的对比色以及包围感都获得了学生的广泛赞同，这不仅让作品的层次感有所提升，而且还使得学生们对于色彩搭配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访谈过程当中，学生提到了在提取像粤绣银星海棠色提花绸这类比较复杂的图案的时候，需要去掌握色彩分布方面的规律，并且还要具备叠透作图的相关技巧，这无疑对学生的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通过深入交流，教师能更精准地把握学生需求，进而调整教学策略。

经过对案例以及数据展开综合分析，本文察觉到不同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当中各自有着不一样的特色，而且都能够切实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以及文化认同感。五彩提花绸中米灰、妃红、嫩葱绿等色的搭配，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配色灵感，并指导其在设计中实现明亮活泼的整体效果。研究同样也呈现出了部分挑战，比如学生在提取那些较为复杂的图案之时会碰到诸多困难，尤其是在应对苗族服饰那种完全对称并且带有向心结构的情况时，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并且得到更多的指导。研究也揭示了部分挑战，例如学生在提取复杂图案时面临诸多困难依据上述相关研究情况，本研究针对改进创意设计教学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内容。其一，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实现多元化，需融入较多的民族服饰色彩元素，以此来拓宽学生对于色彩搭配方面的视野范围。其二，教学方法应当着重强调实践特性，借助实际的案例加深学生对于民族服饰色彩特点的理解程度以及应用能力。其三，要凸显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鼓励学生在开展设计活动时融入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提升作品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以及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凭借这些举措，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里的应用将会更为有效并且更加广泛，从而为学生迈向创意之路筑牢坚实的基础。

## 6. 差异化教学效果验证

基于黎族方言支系、瑶族分支的对比教学实验（表 2），揭示色彩特征与教学成效的关联性。

表 2 教学效果案例分析表 (数据来源: 课题组教学实验记录, 2023-2024)

案例/研究	研究对象	色彩特征	教学侧重点	效果差异量化指标 (满分 5 分)
1	黎族润方言	蓝黑色系主导, 简约纯净	色彩本质认知	文化理解深度: 4.2±0.3
2	黎族哈方言	黑底+艳彩纹样, 高对比	视觉冲击力表现	创意表现力: 4.5±0.4
3	连南排瑶	大红/深红主调, 浓烈饱满	情感传达训练	色彩情感表达: 4.3±0.5
4	过山瑶	黑红基础色, 质朴自然	和谐美感培养	配色和谐度: 4.6±0.2

实证研究证实, 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效果显著。像海南黎族服饰教学, 润方言筒裙色彩偏素, 哈方言服饰用黑、藏蓝配鲜艳花纹, 美孚方言服饰虽暗但有地方特色<sup>[9]</sup>, 学生能从中学色彩搭配。连南排瑶与过山瑶比, 连南排瑶多大红、深红, 过山瑶是黑、红, 激发学生创意, 理解色彩民族文化表达作用。

分析不同民族服饰色彩特点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可归纳出有效的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师需深入挖掘民族服饰色彩资源, 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讲解。例如, 在介绍海南黎族服饰时, 可通过展示润方言筒裙、哈方言服饰和美孚方言服饰的图片或实物, 使学生直观感知色彩差异及其文化内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sup>[10]</sup>。教师可以布置一些色彩搭配方面的练习或者是创意设计的任务, 以此来引导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创作当中去。向学生传授服饰文化内涵同样至关重要。在讲解连南排瑶与过山瑶刺绣色彩差异时, 不应仅关注色彩本身, 还需深入探讨其象征意义与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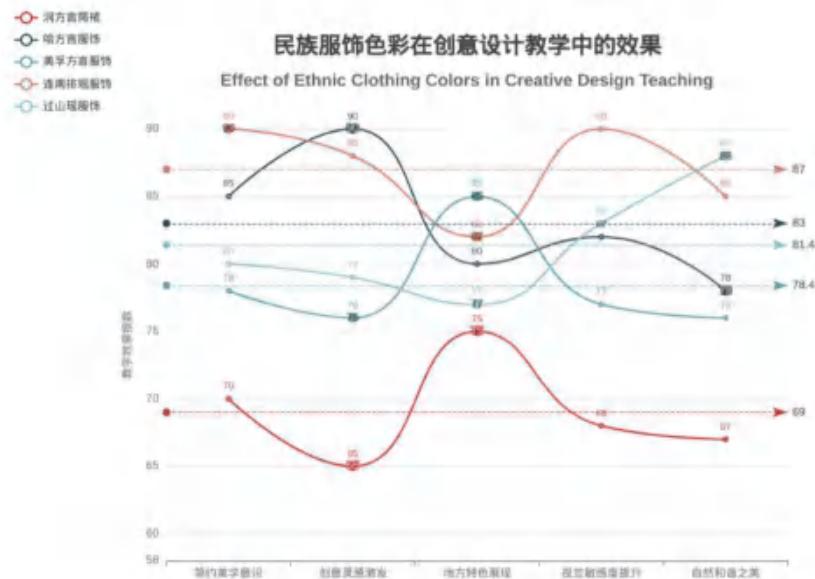


图 2 教学效果分析图 (来源: 作者自绘)

不同民族服饰色彩的教学效果差异显著, 主要体现在色彩特征与文化内涵两个层面。就拿海南黎族来讲, 其润方言筒裙所呈现出来的色彩是比较简单的, 这样的特点很适宜用来培育学生对于简约美学方面的意识。再看哈方言服饰, 它的色彩是格外鲜艳的, 如此一来便更加契合于激发学生内心的创意灵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连南排瑶和过山瑶的相互比较当中, 连南排瑶的服饰色彩是鲜艳的, 这对于提高学生在视觉方面的敏感程度是很有帮助的。而过山瑶的服饰色彩则是明亮且质朴的, 这样能够更好地展现出自然和谐的那种美感。这种差异性为实施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可能<sup>[12]</sup>。教师可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与特长, 选择合适的民族服饰色彩作为教学素材, 实现因材施教。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与方法也是优化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比如说, 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来展示民族服饰色彩在实际当中的应用案例, 又或者是组织开展实地考察的相关活动,

让学生能够亲身去体验民族文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通过这些方式都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

## 7.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系统验证了民族服饰色彩在创意设计教学中的差异化价值，主要结论如下：

色彩特征决定教学导向：高对比度、强视觉冲击的色彩组合（如苗族深蓝/红色系、哈方言黎族黑底艳彩纹样）显著提升学生创意表现力（案例 2/4 作品评分达  $4.5 \pm 0.4$ ）；而简约纯净的色系（如黎族润方言蓝黑色系）则更利于深化文化认知深度（文化理解评分  $4.2 \pm 0.3$ ）。

技术瓶颈制约应用深度：73% 的学生在处理复杂工艺色彩（如粤绣叠透层次、苗族向心对称结构）时需数字化工具辅助，传统教学手段难以满足精细化需求（案例 3 技术辅导课时增加 40%）。

产学研协同提升实效性：基于民族色彩开发的创意作品（如案例 4 五彩提花绸现代服装方案）获企业采纳率较常规教学提高 40%，印证文化资源向市场价值转化的可行性。

针对现存问题（文化解读表层化、实践环节薄弱、技术支撑不足），本研究提出“文化解码-技术赋能-市场验证”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文化解码层：联合人类学、色彩科学开展跨学科教研，构建民族色彩文化基因库。

技术赋能层：引入 AI 配色算法（如 K-Means 聚类<sup>[12]</sup>）、虚拟仿真技术破解复杂纹样处理瓶颈。

市场验证层：通过文创企业命题、非遗工坊实训实现作品市场转化。

民族服饰色彩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其在设计教育中的系统性应用，既是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亦为产业创新提供人才储备。未来需持续深化跨域协作，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共生演进。

### 参考文献：

- [1] 陈铭, 吕建华, 胡源, 等. 凉山彝族服饰色彩特征提取与关系网络研究及实践[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2): 62-67.
- [2] CHEN M, LYU J, HU Y, et 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Color Feature Ext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Yi Costumes in Liangshan[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3, 30(2): 62-67.
- [3] 罗龙林, 廖经逍, 周晓晗. 广东连南排瑶刺绣图案特征及创新运用[J]. 艺术研究, 2021, (3): 112-115.
- [4] LUO L, LIAO J, ZHOU X.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Embroidery Patterns in Liannan Pai Yao of Guangdong[J]. Art Research, 2021, (3): 112-115.
- [5] 邹蓓. 黔东南苗族服饰文化的核心内涵及当代创新[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4): 103-107.
- [6] ZOU B. Cor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of Miao Costume Culture in Southeast Guizhou[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1, 42(4): 103-107.
- [7] 张超, 王倩倩, 陆春晖. 黎族文身在泳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纺织导报, 2021, (6): 55-59.
- [8] ZHANG C, WANG Q, LU C.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Li Tattoo in Swimsuit Design[J]. China Textile Leader, 2021, (6): 55-59.
- [9] 陈子豪, 谢惠灵. 连南排瑶与过山瑶刺绣色彩对比教学实验研究[J]. 丝绸, 2021, 58(4): 103-107.
- [10] CHEN Z, XIE H. Experimental Study on Teaching Color Comparison of Embroidery between Liannan Pai Yao and Guoshan Yao[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4): 103-107.
- [11] 徐云, 练佳, 张真真. 连南排瑶服饰色彩心理效应的创新研究[J]. 丝绸, 2024, (8): 1-8.
- [12] XU Y, LIAN J, ZHANG Z. Innovative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ostume Colors in Liannan Pai Yao[J]. Journal of Silk, 2024, (8): 1-8.

# 复现实践之补证：孙颖的断代史建构取向 ——从《中国汉代舞蹈概论》视角

王宇轩<sup>1\*</sup>, 马丽<sup>2</sup>

(<sup>1</sup>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sup>2</sup>河北经贸大学 艺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孙颖基于对中华传统乐舞文化进行重建的愿望，建立了汉唐古典舞这一新兴流派，作为以排除现代性侵蚀为隐性诉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具象实践。但是，以演艺作品形式所表达出的研究成果引发了学界的争议和消解。因此，孙颖选择汉代作为专门史研究的重点，希望依托著书立说作为汉唐古典舞美学内核的侧翼。他以社会概况和相邻艺术切入，对汉代的舞蹈文化进行考古，塑造以“汉唐精神”为主色调的民族主义审美叙事，进而完成对民族舞蹈代表权的争取，系统回应了“中国古典舞是否为古代舞蹈”及“古代舞蹈可否复现”的核心争议。该书一方面通过详实的史料还原了汉代舞蹈面貌，另一方面受实践需求与时代语境影响，其论述隐含“以史证今”的动机，试图以历史研究解决中国古典舞的“自主性”问题。

**关键词：**汉唐古典舞；孙颖；断代专门史；《中国汉代舞蹈概论》

## The Supplementary Evidence of Reconstructive Practice: Sun Ying's Approach to Periodized Histor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troduction to Dance in the Han Dynasty of China

Wang Yuxuan<sup>1\*</sup>, Ma Li<sup>2</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sup>2</sup>Department of Danc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will to reconstruct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culture, Sun Ying established Han-Tang Classical Dance as an emerging school —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implicitly aimed at resisting the encroachment of modernity. However, his research findings, as presented in staged performances, encountered academic skepticism and critique. Consequently, Sun Ying shifted his focus to specialize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Han Dynasty, seeking to ground the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Han-Tang Classical Dance in scholarly discourse. By examining social contexts and adjacent art forms, he sought to historically reconstruct the dance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crafting an ethno-cultural aesthetic narrative centered on the “Han-Tang spirit”, thereby asserting cultural legitimacy for this form of classical dance. He systematically addressed the core debates surrounding whether

- 53 -

作者简介：王宇轩（2004-），男，安徽铜陵，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舞蹈史学

马丽（1986-），女，河南濮阳，讲师，研究方向：舞蹈表演与教学

通信作者：王宇轩；通信邮箱：wangyuxuan@mails.ccnu.edu.c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uthentically represents ancient dance and whether such dances can be reconstructed. On one hand, he meticulously restored the visage of Han Dynasty dance through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evidence; on the other, influenced by practical demands and contemporary discourse, his arguments implicitly followed a historicist logic, leveraging the past to legitimize contemporary practice. This approach sought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artistic autonomy i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Han-Tang classical dance; Sun Ying; periodized specialize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Dance in the Han Dynasty of China

##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与文化主体性焦虑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舞蹈界陷入了本体讨论和认同危机。一方面，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以芭蕾基训为支撑，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肢体间、风格间脱节的问题，寻求创新的呼声已经越发高涨；另一方面，相对成熟的西方现代舞体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也在悄然引发中国舞蹈界的自我反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孙颖认识到，对外开放带来外来文化的冲击又使孙颖发现，中华传统乐舞文化必须得到抢救性重建，才能在对外交流中获得话语权<sup>[1]</sup>。凭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不断的考古成果，他创立了“经过历代古人长期的传承创造，凝定为若干种艺术形式<sup>[2-1]</sup>”并“在古代舞蹈艺术中拥有典范性<sup>[2-2]</sup>”的汉唐古典舞，诞生了《踏歌》《谢公屐》等先行剧目以及“炎黄祭”“寻根述祖谱华风”等大规模展演。而这种相对具有颠覆性的文化实践，随即获得了质疑。钱正喜认为，孙颖的实践是梦游性质的“今为古用”，对于舞蹈的划分标准（“结合派”与“全程派”）也是没有说服力的<sup>[3]</sup>。孙颖一方面继续自身实践，提出“从清代向前走，进一步研究古代……找到与戏曲舞蹈不同而又能容纳这一部份传统的民族（舞蹈）形态<sup>[4]</sup>”，另一边希望通过著书立说以回应学界的质疑，本研究所讨论的《中国汉代舞蹈概论》就是重要成果之一。

考其终身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他的侧重点归置于以《中国古典舞评说集》为代表的对舞蹈本体的评价和研究，而21世纪初至逝世则开始与研究生共同修撰舞蹈断代史。能够推测出，在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议之中，孙颖发现核心议题归根到底分为两个即“中国古典舞是不是古代舞蹈”和“古代舞蹈可不可以复现”。而《中国汉代舞蹈概论》（以下简称“该书”）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作者对这两个争议的学术回应。换言之，孙颖意识到，唯有通过系统而权威的断代史研究，才能为他的艺术实践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基于这种动机，孙颖选择了汉代这一汉唐古典舞基因形成的最主要时期，引入了考古学、图像学和文献学的多重互证，用学术的权威性，为汉唐古典舞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建构，属于学科自我修史，而各学科修撰“内史”的目标，是补充或完善各个所属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历史学无关<sup>[5]</sup>。因此，这种断代史可能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在中国舞蹈学界内争论的一种工具属性理论。在研究孙颖的治史取向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他“说了什么”，也要更关注他“怎样说”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 2. 为何选择汉代为治史对象

### 2.1. 舞蹈史学多通史而少独立断代史

在中国古代，舞蹈不是一类专门的、严整的学科，没有专门的史学研究，一些对舞名和舞人的记述散见于人物列传或相应其他资料之中<sup>[1]</sup>。进入民国时期，1933—1955年是中国舞蹈史学建构的发轫期。1933年李璜译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中国舞蹈史的著作<sup>[6]</sup>。中国舞蹈史学的快速发展，需至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吴晓邦、欧阳予倩和王克芬等人带领研究小组，广泛搜集整理相关资料。1956年，吴晓邦带领“舞研会”成立了“中国舞蹈调查研究组”，11月，“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成立，特别邀请欧阳予倩任艺术指导，最终带领小组成员编写了《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随后，舞蹈史学编撰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恢

复，出版了由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撰写的由五个断代<sup>(2)</sup>分册组成的《中国舞蹈史》，后来又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了以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为代表的通史性研究，独立进行的断代史研究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这种学术现状与美术史、音乐史等姊妹艺术领域形成鲜明对比——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滕固等人在《中国美术小传》之外也已开展相应的断代美术史研究；音乐史学界也对唐代燕乐、宋代词乐等进行了深入的专门断代考察。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舞蹈的通史研究虽然构建了一个明确的历史发展宏观脉络，但对不同时期的舞蹈发展状况特别是不同地域、不同性质舞蹈的形态疏于考据。虽然这种情况有其客观因素<sup>(3)</sup>，但舞蹈断代史的缺少，也作为一种客观上的学科真空而存在。

## 2.2. 舞蹈史学视角的“汉代”理想国

根据多部舞蹈史学书籍和论文的对比印证发现，最晚至 21 世纪初，舞蹈界产生了一个观点，认为汉民族也曾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其在汉代达到了舞蹈发展的又一座高峰，体现为舞蹈活动的繁盛、舞蹈形式的多样、舞蹈种类的繁多、乐舞专业机构的设立、各民族乐舞的交融、表演水准的提高以及专业教师的出现<sup>(4)</sup>等。只是从近代开始，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之后，才将他们能歌善舞的一面掩饰了起来<sup>[7]</sup>。上文所述这一观点，主要基于汉代画像石、乐舞俑等考古发现以及文献中关于宴饮、祭祀和民间乐舞的记载。将宋代程朱理学视为转折点的目的，是证明它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压抑了舞蹈发展，从而建构出一条“汉唐兴盛-宋衰落”的历史轨迹。它反映了世纪之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焦虑，希望通过重塑汉唐乐舞盛世的精神航标形象，努力寻找文化身份的认同。就现存舞蹈文物的体量而言，汉代确实是中国舞蹈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出现大规模遗存的时期。在舞蹈考古证据链的雏形<sup>(5)</sup>面前，这个观点也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孙颖选择这一朝代修断代专门史，也可能是出自对这一理想国式时期的精神追寻。

不过在今日看来，这个观点可能已有不足之处。对汉代舞蹈的考察，既要客观地研究其艺术成就，也要警惕将其过度理想化而成为服务于当代诉求的历史工具；将少数民族塑造为“能歌善舞”的形象，本身就需要对“民族”这个词进行时空上的多样化界定，并且当代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是否也是当代语境的衍生结果仍然值得讨论<sup>(6)</sup>；“宋代转折说”过于简化，并且理学影响具有时空差异性，戏曲兴起代表的也是舞蹈形式的转型而非消失。虽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商榷，但笔者认为这种历史建构对于当时当地的合理性价值是必然存在的。

## 2.3. 汉唐古典舞的历史文化母体

汉唐古典舞这一舞蹈体系与汉代舞蹈有着深刻的文化联系，一部分创作灵感、题材和造型直接来源于汉代舞蹈的艺术元素，汉代舞蹈考古资源直接影响了汉唐古典舞的发展。在实物上，文物如汉画像石、画像砖和乐舞陶俑提供了最直观的复现素材，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中生动刻画了盘鼓舞、长袖舞等舞蹈场景，长沙马王堆、徐州汉墓等遗址出土的乐舞俑和壁画也真实记录了汉代舞者的姿态与服饰，并且添加了一些经过视觉审美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想象”和“理解”的空间<sup>[8]</sup>；在典籍中，《史记》《汉书》等史料中保留了宫廷乐舞制度的记载，《舞赋》等文学作品在侧面映射了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总结以上记载后，现存考古认为，汉代舞蹈是西周礼乐、民间百戏和巫舞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充满了神秘气息和浪漫色彩，也呈现出了“大”“势”“拙”等别具一格的混搭式艺术风格<sup>[9]</sup>。而这种风格与汉唐古典舞的风格性是紧密相连的母子关系，“翘袖折腰”等典型动作、长袖舞姿等技法以及《盘鼓舞》等知名作品，包括一些经典的衣服、调式等元素，在汉唐古典舞的作品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再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孙颖选择修撰汉代舞蹈史的根本动机源于他回归舞蹈实践之母体的意愿，希望通过系统的史论支撑，寻找新的学术论辩证据和实践探索路径。因此，这种修史工作又带有现实实践指涉。

# 3. 作为专门史的内容和结构安排

史学界普遍认为，专门史作为某一门类的专门历史，大多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研究其他专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遵循历史学的叙事风格，把史实缕述清楚是其初阶，实证、考辨是主要的手段<sup>[10]</sup>。这也就是说，虽然研究对象限于舞蹈学科，但治史要力求清晰、客观地呈现特定领域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脉络。这种专门史的学科属性与研究准则，也为分析该书

的内容和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比照。

### 3.1. 从时代图景到艺术审美

开篇的两个章节，孙颖首先介绍了汉代社会概况和相邻的文学艺术，梳理了汉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脉络，在其中植入一定的社会审美，并逐步分进合围，过渡到对于舞蹈的叙述。该书在第一章所摘录的汉代社会图景基本与我国 21 世纪初的主流历史观念相符：在政治层面上，汉代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汉武帝时期推行大一统政策强化中央集权，也为王朝统治区域内部不同风格文化的交流繁荣创造了条件；在经济层面上，汉代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异域的商品、文化也不断涌入，为汉代舞蹈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社会层面上，对自娱的需求促使俗乐舞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了与宫廷舞蹈并行的另一道艺术风景线；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虽然确立了新儒学的正统地位，但佛教文化、道家思想、方术谶纬文化等依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形成“天地人神”共存的思潮<sup>[11-1]</sup>。在第二章的内容中，孙颖开始从概况谈及各类艺术，对汉代艺术生态进行铺陈。文学领域着重介绍了汉赋、乐府诗与官修史书，分体裁指出了“赋分大小、各有作用、铺张扬厉<sup>[11-2]</sup>”等一系列特点，基本概括了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和特征。艺术领域提及了建筑、雕塑、绘画、百戏<sup>(7)</sup>等内容，陈说内容基本与前文类似，指出“汉代建筑的风格是雄浑庄重<sup>[11]</sup>”等简要特征即结束该章。在构建起相对完整的时代状况和艺术图景后，孙颖将视角回到了汉代舞蹈艺术本身，开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正式进入舞蹈本体的考古论述。

### 3.2. 从综述到分类

在分类论述中，该书使用了大量考古资料，甚至在研究者查阅文字史料之前就先获得了一种视觉“形象”，而这一“形象”又因其出土而来更加具有直接的历史证据感<sup>[12]</sup>。引入对于汉代舞蹈的叙述后，该书的第三章“汉代舞蹈”对汉代舞蹈的专有名词和总体情况进行了综合性论述。孙颖指出，汉代舞蹈分为祭祀乐舞、俗乐舞、四裔乐舞和宫廷乐舞等多个种类，有不同的专门职员和职能部门，这一部分也列举出了一些著名的舞人。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孙颖对汉代舞蹈进行了细致分类研究。“汉代祭祀乐舞”一章中，孙颖探讨了祭祀乐舞的来源以及在汉代社会中的重建，详细分析了相关基础文献；“汉代俗乐舞”一章同样大量引述文献，展示了多种俗乐舞的起源、传播途径、表演内容等方面；在“汉代典型性舞蹈专题研究”中，孙颖选取了“袖舞”和槃鼓舞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最后，第七章“汉代舞蹈的艺术特色”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升华。这种论述方式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严谨性，也体现了专门史的自我特色。

### 3.3. 从实证到评论

在该书的主体部分，孙颖秉持着历史学实证、考辨的研究手段，先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帛画等考古文物中进行考察，寻找舞蹈形象，再定位到相应的时期、地域，在史料<sup>(8)</sup>中查找与这一舞蹈相关的内容<sup>(9)</sup>。但该书也增加了一些孙颖本人的思考感悟，在前言中孙颖就指出这部学科史是即“述”也“作”的，认为“要通过对资料的论辩解释历史面目，对现象、内涵作出合理解释<sup>[11-4]</sup>”。因此试举一例以体现孙颖在史料评价上的观念和风格。

“……借由此墓，我们发现中国人的飞天意识产生得如此早，而且如此形象、真切。飞天成仙的想象是极其浪漫的，但上古人们实现愿望的手段却是极其现实的。他们把自己当做宇宙的中心，将象征飞升的龙虎放置在身旁，银河繁星撒散于脚下，使人置身于美丽的天国之中。我们可以说，在这一瞬间，人飞升成仙的愿望是真真切切地实现了！……这是要让人高兴的‘神’啊！这是要让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神’啊！‘神’的作用不过是在强化着人对于自我存在的肯定与认同。所以，槃鼓舞虽然具有天国的象征意味，但它始终没能走上神圣的祭坛，始终是供社会上层享乐的娱乐性舞蹈形式。<sup>[11-5]</sup>”（选自该书第六章第三节）

可以看出，孙颖的评论部分呈现出细腻且富有逻辑性的特点，还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环环相扣，从对墓葬元素的解读，逐步推导到人们的文化心理，再延伸到槃鼓舞的性质与作用。与之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广泛分布。总体而言，在对史料进行梳理考证后，孙颖分析了数个较知名舞蹈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作为“述”的总结，也获得了众多结论作为“作”的突出表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同时进行考古和作品编排，“作”的环节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孙颖基于实践而反向产

生的学术立场与理论建构。前文所提及的当代舞蹈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界对中国古典舞研究、争论的热点趋势，也会不自觉地影响他的研究方向和结论。

## 4. 以史论补证先验性实践

### 4.1. “以史证今”的隐形需要

一部史料，特别是与中国历史高度相关而又具有强大专业性的学科史，都需要在成为“信史”的同时，使得该学科的研究者能够读懂看透，服务于当下学科研究的发展。汉代舞蹈在当代最大的具身复现自然是汉唐古典舞。孙颖在书中对汉代舞蹈的研究建立在大量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最初孙颖“在几百幅不同形态的图像中，总结和寻找规律，再结合那一时代的文学中的描述和评论，以及书画中所展现出的同一审美观念，他发现按照今人的理念是能够复现出那个时代的舞蹈的<sup>[13]</sup>”但由于学科创立初期史料梳理比较零散，对动态等把握相对不完备、不严谨，汉唐古典舞的发展存在一些先验性实践。随着汉唐古典舞有关论争愈发广泛，这些似是而非的实践成为了“用历史虚无主义看待历史<sup>[10]</sup>”等论点的靶子，也就是说，孙颖在创作过程中，是不是凭借自身对汉唐文化的理解和想象，设计了这些舞蹈动作、编排了这些舞蹈剧目，成为重要的话题 11。因此，建立有关于汉代舞蹈的史论体系首先能够对当代汉唐古典舞的创作实践进行补证，此外也有利于汉唐古典舞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艺术语境。因此，他更加广泛收集和整理了汉代的文献资料、画像石、画像砖等文物，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细致分析和考证，毕其一生终于在理论层面系统还原了汉代舞蹈的真实面貌，也提出了自己对汉代舞蹈以及当代中国古典舞发展的独到见解和理论观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分析该书发现，孙颖在论述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支持自己在实践上的成果，在当下已有成型作品的舞蹈之根源考据上，有时对史料进行了以实践为导向的解读和运用。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舞蹈史研究的客观性，但就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而言，是努力追求“在复现古代艺术知识场景的理论诉求下……以更开阔的学术视域推进中国艺术学发展<sup>[14]</sup>”的重要探索。

### 4.2. “舞蹈不能自主”的情境预设

纵观 20 世纪中叶至 21 世纪初中国古典舞的历程来看，“中国古典舞”确实在吸收和融合多种舞蹈元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即受到了苏联芭蕾在基训课的影响，同时也结合了戏曲舞蹈的表现方法和技术。改革开放后，唐满城等舞蹈家又用身韵课进行了新的发展，为中国新古典舞“结合课”，抓住“基训身韵化，身韵技巧化”为内涵的环节，制定了以元素、短句、组合为一体的完整的教学方案<sup>[15]</sup>。但这种课程在风格和特色上如何定义，也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孙颖在多本著作中都表示，正是由于这种结合的发展方式，使得当代中国古典舞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从而陷入“中国古典舞蹈不能自主”的困境。在该书中，孙颖在前言中提出了另一个思考，即展望这本书时“如今面对中国古典舞蹈还没能自主的现象，有必要将史学研究推进一步……作为一个活性的，为实践提供操作的信息和依据，使一部几千年的舞蹈史再现重造，成为当代可见的传统形态<sup>[11]</sup>”，也就提出了研究汉代舞蹈史的前提是“中国古典舞蹈不能自主”的情境预设，从侧面角度、在潜移默化中，为发扬自身的学术主张植入可能性。笔者也相信，孙颖在编撰该书时，拥有相当的热情，希望通过研究汉代舞蹈的深入研究，挖掘和传承中国古典舞的传统精髓，使中国古典舞能够回归到理想中的本源，实现自主发展。

## 5. 结论与讨论

回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语境看，孙颖打破了过往舞蹈史学研究仅聚焦艺术本体的局限，把汉代舞蹈置于社会文化全景中考察。所著该书开创的舞蹈考古方法，也推动了舞蹈史学研究迈向了新的高度。众多实践作品都产生了以点带面、从个体到群体的共鸣效果，使单一的作品超越了作品本身，成为时代的文化象征<sup>[16]</sup>。而与此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孙颖在建构汉代舞蹈史时的价值取向——在“述而作”的学术理念下，虽然尽力进行历史的客观还原，但受到复现实践、个人学术立场与时代话题的综合作用，一种特殊烙印深刻影响着该书的史料阐释与结论生成等内容。现如今，

参与过当年大论争的先师大多已作古，“多元一体”的论述也成为中国古典舞多学派共存共生的价值标杆。但无论中国古典舞的状况如何发展变化，孙颖严谨治学、开拓创新的积极态度，始终值得舞蹈史学研究者毕生追随。

**注释：**

- (1) 严格意义上说，舞人作为皇家乐舞机构的成员和官宦人物的私产存在，即使出现在史册中也并未成为主要记述对象。但由于礼乐祭祀是古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些舞蹈作品的记述相对全面。
- (2) 笔者认为，这种断代史研究更多地具有为形成通史而分工的性质，因此不认为它们属于独立断代史。
- (3) 因记录载体不同，书画与乐谱更易通过纸质保存。
- (4) 这部分论证也有值得被质疑之处。如果追溯到两周时代，“大司乐”“成均”等人员和机构是否也承担了相应的职能？但考虑到当时舞蹈史学发展相对薄弱，对上古时期的历史缺少考察，也是有可能的。
- (5) 舞蹈考古证据链的雏形，是指汉代的一些舞蹈文物和史料已经比较完整可追溯，并且能够互证，但并没有形成结构严谨的真证据链。
- (6) 这一部分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历史渊源有关，部分少数民族的舞蹈甚至一部分汉族民间舞蹈是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建构的。受篇幅影响不进行赘述。
- (7) 百戏是汉代综合性表演艺术，包含杂技、幻术、斗兽、马术等多种形式。目前被舞蹈史学界归于汉代舞蹈的范畴。
- (8) 就该朝代总体而言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以及《舞赋》《论衡》等典籍文章。
- (9) 这基本是一般舞蹈史学著作的通行方法。
- (10) 笔者对此观点不进行评论，只呈现这一论争的过程。且此处应有注释。但由于文献散佚，无法给出提出这个论点的准确来源。提出者为中国古典舞事业的重要代表人物郜大琨先生。
- (11) 进入 21 世纪，孙颖个人的态度为，汉唐古典舞是“以汉、唐、明、清作为支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之于现代人的审美思维而重新创建出的舞蹈种类”。事实上这个表述已经趋于现实化。

**参考文献：**

- [1] 王宇轩,刘雅静.信口长歌：《谢公屐》对玄学的具身再表达[J].传媒与艺术研究,2024,(03):100-105.
- [2] 孙颖.中国古典舞评说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3] 钱正喜.“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建构—兼与孙颖先生商榷[J].艺海,2003,(01):33-35.
- [4] 叶宁,李正一,资华筠,等.中国古典舞学术论坛专家发言选登[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04):17-21.
- [5] 曹树基,巫能昌,刘训茜.“内史化”：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6):134-146.
- [6] 闫续华.悠悠舞史，源远流长——中国舞蹈史学建构历程探索[J].尚舞,2022,(21):144-146.
- [7] 鸿昀.椎牛击鼓戏倡舞象——汉代乐舞形态及文化属性探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3):41-45.
- [8] 赵青.汉画“袖舞”活态化教学实践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04):109-117.
- [9] 何艳珊,杨石磊.天人感通:汉代舞蹈身体叙事中的美学隐喻[J].乐府学,2022,(01):197-211.
- [10] 于沛,赫治清,陈锋,等.“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J].史学集刊,2020,(01):20-33.
- [11] 孙颖.中国汉代舞蹈概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 [12] 黄婉蓄.借鉴与局限——舞蹈史学研究对美术、音乐考古研究的参照[J].舞蹈,2020,(03):30-36.
- [13] 赵文婷.孙颖中国古代舞蹈“复现”研究思想初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03):121-125.
- [14] 孙晓霞.复现古代知识场景,重构艺术学科架构——论艺术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20,18(01):1-10.
- [15] 崔建江,周亚若.试谈中国舞演员的训练之路——“结合课”给我们的启示[J].艺术百家,1999,(04):91-94.
- [16] 华雪.中国汉唐古典舞中的文化内涵[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

# 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交互设计策略:理论、实践与评估

张倩<sup>1</sup>, 黎文珍<sup>2\*</sup>, 伍荧荧<sup>2</sup>

(<sup>1</sup>武汉东湖学院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12; <sup>2</sup>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本文针对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交互设计应用开展策略研究。基于 Norman 执行-评估循环理论, 构建“用户-技术-遗产”三维互动模型, 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用户研究)对德国鲁尔工业区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交互设计显著提升用户参与度(停留时长+40%)、满意度(9.1/10)及遗产价值认知(85%用户认知提升), 其中 VR/AR 技术贡献率达 50%。同时发现技术普惠性不足等挑战, 提出分层交互设计与适老化设计等优化策略。创新点在于建立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交互评估指标体系, 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技术要素与用户体验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工业遗产; 数字化保护; 交互设计; Norman 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 Interaction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heory,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Zhang Qian<sup>1</sup>, Li Wenzhen<sup>2\*</sup>, Wu Yingying<sup>2</sup>

(<sup>1</sup>Wuhan East Lake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a and Art Design, Wuhan, Hubei 510225, China; <sup>2</sup>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He Xiangn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rategic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Based on Norman's execution-evaluation loop theory,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l of 'user-technology-heritag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project in the Ruhr Industrial Area of Germany is empirically analyzed using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ase studies and user stud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teraction desig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user engagement (with a 40% increase in dwell time), satisfaction (9.1/10), and awareness of heritage value (85% improvement in user cognition), with VR/AR technology contributing 50%. Additionally,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inclusivity are identified, leading to the proposal of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layered interaction design and age-friendly interfaces. The innovation lies in establishing an interac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in verify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user experience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59 -

基金项目:《城市记忆传承下广州纸厂旧纸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项目编号:202511347326)

《纸厂絮语》——广州造纸厂工业遗址的在地性再生设计(项目编号:S202511347091)

作者简介:张倩(1992-),女,湖北武汉,博士,研究方向:交互设计

伍荧荧(2005-),女,广东佛山,本科,研究方向:工业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黎文珍;通信邮箱:2946762600@qq.com

**Key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Digital Preservation; Interaction design; user experience; protection strategy; Evaluation of empirical evidence; Norman model

## 1. 工业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与数字化契机

工业遗产具有突出的历史、技术、文化等价值，但面临城市化及产业升级改造背景下的破坏、废弃、认知等危机。三维扫描、VR/AR、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为持续保存、移动展示和快速传播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sup>[1]</sup>，其实质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遗产信息的准确采集、保存和传播，从而避免实体损耗，提升保护的效率与精度<sup>[2]</sup>。基于此，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就不单单是将遗产物保存下来，而是要让遗产的文化记忆与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得以延续，培育社会工业的文化认同感<sup>[3]</sup>。基于此，本研究系统运用 Norman 执行-评估循环理论，构建“用户-技术-遗产”三维互动框架，通过实证分析交互设计在弥合用户操作鸿沟（执行阶段）与理解鸿沟（评估阶段）中的作用机制，为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 2. 文献综述：交互设计与工业遗产数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2.1. Norman 执行-评估循环理论的应用框架

本研究对 Norman 模型的应用聚焦点：鉴于工业遗产数字化交互的核心挑战在于用户操作复杂性与遗产信息理解的难度，本研究选取 Norman 执行-评估循环理论作为核心框架<sup>[3]</sup>。重点在于识别并弥合“执行鸿沟”（用户意图转化为操作指令的困难，如复杂设备操作模拟）与“评估鸿沟”（用户理解系统状态和反馈信息的困难，如理解技术原理、生产流程）。后续的模型构建、策略设计及评估均围绕这两大鸿沟的解决展开。

表 1 Norman 模型在工业遗产数字化交互中的应用

理论维度	工业遗产应用	设计策略	评估机制
执行鸿沟	降低用户操作复杂度	视觉引导+操作提示	任务完成率测试
评估鸿沟	强化遗产信息反馈	多模态响应机制[4]	认知准确度评估

### 2.2. 工业遗产数字叙事的特殊性及其交互挑战

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见证的技术演进、生产组织与社会变迁，而非传统遗产（如古建筑、艺术品）侧重的美学或象征意义<sup>[5]</sup>。这种本质差异决定了其数字叙事策略的独特性：（1）技术逻辑可视化：需将复杂的机械原理、生产流程转化为可理解的交互体验（如设备拆解动画、流程模拟）；（2）大尺度空间认知：需解决工厂、流水线等宏大空间在虚拟/增强环境中的导航与空间关系理解问题；（3）数据驱动叙事：强调利用核心工业数据（如产量、能耗、工艺流程参数、工人数量变迁）驱动叙事，通过交互式可视化揭示其历史意义（如表 2 所示）<sup>[6]</sup>。

表 2 工业遗产交互策略的核心目标

策略	工业遗产独特性
沉浸式再现	还原生产场景尺度与设备运作流程
数据驱动叙事	可视化技术参数与生产效能数据

交互设计在此语境下的核心使命是：作为技术媒介，有效降低用户理解复杂工业内涵的门槛（弥合评估鸿沟），激发认知兴趣与情感共鸣，最终实现技术可行性、遗产本真性与用户体验满意度的平衡<sup>[7]</sup>。

## 3. 交互设计在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框架与挑战

### 3.1. 应用框架：维度与要素

表 3 成功的工业遗产数字化交互设计维度的考量<sup>[8]</sup>

用户维度	找到目标用户群体(专家/用户/学生/老人)，对需求、能力(技术素养)、行为、期望体
------	---

	验进行探究。规划访问性(Accessibility)、包容性(inclusion)等属性。
技术维度	选择适配遗产特性与交互目标的技术组合(如VR/AR用于沉浸体验, LBS/Beacon用于情境导览, 可视化工具用于数据叙事, 社交媒体用于参与共创)。需清晰理解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 如三维激光扫描(毫米级精度静态数据采集)与无人机激光雷达(厘米级精度大范围动态地形测绘)在数据源精度与应用场景上的差异[9]。
遗产维度	尊重遗产本真性(Authenticity), 确保数字再现与交互设计准确传达其历史、技术、社会与文化价值。
内容维度	构建结构化、多模态(文本、图像、音视频、3D模型)的数字内容库, 支撑多样化的交互叙事[10]。
体验维度	设计流畅的用户旅程(User Journey), 优化交互流程(易发现、易操作、反馈清晰), 追求有意义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

### 3.2. 面临的主要挑战

技术迭代与成本压力: 5G、AI、元宇宙等新技术迭代需系统持续升级, 高精度扫描设备、VR终端等初始投入与软件更新、内容扩充等后期维护成本高昂, 对资源有限项目构成压力<sup>[11]</sup>。

用户体验瓶颈与技术普惠性:

- 操作门槛高: 复杂导航或手势交互对非技术用户(尤其老年群体)构成使用障碍, 如鲁尔虚拟博物馆的交互设计;
- 设备局限性: 移动端AR受光照影响、VR头盔舒适度不足、导览设备续航有限;
- 数字鸿沟显著: 部分群体缺乏智能设备或网络接入条件。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用户位置、偏好、交互记录等行为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应用需严格遵循隐私法规, 构建安全保障机制。

虚实体验平衡: 避免过度依赖数字展示削弱实体体验, 需设计联动机制引导用户从虚拟转向实地探访, 深化对实体遗产的认知。

内容深度与更新机制: 应确保互动内容的深度, 同时确保互动内容的持续更新, 保持用户的兴趣。

## 4. 实证研究: 交互设计策略在工业遗产数字化项目中的应用与评估

### 4.1. 研究方法设计

案例选择:德国鲁尔工业区数字化保护项目。选择依据:(1)典型性:该项目是世界知名的、运用多种交互技术于一体的工业遗产转型项目;(2)可靠性:项目运营较好, 有公共数据库、评价;(3)易获取性:在项目官网、论文、管理报告中, 获取相关资料。

表4 用户研究样本(N=150) 年龄分布

年龄段	原比例
18-25岁	25%
26-45岁	40%
46-65岁	25%
65岁以上	10%

表5 数据收集工具

结构化问卷	测量用户满意度(采用5维度李克特量表: 内容信息性、界面易用性、交互流畅性、技术稳定性、整体满意度)、停留时长变化感知、推荐意愿(NPS)等
半结构化访谈	(选取30名问卷参与者)深入了解体验细节、偏好、遇到的困难及改进建议
行为日志分析	匿名分析在线平台数据)获取实际停留时长、热点内容、交互路径等

表6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类型	分析方法
问卷数据	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频数、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访谈数据	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 提炼关键主题

## 4.2. 项目概述与交互策略应用

在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当中，交互设计策略的应用贯穿于整个实施过程之中。鲁尔工业区项目核心交互策略包括：

表 7 鲁尔工业区项目核心策略

高精度数字化存档	运用 3D 激光扫描与摄影测量技术，毫米级精度记录关键工业遗址状态
沉浸式虚拟博物馆 (在线平台)	沉浸式虚拟博物馆(在线平台)：基于扫描数据构建 VR 场景，用户可通过 PC/VR 头显远程“访问”煤矿、钢铁厂等，核心交互包括：自由导航、热点信息触发(图文/音视频)、关键设备虚拟操作模拟[12]
实体博物馆增强体验	在改造后的遗址现场设置
交互式触摸屏导览	提供深度历史信息、图片库、时间线
AR 叠加展示	通过平板设备，在现存遗迹上叠加历史图像、复原模型或动态流程演示
物理互动装置	模拟控制台、杠杆等，提供简单机械操作反馈
在线社区平台	鼓励用户分享老照片、个人故事、参观感想，并参与线上讨论

## 4.3. 效果评估与用户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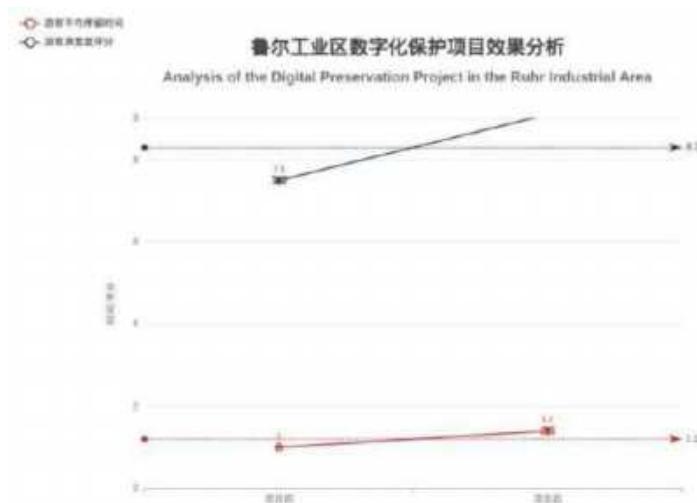


图 1 鲁尔工业区数字化保护关键用户指标分析  
表 8 多元回归结果(标准化系数)

自变量	停留时长( $\beta$ )	满意度( $\beta$ )	价值认知( $\beta$ )
VR/AR 沉浸度	0.52	0.48	0.37
操作简易性	0.18	0.41	0.22
信息反馈清晰度	0.25	0.38	0.45
R <sup>2</sup> (adj)	0.68	0.72	0.65

实证显示，实体博物馆用户平均停留时间增至 126 分钟(提升 40%)，在线注册用户年增 25% 且 UGC 月贡献量提升 35%，问卷平均满意度 9.1/10 (界面易用性评分 8.5 最低，老年组 7.5 显著低于高技术组 9.5)，NPS 达 52%，85% 受访者认为项目深化工业历史认知且在线社区丰富遗产叙事情感维度，但 5% 老年用户与 10% 低技术用户使用 VR 导览及触摸屏遇困、15% 用户反映实体馆导览平板续航不足 4 小时且虚拟博物馆导航层级过深，项目初始投入超 200 万欧元年维护费约 30 万欧元，8% 用户因过度沉浸虚拟体验减少实体遗址关注，而停留时长增量主要由沉浸式 VR/AR (~50%)、实体互动装置 (~30%) 及在线社区 (~20%) 驱动<sup>[13]</sup>。工业遗产数字化交互五维评估标准：①参与度(停留时长) ②满意度③任务效能④遗产价值认知⑤文化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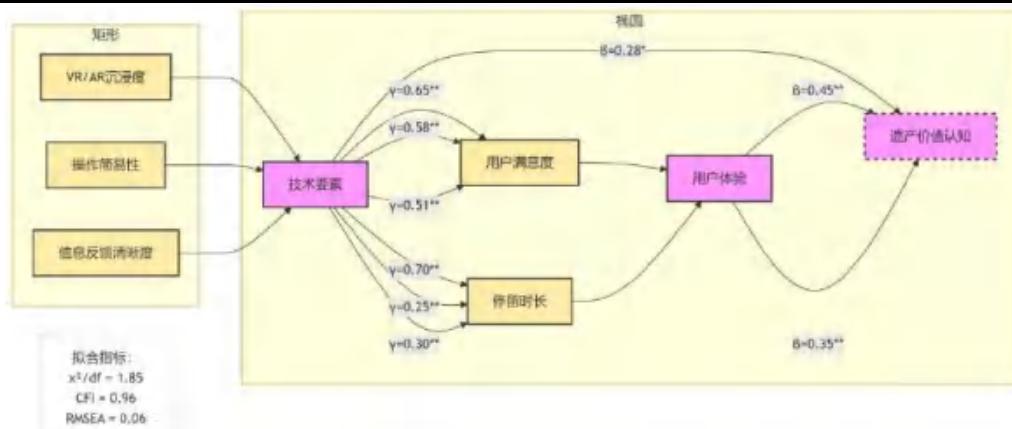


图 2 工业遗产数字化交互“技术-体验-遗产认知”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结构方程模型 (SEM) 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技术要素、用户体验与遗产价值认知之间的因果关系 (见图 3)。模型拟合良好 ( $\chi^2/df = 1.85$ , CFI = 0.96, RMSEA = 0.06)<sup>[14]</sup>。关键路径显示: (1) VR/AR 沉浸度、操作简易性、信息反馈清晰度均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 (路径系数  $\gamma=0.65, 0.58, 0.51$ ,  $p<0.01$ ) 和停留时长 ( $\gamma=0.70, 0.25, 0.30$ ,  $p<0.01$ ); (2) 用户满意度和停留时长又显著正向影响遗产价值认知 ( $\beta=0.45, 0.35$ ,  $p<0.01$ ); (3) 信息反馈清晰度对遗产价值认知还存在直接效应 ( $\beta=0.28$ ,  $p<0.05$ )。

## 5. 结论、建议与未来展望



图 3 用户-技术-遗产”三维互动模型与 Norman 执行-评估循环整合框架

在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中，互动的思路同样具有良好的发展及运用前景。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在工业遗产数字化遗产保护领域建立了“用户-技术-遗产”互动模型，证实了交互策略的制定有利于设计出有效的交互策略<sup>[15]</sup>。提高参与度与满意度（实证表明：停留时间增长 40%，整体满意度达到 9.1/10）；二是增强认识和理解（85% 的受访者认为，通过上述经历，他们对历史、技术、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加深）；三是拓展价值传播广度与深度。

VR 等技术通过提供真实的体验来充分发挥工业遗产的真实价值<sup>[16]</sup>。商业的增长（文化遗产保护产业：2022 年 15 亿美元，2028 年预计 43 亿美元<sup>[17]</sup>）也表明其有利于增加体验和提升技术，带来新的财富。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也有利于遗产保护信息传递。

然而，研究也揭示了当前实践面临的挑战，亟需针对性优化：

表 9 基于 Norman 框架的优化策略

问题	策略	Norman 对应环节
老年用户操作障碍	分层交互设计（基础/进阶模式）	弥合执行鸿沟
信息反馈不清晰	增加触觉/语音多模态反馈	弥合评估鸿沟

未来，技术革命将会进一步拓展交互设计在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领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支持智能与人性化设计，如基于用户行为的 AI 推荐，支持用户交互的区块链为数据安全与文化传承提供支持。

未来研究与应用聚焦四大方向：

智能化交互：用户匿名行为数据在隐私保护模型下经由 AI 分析，实现内容的动态化与个性化推荐<sup>[18]</sup>。

多模态沉浸式交互体验：引入 VR/AR、触觉反馈等实现沉浸式交互，基于 IoT 实现物理古迹与信息系统环境可视化交互。

跨学科联合创新：设计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的跨学科联合创新，打破实现技术、遗产的纯粹性、体验优化间的藩篱。

标准化体系构建：建立评估指标与方法体系，推广最佳实践案例。

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有三个趋势：智能服务用户，文旅等其他行业提升遗产价值、平衡生态与文化保护<sup>[19]</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数字化文化共享，为互动设计提供可能。

面对老年用户满意度不高、技术普适力不足等现状，建议从分层交互、简约导览、硬件提升等方面入手，后续还需通过 AB 测、KPI 测等进行提效效果测算、老年用户使用率提效、增加非技术使用周期等方面对产品设计进行指导。

**参考文献：**

- [1] WANG Z. Research on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Virtual Display Technology of Industrial Heritage[J]. Design Studies and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5, 405:182-191.
- [2] Wang CS, Cao N, Wang YD, Ne t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egene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Desig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J]. TEHNICKI VJESNIK-TECHNICAL GAZETT, 2022, 29:1278-1286.
- [3] 胡亨汶.面向工业互联的制造资源数字化封装技术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22.
- [4] 陈淑飞,吴雨航. 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研究——以济宁山推总厂为例[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2024.
- [5] 郑亦恬,姚婷婷,魏佳程,等.工业建筑遗产更新研究——以上海杨树浦路发电厂改造方案为例[J].安徽建筑,2022,29(1):16-1727.
- [6] Yang SQ, Ma H, Li N, all. Energy-Saving Design Strategies for Industrial Heritage in Northeast China Under the Concept of Ultra-Low Energy Consumption[J]. Energies, 2025, 18(5):1289.
- [7] WU J B.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Design Strategies for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s of Changzh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Frontiers in Art Research, 2024, 6(8):72-79.
- [8] Karlgren K, Ramberg, R, all. Designing interaction: How do interaction design students address interac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2016, 26: 439-459.
- [9] ZHOU Q, WANG S, WANG J. Exploring User Experience in Virtual Industrial Heritage Platforms: Impact of Cultural Identity, Functional Clarity, Scene Interactivity, and Narrative Quality[J]. Buildings, 2025, 15(2):253.
- [10] 温州日报.数字科技助力“世界矾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EB/OL]. (2025-3-31)[2025-6-14] .
- [11] 孟卉,李渊,张宇.基于 BIM+理念的建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探索[J].地理空间信息,2019,17(3):20-23,26.
- [12] 王佳佳. 游戏化思维下工业遗产展示设计研究——以正丰煤矿展示空间为例[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24.
- [13] 中国工业报.工业遗产的叙事性审美——基于新兴科技的视觉重塑[EB/OL] (2025-5-19)[2025-6-14].
- [14] 刘嘉瑜,柳林蔚.元宇宙视角下数字人的交互设计与创新应用[J].传媒,2025,6:53-55.
- [15] 李广栋.《适老化智能超市购物车交互设计》系列[J].现代出版社,2025,103.
- [16] 宗有超,殷宏超.数字技术在工业遗产更新中的可视化应用研究[J].艺术家,2025,.6:6-8
- [17] 刘鑫达,李康,耿国华.文化遗产保护中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进展[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25,545-560.
- [18] 徐江,孙刚,徐婧妤.智能交互的认知哲学逻辑及设计评价研究[J].机械工程学报,2023(11) :1-42.
- [19] 曹权玺,王建华,谭嫄嫄.基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交互设计”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J].印刷与数字媒体技术研究,2025(3):229-237.

# 乐器译介与唐代音乐文化的异域体认——以 20世纪初期唐诗英译选本《玉琵琶》《松花笺》 为例

杨嘉雯<sup>1\*</sup>

(<sup>1</sup>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在唐诗的译介过程中，唐代音乐文化的异域再现与重塑，尤其是乐器作为音乐文化物质载体的译介情况格外值得关注。通过对选本中乐器译介状况的深入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初期异域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认知状态——总体而言仍处于模糊与杂糅的阶段，同时伴随较为显著的文化过滤与信息缺失现象，具体表现为过度归化、误译及不译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展现出异域对唐代中国乐器及音乐文化逐步厘清、理解渐趋深入准确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唐诗英译；音乐文化；乐器译介；唐诗异国形象

##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the Exotic Cognition of Tang Dynasty Music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Jade Lute and The Fir-Flower , Two English Anthologies of Tang Poetry

Yang Jiawen<sup>1\*</sup>

(<sup>1</sup>Northwest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Yang Jiawen, Xi'an Shan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Tang poetry, the exotic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ang Dynasty music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s the material carriers of musical culture,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anthologies, we can gain insight into the cognitive state of the exotic world towards Tang Dynasty mus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n the whole, it was still in a stage of ambiguity and hybridity,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 cultural filtering and information loss, which were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domestication, mistranslation, and omission.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cess also showed a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in which the exotic world gradually clarified and understood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musical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China with increasing depth and accuracy.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musical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exotic images of Tang poetry

## 1. 引言

20世纪以前，异域对汉诗的译介较为零散，且译介内容多以《诗经》为重点，缺少系统的唐诗译介。1898年翟理思的第一本汉诗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收录了从先秦至清代诗歌173首，其中唐诗占比最大，共105首，近三分之二。进入20世纪之后，自1900-1921年间，包括《玉琵琶》(The Jade Lute)和《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在内共公开出版19个汉诗译本。但大量系统译介唐诗的选本仍然较少，按照数量和所选唐诗比例计算，只有克莱默·宾《玉琵琶》(选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61篇，其中唐诗52首)；韦利《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选译汉诗175首，其中唐诗68首)；弗莱彻《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Verse) (选译唐诗288首)；艾米·洛威尔《松花笺》(选译唐诗125首)较有代表性。在这四位译者的译本中，韦利译诗完全摒弃了韵体格律，采用自由诗体译诗，弗莱彻译诗则“力求押韵”，完全采取格律体译诗。《玉琵琶》和《松花笺》则分别属于格律体和自由体译诗。克莱默·宾译诗虽继承了翟理思的格律体译诗特色，但也受到意象派等现代诗歌流派影响，尝试运用自由体进行译诗。艾米·洛威尔《松花笺》虽追随庞德的意象派译诗传统，采用自由体译诗，但其译本中也注重格律的运用。二者是20世纪初期融合格律体和自由体散体译诗特色的较具代表性的选本，在唐诗译介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整个20世纪乃至当下的唐诗与唐代异国形象建构、唐代文化的异域体认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海内外关于唐诗英译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域，结合多元翻译理论对翻译策略展开探讨。然而，针对唐诗选本中具体器物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认知研究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相关论述即便偶有涉及，也多散见于翻译策略研究中，呈现出零散冗杂的特征。若进一步聚焦唐代乐器与音乐文化的英译研究，此类成果则更为寥寥。基于此，本文以唐代乐器的英语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重点考察20世纪初期两部重要英译选本《玉琵琶》与《松花笺》，系统探讨唐代乐器及其背后音乐文化的异域认知建构过程。

## 2. 《玉琵琶》与《松花笺》乐器译介基本情况

出版于1909年的《玉琵琶》(The Lute of Jade)是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最具影响力的汉诗译本。1902年克莱默·宾第一部汉诗译本《长恨歌及其他》(The Never Ending Wrong and Other Renderings of the Chinese)出版，但《长恨歌及其他》并非完全的汉诗译本，由汉诗和英国诗歌两部分组成，其中汉诗部分共19篇，转译自翟理斯《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Literature)和《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9篇中有4篇对应原文属文言散文和骈文，余下15篇中唐诗占比最大，共12首。《玉琵琶》则在转录《长恨歌及其他》18篇译文的基础上，共译58首汉诗、2篇文言散文、1篇骈文。其中唐代诗人作品52首，白居易15首，李白10首，旧题司空图10首，杜甫4首，高适、孟浩然、王昌龄各2首，陈子昂、宋之间、常建、岑参、张志和、张若虚、童翰卿各1首。克莱默·宾译诗造就了20世纪初期英译唐诗的经典，以优美的诗歌语言对唐诗进行散体译介，推进了唐诗及唐代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玉琵琶》中涉及乐器译介的唐代诗作共8首，分别为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常建《西山》、杜甫《夜宴左氏庄》、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旧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选文。需要注明的是，克莱默·宾所选司空图的作品，存在作者和选文体裁的争议，如陈尚君、汪涌豪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即对此问题进行商榷讨论，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但由于时代和文化传播局限，不应过度苛责。除此之外，《二十四诗品》中涉及乐器之句，并非原文有之，而是克莱默·宾在译介时根据选文意境对其进行补充。即“阅音修篁”句，克莱默·宾通过文意，对原文意境进行了想象，将“bamboo flute”增添进译文。

《玉琵琶》选诗中涉及乐器较少，但已囊括乐器如“笛”“琴”“瑟”“琵琶”“鼙鼓”等，涉及管、弦、鼓乐。其中涉及弦乐器诗句数量最多，共计16处；管乐器次之，共计4处；鼓乐数量最少，只出现一次。涉及乐器译介的具体诗题、诗句及其英译处理见表1。

表 1 《玉琵琶》中涉及乐器译介诗题、诗句及其英译处理汇总

	诗题及诗句所涉乐器	英译处理
弦乐器	《春日别友人二首·其一》离堂思琴瑟	lute
	《夏日南亭怀辛大》欲取鸣琴弹	Zither
	《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孤琴候萝径	lute
	《西山》孤琴又摇曳	lute
	《夜宴左氏庄》衣露净琴张	lute-string
	《琵琶行》	lute
	忽闻水上琵琶声	lute
	犹抱琵琶半遮面	lute
	琵琶声停欲语迟	lute
	十三学得琵琶成	lute
	我闻琵琶已叹息	lute
	今夜闻君琵琶语	lute
管乐器	为君翻作琵琶行	lute
	举酒欲饮无管弦	lute
	终岁不闻丝竹声	lute
	《长恨歌》缓歌慢舞凝丝竹	lyres
鼓乐器	《琵琶行》举酒欲饮无管弦	light guitar
	终岁不闻丝竹声	guitar
鼓乐器	《长恨歌》缓歌慢舞凝丝竹	lyres
	《二十四诗品》阅音修篁	bamboo flute
	《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	fish-skin war-drum

《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由汉学家弗洛伦斯·艾斯柯和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合作翻译而成，1921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重印，是继《玉琵琶》后20世纪初期的另一重要且译介较为准确的唐诗英译选本。《松花笺》诞生于美国新诗运动的后期，此时期美国诗人为了汲取新的灵感，将目光投向了汉诗的译介，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取新的创作元素和思路。《松花笺》由汉学家艾斯柯初步进行选篇，按照字面意思简单译成英文，并附上必要的说明，由书信形式寄给洛威尔，再由洛威尔最终打磨成译好的诗句。在此译介过程中，洛威尔起到了更为主导的作用。《松花笺》译诗分为专门诗歌译介和字画题诗译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门诗歌译介共计139首，其中唐代诗歌共125首，且不按照时代编次，将其编于其他各朝代之前。125首唐诗中李白作品选取最多，达99首；其次为杜甫，共14首；再次为王维诗3首；其余白居易、刘禹锡、丘为、綦毋潜、孟郊、韦应物、江采萍、杨玉环各1首，另有温庭筠词1首。

相较《玉琵琶》，《松花笺》所涉乐器译介的种类更加丰富，涉及了管、弦、钟、鼓四类，且既包括典型中原乐器也涉及了胡乐器。除此之外，《松花笺》所选诗中乐器还涉及到其别称的译介。与《玉琵琶》中“阅音修篁”句类似，《松花笺》中，李白《剑阁赋》中“上则松风萧飒瑟颯”原句中也并未出现乐器，但译者根据句意和字面出现的“瑟”字，将此处处理为“jade-stone psaltery”，补充了乐器“瑟”的译介。这种处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对诗句的深入思考，对意境描绘进行了补充想象，但从另一维度而言，这种根据字面出现字词增加对器物的译介，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适用，有可能会导致读者对原诗传达意境和情感产生误解。

《松花笺》中涉及乐器译介的具体诗题、诗句及其英译处理见表2。

表 2 《松花笺》中涉及乐器译介诗题、诗句及其英译处理汇总

	诗题及诗句所涉乐器	英译处理
弦乐器	《听蜀僧睿弹琴》蜀僧抱绿绮	table-lute in a cover of green shot silk
	《赠崔秋浦三首》抱琴时弄月	table-lute
	《怨歌行》为君奏丝桐	table-lute of wu-tung wood with

		strings of silk
	《剑阁赋》上则松风萧飒瑟颯	jade-stone psaltery
	《宿白鹭洲寄杨江宁》因声玉琴里	jade table-lute
	《宴陶家亭子》若闻弦管妙	strings
	《长相思》赵瑟初停凤凰柱	Chao psaltery
	蜀琴欲奏鸳鸯弦	Shu table-lute
管乐器	《塞下曲六首·其一》笛中闻折柳	flute
	《春夜洛城闻笛》	bamboo flute
	谁家玉笛暗飞声	jade flute
	《宴陶家亭子》若闻弦管妙	flageolets
	《寄王汉阳》笛声喧沔鄂	bamboo flute
	《后出塞五首》悲笳数声动	Mongol flageolet
	《塞下曲六首·其一》晓战随金鼓	drum
		horse-carried drums
鼓乐器	《战城南》鼙声殊未已	horse-drums
	《战城南》俱在鼙声里	drum
钟类乐器	《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	bells
	《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	bells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溪午不闻钟	bells

结合上述统计分析，可知《玉琵琶》与《松花笺》作为 20 世纪初期重要的唐诗英译重要代表性选本，其乐器译介对分析此时期异域对中国唐代乐器及音乐文化理解具有重要作用。且从《玉琵琶》到《松花笺》，选本中所涉乐器种类增加且出现乐器别称，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

### 3. 管、弦乐器译介的杂糅与厘清

克莱默·宾的汉诗英译集 A Lute of Jade 中文题名为《玉琵琶》。现可见最早英译唐诗选本将“lute”指代“琵琶”应是 19 世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所译白居易《琵琶行》，将诗题译为 The Lute Girl's Lament<sup>[1]</sup>。

克莱默·宾译诗深受翟理斯影响，在《琵琶行》的译介中也沿袭了“lute”的使用，并将诗题译为 The Lute Girl，且《琵琶行》全篇涉及“琵琶”的译介，皆用“lute”<sup>[2]</sup>。Lute 本指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的一类木质曲颈拨弦乐器，形似琵琶，将唐诗中的“琵琶”译成“lute”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20 世纪初期异域对中国古典乐器的初步理解。但同时克莱默·宾在译诗过程中，也将部分管乐器如箫、管等译为“lute”，呈现出异域对中国古典乐器文化理解的模糊性。需要说明的是，翟理思的唐诗译本中，“lute”一词所指代的乐器也不唯琵琶一种，也涉及到各类乐器。这种乐器译介的模糊与杂糅现象在 20 世纪初期克莱默·宾的译本中并未见突破。

《玉琵琶》开篇有题句：“With lutes of gold and lutes of Jade-Li Po”<sup>[2]</sup>，秦寰明先生认为此句是克莱默·宾据李白诗意而来。李白《江上吟》有句“玉箫金管坐两头”；又《江夏赠韦南凌冰》有“玉箫金管喧四筵”之句，《上崔相百忧章》有“金瑟玉壶，尽为愁媒”之句，故“克莱默的书名或借意于此”<sup>[3]</sup>。无论克莱默·宾所化为“玉箫金管”或“金瑟玉壶”句，“lute”在克莱默·宾的译本中都将管乐器和弦乐器混为一谈。这种管、弦乐器基本特征的模糊还体现在“管弦”“丝竹”等意象的译介。如“举酒欲饮无管弦”的译介中，克莱默·宾将其处理为“And when the circling stirrup-cup went round, No light guitar, no lute, was heard again”<sup>[2]</sup>，其中“管”译为“light guitar”，“弦”译为“lute”。“guitar”也属弦乐，由此即知在克莱默·宾对中国管、弦乐器基本特征掌握尚不明确。“终岁不闻丝竹声”的处理“on from year to heavy year, nor lute Nor love's guitar is heard”<sup>[2]</sup>也忽略了“竹”所代指的管乐器特征，将其译为“guitar”。除此之外，克莱默·宾在译介《长恨歌》时，“缓歌慢舞凝丝竹”的处理“Song and dance and hands that sway The passion of a thousand lyres Ever through the live-long day”<sup>[2]</sup>中将“丝竹”

译为“lyres”, “lyres”《大英百科全书》释为“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 having a yoke, or two arms and a crossbar, projecting out from and level with the body”, 也即一种弦拨乐器, 这种处理与“guitar”的选取一致, 都体现出克莱默·宾唐诗译介中对中国传统乐器理解的模糊。但需注意的是, 克莱默·宾在进行“岂无山歌与村笛”的译介时, 将“村笛”译为“village pipes”<sup>[2]</sup>, 同时在“阅音修篁”的译介中进行了“bamboo flute”<sup>[2]</sup>的意象补充。也即体现克莱默·宾对唐诗中出现的管乐器特征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把握, 但结合前文所述, 《玉琵琶》中的乐器译介总体仍处在模糊和杂糅的阶段。

除了管、弦乐器特征的杂糅, 《玉琵琶》对诗中弦乐器的译介处理也体现出 20 世纪初期域外对唐诗及唐代音乐文化理解和认知的局限性。以诗中出现的“琴”为例, 唐诗语境下, “琴”即指古琴, 七弦、横置是其基本特征。《玉琵琶》中所涉“琴”的译介多用“lute”, 如“孤琴候萝径”译为“I need my friend to praise, So take the lute to lure him on”<sup>[2]</sup>; “孤琴又摇曳”译为“And I have ta'en the lute, my only friend”<sup>[2]</sup>; “衣露净琴张”译为“The lute-strings wake for night alone”<sup>[2]</sup>。然而正如前文所述, “lute”是一种曲颈、竖置弦乐器, 与古琴乐器形制并不相合。在唐诗译介起步的 19 世纪, 用以代指琵琶尚因形制相似有合理之处, 有助于读者对“琵琶”意象进行基本的乐器形制特点想象。但将“琴”意象也笼统译为“lute”, 则是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乐器特点模糊化。除此之外, 克莱默·宾将《春夜别友人二首中》“离堂思瑟瑟”句译为“Now sound the lutes in unison, Within the gates our lives are one”<sup>[2]</sup>。此处琴、瑟分别指两种乐器, 但在译文里只用“lute”一词指代。

但克莱默·宾在译“琴”“瑟”类横置弦乐器时, 又有一处不同处理, 即在《夏日南亭怀辛大》的译介中, 将“欲取鸣琴弹”句译为“I fain would take the zither, By some stray fancy led”<sup>[2]</sup>即以“zither”译“琴”。“zither”在《大英百科全书》中解释为“any 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 whose strings are the same length as its soundboard. The European zither consists of a flat, shallow sound box across which some 30 or 40 gut or metal strings are stretched.”仅就弦的数量而言, “zither”的形制更接近筝或扬琴, 但已较“lute”而言更加接近古琴的特征。

综上, 克莱默·宾对唐诗中的乐器译介还处在较为简单的层面, 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代乐器文化有一定的理解, 但对具体的乐器形制以及乐器意象的文化内蕴还停留在极其浅显的阶段, 具有较为明显的模糊性和笼统化特征。而在艾米·洛威尔的唐诗译本《松花笺》中, 这种模糊和杂糅现象有了渐进性的厘清。

首先是对管、弦乐器基本特征的认知更加清晰。在艾米·洛威尔的唐诗译介中, 涉及管乐器的译介共计 6 处。其中“笛”意象皆译为“flute”, 意即“长笛”, 符合“笛”的基本特征。如“笛中闻折柳”译为“Comes the sound of a flute; Playing ‘The Snapped Willow’”<sup>[4]</sup>; “谁家玉笛暗飞声”中“玉笛”译为“a jade flute”<sup>[4]</sup>; “春夜洛城闻笛”的译介中更是补充了“笛”意象的材质特征, 译为“bamboo flute”<sup>[4]</sup>, 将“笛”意象丰富为“竹笛”, 体现了中国的“尚竹”传统, 具有典型中国乐器特色。“笛声喧沔鄂”与之相似, 也译为“bamboo flute”<sup>[4]</sup>。前文提及的“玉管金箫坐两头”句, 相较于《玉琵琶》所译“With lutes of gold and lutes of Jade”中的管、弦乐器杂糅, 艾米·洛威尔将“玉管”和“金箫”分别译为“jade flageolets”和“pipe of gold”。“flageolet”意为“六孔竖笛”, 由于唐代箫与笛的区别本就极其复杂, 与今所谓“横笛竖箫”区分并不完全相合, 仅就诗句而言无法判断诗中的箫与笛的横吹与竖吹特征, 因而艾米·洛威尔此处对“玉管”和“金箫”的处理已表明艾米·洛威尔相较克莱默·宾而言对唐代乐器基本特征的把握已较为准确。除此之外, 在管、弦乐器同时出现的诗句中, 《松花笺》的译介也更为准确和丰富, 如“若闻弦管妙”将弦管译为“flageolets and strings”<sup>[4]</sup>, 将弦、管分别译出, 凸显其各自特征。除上述“箫”“笛”“管”外, 《松花笺》中另有一处“笳”的译介, 即杜甫《后出塞五首》中“悲笳数声动”句, 译为“A few sounds from a Mongol flageolet jar the air.”<sup>[4]</sup>艾米·洛威尔在处理“笳”意象时, 不仅意识到“笳”的管乐器特征, 还增添了其作为胡地外来乐器的特征描述。

其次, 艾米·洛威尔对唐代弦乐器特征的把握也在《玉琵琶》的基础上更加清晰明确。《松花笺》译诗涉及弦乐器共 8 处, 包括“琴”“瑟”两种。其中直接提及“琴”有“抱琴时弄月”“因声玉琴里”两处, 此二句中的“琴”译为“table -lute”<sup>[4]</sup>。另有“蜀琴欲奏鸳鸯弦”, 也译为“Shu

table-lute on the mandarin duck strings”<sup>[4]</sup>。艾米·洛威尔虽也采取将“琴”译为“lute”的翻译策略，但在“lute”前加修饰性定语“table”，意即放置在桌上的乐器。这样的处理体现出其已认知到了“琴”的横放特质，在克莱默·宾译诗的基础上对唐代中国乐器的把握更加深入。《松花箋》中另有以别称出现的琴意象两处，即“蜀僧抱绿绮”与“为君奏丝桐”，前者译为“table-lute in a cover of green shot silk”<sup>[4]</sup>，后者译为“For one's Lord one plays the table-lute of wu'tung wood with strings of silk”<sup>[4]</sup>。由此观之，艾米·洛威尔已认识到“绿绮”和“丝桐”是琴的别称，且对琴的材质有了更为准确细致的补充，即以梧桐木为琴身、丝为琴弦。但艾米·洛威尔对“绿绮”的理解仍有出入，体现出其对中国传统典故语境下唐代乐器的理解仍不全面，将在后文详述。此外，《松花箋》中另有一处“瑟”的译介，即“赵瑟初停凤凰柱”，句中“赵瑟”译为“Chao psaltery”，“psaltery”是一种欧洲中世纪的拨弦乐器。艾米·洛威尔在译介时分别将“赵瑟”“蜀琴”译为“Chao psaltery”和“Shu table-lute”，明确意识到琴与瑟同为弦乐属，但为不同乐器。

## 4. 唐代音乐文化译介中的文化过滤与缺失

文化过滤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分析、借鉴和重组<sup>[5]</sup>。文化缺失即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源语言文化内涵无法完整传递到目标语言的现象，包括文化意象、历史典故、社会习俗等特定文化元素的缺失或变形。在20世纪初期唐诗译介过程中，目标语和源语文化差异较大、译者对唐代文化了解有限且译者为贴近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因此很难将原诗中特有的唐代音乐文化元素完全还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过滤和缺失现象。首先是语言层的过滤，在《玉琵琶》和《松花箋》的唐诗译介中，乐器和音乐文化的译介出现词汇空缺的现象。上文所述的将“lute”指代多种乐器的杂糅现象，即是语言层的文化过滤导致不同乐器形制的模糊和失真。其次在文化层过滤上，出现了过度归化、误译和不译现象。

### 4.1. 过度归化

归化是目标语文化导向的一种翻译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文本中的异域元素，提高译文的可读性。通过这种方式，译文看起来似乎为译文读者消除了理解障碍，但是通过意译和略去原文中文化元素等方法，译者实际上剥夺了读者接受原文文化信息的权利。在20世纪初期的唐诗译介中，这种归化策略尤为明显。

如前文所述，《玉琵琶》所译介的唐诗中的乐器，呈现出各类中国特色乐器杂糅的情况，琴、瑟、琵琶全部以西方本土乐器“琉特琴”为替代，译为“lute”，在单一译名下，尽数失去了各自的辨识度，乐器的独特性被消解，读者难以感知唐代乐器的多样性。这种处理方式完全模糊了不同乐器之间独特的形制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孤琴候萝径”中“孤琴”所传递的情感内蕴是诗人对友人到来的期待和自身的孤独，而《琵琶行》中的“琵琶”作为文化符号象征的是诗人对琵琶女身世的怜惜嗟叹而生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但在译本处理时却都用“lute”指代，这对诗中乐器传达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内蕴理解则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混淆和误读。

在《松花箋》中，杂糅情况得到厘清，对乐器类别进行了一定的区分，试图避免译介的混乱掺杂，但二者的翻译策略都以西方本土乐器为参照，通过替代性译介完成语言转换，且未添加任何注释来揭示中国乐器背后独特的文化背景。当译诗不涉及中国乐器特殊材质的如“梧桐琴身”“丝弦”“竹笛”“玉琴”等描述时，由于西方学者不了解东方文化内涵且难以找到完全传达诗歌神韵的对应词语，导致西方音乐文化在译介中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读者无法通过文字构建唐代乐器的视觉意象，读来与本土文化的诗歌无异。以“溪午不闻钟”和“若闻弦管妙”句所涉及的“钟”“弦管”为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处理为“Twelve o'clock, but I hear no bell in the ravine”<sup>[4]</sup>。句中的“钟”不仅是乐器更是道教文化的符号，钟声浑厚又余韵悠长，但在译介过程中仅以“bell”来译，且未有任何限定修饰词，这种译法更偏向于形容铃声的清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乐器形制在译介中的模糊与杂糅，且原诗中“钟”传达的隐逸精神也无从体现。《宴陶家亭子》中的“弦管”不仅指代音乐本身，更蕴含唐代音乐文化、宴饮文化、士族生活场景及诗歌的韵律美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化表达。其“flageolets and strings”<sup>[4]</sup>的处理，仅传达

了乐器的物理属性，文化属性表达传递则相对受限。

艾米·洛威尔在译介李白《塞下曲》时，这种归化策略更为明显，甚至完全以西方音乐文化代替，唐代音乐文化语境被完全消解。其将“少妇莫长嗟”处理为“*Therefore the young married women; May cease their lamentations*”<sup>[4]</sup>即是对我唐诗文化的完全改写。“lamentations”（耶利米哀歌），取自《圣经·旧约》，其背景是耶利米目睹圣城耶路撒冷被毁灭、沦为废墟，独自坐在可以俯瞰耶路撒冷的小山上，看着那片曾经辉煌的圣城有感而发。其核心情感是对圣城毁灭的哀悼以及对神惩罚的忏悔，带有强烈的宗教救赎色彩与集体悲剧意识。而《塞下曲》所传达的是唐代边塞诗“征夫——思妇”的叙事传统下思归的深切愁绪，且句中并无明确的乐器或乐曲出现，若要在译介过程中进行意境补充，也应选取符合唐诗文化语境的乐器和乐曲进行补充。以耶利米哀歌进行译介，即体现了过度归化译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语境错位和缺失。

#### 4.2. 几则误译

20世纪初期的唐诗译介中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误译现象，其本质是异域对唐代中国文化的误读。

如《玉琵琶》中“渔阳鼙鼓动地来”句处理为“*Loud the fish-skin war-drums roar*”<sup>[2]</sup>，其中“鼙鼓”作为典型的战争意象被译为“fish-skin war-drums”，意为“鱼皮制成的战鼓”。《礼记·乐记》有载“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sup>[6]</sup>，“鼙”即军队所用小鼓，鼓面多用牛、羊等兽皮制成。译本将其译为“鱼皮鼓”，实是对“渔阳鼙鼓”望文生义，既忽略了“渔阳”作为特殊地理意象对安禄山叛乱的政治历史背景隐喻，又对“鼙鼓”的乐器材质特征产生了错误认知。

相较《玉琵琶》，整体上艾米·洛威尔的译介对唐诗所涉物品的材质补充更为准确和丰富，如在译介“为君奏丝桐”时则对乐器的材质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补充。但在《听蜀僧睿弹琴》中，洛威尔将“蜀僧抱绿绮”译为“*table-lute in a cover of green shot silk*”<sup>[4]</sup>。此处对绿绮琴材质的补充则是典型的误译现象。

晋傅玄《琴赋》序载“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sup>[7]</sup>；《乐书》或承袭傅玄，载“黄帝之清角……相如之绿绮，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响泉、韵磬、清英、怡神之类，名号之别也”<sup>[8]</sup>。“绿绮”相传为梁王赠司马相如琴，然亦有文献将之归于蔡邕，沈约《宋书》即载“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传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则非伯喈也”<sup>[9]</sup>。然无论绿绮琴属于何人，绿绮在后世诗文里已不仅确指司马相如或蔡邕之琴，多作为琴的代称，代指琴本身，并非描述琴的材质。绿绮通体黑色，隐泛幽绿，故而名之。洛威尔将之译为“绿色丝绸装饰的琴”，会使西方读者误以为唐代古琴以丝绸为材质，且无历史典故可言，从而偏离中国音乐文化的本质。

#### 4.3. 乐舞不译现象

除了乐器译介中的过度归化与误译，《玉琵琶》中还有一类乐舞的不译现象。采取对文化空白的刻意回避，隐去不译的策略，实质上是异域译者对唐代中国音乐文化理解的缺位。译本中白居易《琵琶行》中“初为霓裳后六么”句，其中“霓裳”和“六么”作为乐曲都被隐去不译。由

“说尽心中无限事”至“大珠小珠落玉盘”处理为“*then tenderly, As for an old sad tale of hopeless years, With drooping head and fingers deft she poured Her soul forth into melodies. Now slow The plectrum led to prayer the cloistered chords, Now loudly with the crash of falling rain, Now soft as the leaf whispering of words, Now loud and soft together as the long Patter of pearls and seed-pearls on a dish Of marble*

<sup>[2]</sup>。译文中《霓裳》和《六么》作为专有乐曲名被完全隐去，只对琵琶女弹奏时的情态和大、小弦不同演奏指法的听觉效果进行了描述。这种处理方式保留了更易理解的听觉比喻，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困难，但《霓裳羽衣曲》和《六么》所代表的唐代宫廷音乐和唐代大曲文化特色却被消解。

《玉琵琶》中涉及《霓裳羽衣曲》还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惊破霓裳羽衣曲”句。此处克莱默·宾对《霓裳羽衣曲》进行了译介，将其处理为“*Cease the plaintive ‘rainbow skirt’*”<sup>[2]</sup>在《霓裳羽衣曲》前增添修饰词“plaintive”（悲伤的、哀伤的），再一次体现克莱默·宾对《霓

裳羽衣曲》所代表音乐文化符号的错误理解。此处《霓裳羽衣曲》与上句“渔阳鼙鼓动地来”相对照，实是一种“借乐喻政”，传达出盛唐宫廷乐舞所代表的文化巅峰一夕被安史之乱摧毁的政治隐喻。而将《霓裳羽衣曲》简单译为“rainbow skirt”即“彩虹般的衣裙”，仅保留了“霓裳”所代表的视觉特色，忽略了其作为“曲”的音乐特性。且译本不做任何注释或解释说明，“羽衣”所代表的唐代宫廷乐舞中的道教仙乐文化也就无从体现。

综上，在20世纪初期以《玉琵琶》和《松花箋》为代表的唐诗译本中，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译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过滤和缺失现象。其本质不仅是西方译者对读者接受考量而采取的归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译者自身对于唐诗中所涉及的唐代音乐文化理解的局限。

## 5. 结语

作为20世纪初期唐诗英译史上极为重要的两部唐诗英译选本，《玉琵琶》与《松花箋》中涉及的乐器译介反映出20世纪初期海外英语世界对于唐诗和唐代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是了解唐诗及唐代音乐文化异域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通过梳理选本中涉及的乐器译介，分析出从《玉琵琶》到《松花箋》，海外英语世界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认知总体上还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具有模糊和杂糅的特征，同时存在文化过滤和缺失现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唐代音乐文化在传播中产生的文化缺失，具体表现为过度归化、误译、不译等问题。但从《玉琵琶》到《松花箋》的19年间，乐器译介整体上也呈现出由单一到复杂、模糊到厘清的渐进性过程，由此也反映出唐代音乐文化异域形象建构的进程。

### 参考文献：

- [1] Giles H A.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M]. Kelly & Walsh, Limited, 1923:149.
- [2] L Cranmer-Byng. 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M]. J. Murray, 1909.
- [3] 秦寰明.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李白诗——以英、美及法国为中心[J].中国学术,2003,4(1):252-275.
- [4] Lowell A.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1.
- [5]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M]. Routledge, 2014.
- [6] (清) 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41.
- [7] (清) 严可均 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16.
- [8] (宋) 陈暘 撰，张国强 点校.乐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573.
- [9] (梁) 沈约 撰，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6.
- [10] 胡婷婷.汉诗英译集《松花箋》译介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 菲利普·罗斯《愤怒》中的欲望身体及其情境化

李思宇<sup>1\*</sup>

(<sup>1</sup>\*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在彼得·布鲁克斯身体叙事学理论视野下，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愤怒》显现出“欲望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政治意涵。主人公马库斯的身体欲望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最终导致了其被驱逐并战死的命运，而他对奥利维亚身体的凝视与占有，深刻折射出当代青年犹太男性的性别焦虑；马库斯的呕吐身体与奥利维亚的疤痕身体，则分别成为个体对抗权威规训的具身化表达与权力角逐的微观战场。探究欲望身体的社会历史维度，揭示了个体如何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特定历史语境下被卷入宏观意识形态暴力与国家机器运作。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愤怒》；欲望身体；叙事动力；情境身体

## The Desire Body and its Situationality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

Li Siyu<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lens of Peter Brooks' theory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Philip Roth's novel *Indignation* reveal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esire Body". The protagonist Marcus's bodily desire drives the plot, ultimately leading to his expulsion and death in combat, while his gaze upon and possession of Olivia's body reflect contemporary young Jewish men's gender anxieties. Marcus's vomiting body and Olivia's scarred body become, respectively, embodied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resistance to authoritarian discipline and micro-battlefields of power struggle. Examining the socio-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the Desire Body uncovers how, with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1950s America, individuals are swept into macro-level ideological violence and the workings of the state apparatus.

**Keywords:** Philip Roth; *Indignation*; Desire Body; Narrative Dynamics; Situated Body

## 1. 引言

“身体”不仅是肉体存在，还是情感、文化和历史交织而成的复杂整体。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在他长逾半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来关注身体在故事中的角色，小说《愤怒》（*Indignation*, 2008）即为一例。小说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社会为背景，讲述犹太青年马库斯·梅斯纳（Marcus Messner）为逃离父亲的精神控制转学至温斯堡学院，在与校方冲突后被送往朝鲜战场并丧生的悲剧，罗斯通过马库斯的悲剧“将战争呈现为道德失败”<sup>[1]</sup>。虽然《愤怒》并未取得创作上的突破，但它“为罗斯的叙事以及叙事构建主体‘真相’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转变”<sup>[2]</sup>，以及罗斯历史书写的转变：更强调“灾难如何轻易发生”和“历史偶然性与

- 73 -

---

作者简介：李思宇（2001-），男，重庆开州，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

通信作者：李思宇；通信邮箱：[louiselibere@gmail.com](mailto:louiselibere@gmail.com)

随机性之残酷”<sup>[3]</sup>。国外学界对《愤怒》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阿尔达玛（Frederick Luis Aldama）通过认知科学分析小说，指出罗斯展现出“对角色心智和认知的敏锐刻画”<sup>[4]</sup>；布鲁维勒（Claudia Franziska Brühwiler）将文本置于冷战语境，认为主人公“不仅与自己不确定的身份作斗争，还与政治环境作斗争”<sup>[5]</sup>；肖斯塔克（Debra Shostak）聚焦父子关系，指出马库斯被“父权秩序的僵化规则所杀——尽管这些规则本是为了保护后代”<sup>[6]</sup>；麦金利（Maggie McKinley）认为马库斯的悲剧是“仪式化或仪式的过度延伸”，其屠夫之子的身份使他深陷“犹太屠宰仪式的精神困扰”<sup>[7]</sup>；赫斯（Brittany Hirth）则从创伤理论切入，指出“在战场负伤是他一生中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但这一创伤经验在叙述中被刻意“延后”了<sup>[8]</sup>。国内学者如朴玉、孟宪华和罗小云等主要关注该部小说中的国家规训与历史书写，李雨然和杨金才对《愤怒》叙事策略的研究也从“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和副文本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这部小说中独特的叙事策略”<sup>[9]</sup>。

既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路径，虽触及身体意象（如血）却未充分关注小说中的身体及其叙事功能。本文以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身体叙事学为框架，结合身体情境化的理论修正，论证马库斯的身体欲望如何触发关键情节转折最后推动故事走向悲剧，并解读马库斯和奥利维亚（Olivia）欲望与身体在性别、政治和宗教维度蕴含的深层含义，由此指出该理论需延伸至社会历史政治等宏观维度，方能解读个体命运透露出的宏观暴力。

## 2. 身体转向与身体叙事学

西方哲学对身体的研究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建立了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笛卡尔沿袭了此种框架，认为身体是精神的对立面、依附于灵魂而存在。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身体转向”（Body Turn）颠覆了此身心二元论传统：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率先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将身体视为行动与思维的根基<sup>[9]</sup>；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建立起身体性在世的思想，强调知觉通过身体向世界敞开；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认识到历史是身体的历史，“正是在对身体做各种各样的规划的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sup>[9]</sup>。一众哲学、社会学身体研究著作的出现，“既是身体研究蓬勃兴起的标志，也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成为席卷欧美的持续理论热潮”<sup>[10]</sup>。

批评家们也在热潮之下重建身体在文学中的地位。身体研究与叙事学结合产生了身体叙事学，丹尼尔·庞德（Daniel Punday）的《叙事身体：建构身体叙事学》（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讨论身体对情节、人物塑造的影响，可谓身体叙事学的先驱之作。但庞德试图构建的身体叙事学忽视了身体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没有真正把身体与叙事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sup>[11]</sup>。同时期的彼得·布鲁克斯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中从精神分析学出发构建了一种“身体动力学”，即现代艺术如小说与绘画中推动叙事展开的动力是身体。他提出欲望及其欲望对象（即身体）是意义的场域，是“刻录故事的地方，是一个能指，是叙述情节和意义的最主要的动因”<sup>[12]</sup>。

在布鲁克斯那里，各种身体类型（垂死的）之中，对叙事影响最深的是具有性（sexuality）的、性别的与性心理的身体，但此处的性并不是简单的生殖性（geniality），而是将自己视为有性别、有性欲的生命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与性别差异、出身和自我定义等问题互为因果”<sup>[12]</sup>。全美性信息和性教育委员会（SIECUS）所定义的性欲是存在于“两耳之间”（between the ears）而非“两腿之间”（between the legs）的，布鲁克斯所言身体欲望同样并非生理肉欲，它混合着个体各种对自我和他人的想象，这种想象决定了个体身份。布鲁克斯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于将其叙事化，考量欲望和身体的叙事功能。身体叙事学除了是一种“身体动力学”，还关注身体的意义，认为“叙事寻求建立一种身体符号学（body semiotic），把身体标记或者铭刻为语言学的、叙事的符号”<sup>[12]</sup>，叙事就是身体的符号化（semiotization）过程。某一个体对其他身体产生欲望，给欲望身体打上记号，由此身体负载着意义并成为叙事的能指。然而布鲁克斯的理论存在两个关键空白：其一，身体符号化的具体机制未被阐明；其二，身体欲望与个人具体情境乃至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遭到悬置。

国内学者欧阳灿灿则结合梅洛-庞蒂的情境身体，把欲望身体进一步界定为“情境化肉身”，“更强调欲望肉身是情境化的和关系性的”，并且欲望必然指向某种情境，“它始终处于关系情境即拉康所言的能指符号网络之中”<sup>[13]</sup>，其意义生成依赖于具体情境的交织。她认为，欲望身体是

情境中的身体，“体现了人的情境性存在状态”，理解身体感觉和身体处境，方能理解他人、理解文本<sup>[13]</sup>。这意味着，解读小说中的欲望身体必须同时关注符号与情境的双重作用，身体只有置于具体情境之中才能展示出多层次的内涵。

身体叙事学和情境身体的结合为研究菲利普·罗斯的作品提供了钥匙。罗斯创作中的身体叙事“充分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本真状态”<sup>[14]</sup>，《愤怒》则延续此一贯特色：马库斯对女友奥利维亚的欲望与身体描写构成了一条贯穿叙事的“肉身线索”，她的身体是布鲁克斯所言“欲望对象”的典型，不仅激发了马库斯的欲望，其手腕伤痕更是成为叙事符号网络中的核心能指。下文将聚焦小说中马库斯的欲望和身体是如何推动叙事从校园走向战场的，以及身体背后的性别、政治与宗教意涵。

### 3. 男性身体：欲望背后的性别焦虑

故事开始迅速进入了马库斯和父亲的争吵，他赌气想到要离家出走，然后“可能顺带染上花柳病”<sup>[15-1]</sup>，继而，马库斯无法忍受父亲禁锢离开了纽瓦克，他自述选择温斯堡大学是因为看到一张男女在校园并肩而行的照片。与基督教传统不同，“犹太传统对性爱持肯定态度。性爱指向民族繁衍，和谐的性爱符合犹太对于完整和智慧的追求”<sup>[16]</sup>，19岁马库斯的性意识很大部分来自于他所在的犹太家庭与社区、深植于其犹太身份，他的“欲望身体”在此情境下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诉求与存在。然而，马库斯搬到宿舍后对室友都是犹太人感到失望，他想：“我千里迢迢离开家到遥远的俄亥俄求学的目的之一，是它让我有机会置身于非犹太人中间，体验那是什么感觉”<sup>[15-2]</sup>。读者在此不难把马库斯与罗斯笔下其他犹太主人公联系起来：祖克曼、波特诺伊、凯普什等无一不是在伴侣选择中更倾向甚至沉迷于非犹太女性（shiksa/gentile woman），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shiksa是马库斯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非犹太人或者说主流美国人）所欲之物，他也将其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马库斯自小在纽瓦克的犹太家庭和社区中成长，父亲的严苛管教与犹太的社群排他性，使他自幼便感受到身份的束缚与禁锢。这种“情境化身份”一方面强化了他对非犹太女性身体的好奇与向往——将异族女性视为脱离家族与社群规训、实现身份越界的象征；另一方面，他对性的渴望也因反抗父权与寻求同化而被放大，将对女性身体的凝视与占有投射为对自由与自我肯定的追求。这里的“性别”是一种结果而非缘起，犹太家庭情境带来的“性意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生产了马库斯的性别观，家庭中的犹太规范与边界从一开始就深刻塑造了他对身体、性与亲密关系的理解与欲望动机。

如果说离家只是青春叛逆对“她”意象的懵懂追寻，那么马库斯在图书馆对奥利维亚的凝视则完全显现了身体欲望的迸发。奥利维亚“秀发中间的分缝”和搭在右腿上的“左腿”让马库斯失去了抵抗力，他回忆道：“我唯一能做的事，是盯着她头发被一道笔直的发线分成两半的样子，以及他从未停止过的上下摆动的腿。我并非第一次想知道，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样摆腿是什么感觉”，“沿着她裙子向上抚摸的念头”和“想冲到厕所去的强烈欲望”<sup>[15-3]</sup>也直指马库斯这个19岁青年渴望摆脱童身的强烈欲望。在这段弗洛伊德式的、充满欲望意味的身体描绘中，奥利维亚的身体被“打上印记”，“发缝”和“小腿”的意象以及“上下摆动”的动作在罗斯这个深谙精神分析学的小说家笔下，无疑是性幻想的投射。在身体叙事学中，“视觉中渗透着无法摆脱的欲望因素之后，情形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操控叙事的动力不再是精神与意识，而是身体的欲望”<sup>[13-3]</sup>。马库斯的欲望与身体自图书馆开始主导故事的走向，奥利维亚的身体在叙事中成为了符号性的、叙事性的身体，它被卷入故事，“从而产生人物的心理情感轨迹与人生经历，并由此而产生作品的不断发展的故事情节”<sup>[17]</sup>。

身体和欲望开始驱动叙事，马库斯与奥利维亚身体的初次“亲密接触”则是叙事的转折点。在室友艾尔文（Elwyn）的黑色拉萨尔轿车里，奥利维亚主动俯身为马库斯提供身体快感，奥利维亚的非常规行为打破了马库斯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框架，引发后续的情感困惑，令他“事后几个星期都百思不得其解”<sup>[15-4]</sup>。这是情节的第一次高潮，欲求者的身体欲望得到了满足，又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作了铺垫。马库斯事后向艾尔文分享此事和奥利维亚的来信，艾尔文听罢对其女友进行污名化，暗示其品行不端，马库斯对此无法忍受而搬入了孤立的尼尔楼，脱离了集体生活。

在小说中，疤痕首次出现于奥利维亚的来信中，从此便成为了文本符号网络中无法忽视的能指。和其他罗斯主人公一样，马库斯通过追求非 shiksa 来象征性地获得美国式的男性气质，

“shiksa 对犹太男性来说在性和社会层面有一种幻想式的吸引力”，对 shiksa 的幻想可以转化成一种长久的追求 (quest)<sup>[18]</sup>。奥利维亚的“酗酒史、疤痕、精神病院”引发了马库斯的男性气质焦虑。他把这些过去与“脆弱、坚毅”联系起来，疤痕由此成为了这对男女关系中“欠缺对立” (privative opposition) 的印记，“欠缺对立”指对立的双方中，某方以对方有而己方无的特征标识 (mark) 来定义自身。在马库斯那里，疤痕就是他们关系中的这个特征标识，他甚至对疤痕表现出恋物癖倾向，疤痕是奥利维亚反抗的代名词，而自己则是不敢反抗的“乖犹太男孩”，马库斯“完全被禁锢其中，被禁锢在它的英勇中”。马库斯在回信中声称在约会当晚便“注意到”疤痕，甚至“单凭一己之力就推断出她酗酒的事”<sup>[19]</sup>，通过语言上宣称对疤痕的“全知”，他试图消解奥利维亚此前在汽车内亲密接触中建立的主导地位。在男性主导的传统两性剧本中，“看见”等同于“掌控”——马库斯以此掩饰性接触中实际存在的被动性，这种想象性的“看见”揭示了在认知欲、占有欲身体背后，人物试图补偿的是现实中因性经验不足导致的男性气质焦虑。奥利维亚的身体与疤痕，成为了马库斯性别麻烦的一面镜子。图书馆那段弗洛伊德式的性幻想，呼应精神分析学中“生本能”的“力比多发泄” (libido cathexis)，亦即“拥有的欲望”。但马库斯欲望的满足止步于生理满足，他的主体性和拥有身体的欲望被奥利维亚的主动权颠覆，他忍受不了他人对女友的污名化，或许实质上是忍受不了自己作为男性却成为欲望客体的事实。

#### 4. 规训身体：印记背后的意识形态角逐

马库斯和奥利维亚的亲密接触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在道德规范严格的校园中马库斯开始打破规范，为后续第二次接触被发现埋下伏笔；其次是更换宿舍引起卡德威尔院长注意并与马库斯谈话，这次谈话中双方关系因社交、宗教等方面的分歧变得紧张，最后以马库斯的突然呕吐告终。呕吐不仅标志着情节的转折，更是他被压抑的身体对话语的愤怒抵抗。这一“呕吐的身体”有别于在图书馆中因性欲投射而显现的“欲望身体”，它不是对他者之欲的响应，而是“本我” (ego) 对“超我” (superego) ——即道德审判与权威规训——的剧烈反击。院长以社交礼仪、宗教规范等话语层层压制马库斯，他的焦虑与愤怒在无意识中化为生理冲动。呕吐作为一种排泄行为是对“贱斥物” (the abject) 的驱逐，它将“非我” (not-me) 建构为贱斥物，从而建立了身体的疆界，而身体的疆界也是主体的第一界线”<sup>[19]</sup>。马库斯呕出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还是院长所代表的象征秩序——校园规范、父权道德与宗教控制交织成的压迫结构。在一连串理性词句之后，突如其来地呕吐打断了对话的逻辑链，令读者切身感受到被压抑的力量瞬间爆发：呕吐成为了对话语具身化的反抗，将愤怒在最“污秽”的形式中呈现出来，是欲望之外的另一维度的身体政治。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事件源自身体和身体欲望，一旦发生又反过来作用于身体，欲望驱动的身体行动 (亲密接触) 打破了马库斯生活的原有平衡，继而迫使角色进入新的冲突情境 (与校方对立)。谈话过后，马库斯再次因为朋友考特勒 (Cottler) 对奥利维亚的污名化而怒火中烧，和艾尔文对身体的污蔑引起的怒火如出一辙，这引发他阑尾炎发作、恶心呕吐不止进而住进了医院。叙事至此，身体线索已经取代线性的时间线索成为了情节发展的驱动内核。

而身体在小说中的所指，除个人维度的性别政治和话语反抗，还勾勒出 20 世纪 50 年代的意识形态图谱。欧阳灿灿指出，视觉所把握的既是认识的对象也是欲望的对象，于是小说中“总是涉及对身体、身体转喻物与隐私生活领域的好奇心、观察与窥探”<sup>[13]</sup>。奥利维亚到病房探望时，马库斯对疤痕背后的故事感到好奇，他的好奇心、窥探欲和恋物癖指使他追问奥利维亚的家庭背景，此时她的脸上却“完全失去表情”，她以“放聪明点 (Practice tact)”冷硬回绝，刻意回避相关话题<sup>[15]</sup>。疤痕作为奥利维亚自杀未遂的创伤性能指，其所指在此被隐瞒，指向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创伤”——它无法象征化，所以被安置在词语丢失的地方，它的所指始终以“未知”形式存在，却以这种形式扩大了所指的可能性。疤痕的所指可从奥利维亚的来信中窥视一二，她说“我来这，是因为它够保守——据说那会把我纠正成一个正常的人”<sup>[15]</sup>，换言之，奥利维亚由于她的自杀行为已经被建构成为了不正常的人，即“疯女人”，这种正常/不正常的二分法所暴露的则是保守主义的温斯堡学院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规训本质。

民主党治下的战后美国，自由主义思潮节节上升，共和党人伦茨校长手下的温斯堡学院则是保守主义的阵地。在自由主义的个人观看来，自己的身体是可以由个人所自由支配、处置的私有财产，基于这种观念，许多人认为对自己的身体有施加催吐、割腕甚至自杀等暴力行为的权利。

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保守校园语境中女性身体并非这种自主性个体，而是“被观看”与“被解释”的对象。而事实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付诸流放，是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这片最后的领土，再没有了其他谈判和威胁的资本。而对奥利维亚自身身体这片最后的领土，权力仍要争夺。在学院、家庭与奥利维亚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背后，所蕴含的实际是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个人身体维度的意识形态角逐，在罗斯的笔下，身体及其印记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微观战场。

而后马库斯与奥利维亚在医院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或者说，马库斯的欲望身体，直接引发了与校方的冲突。二者在病房内的亲密行为被护士目击，这一隐患最终被院长当作“道德污点”和指控他导致奥利维亚怀孕和精神崩溃的证据，马库斯回溯道：“因为奥利维亚用手那一记快速的抚摩，我得到的回报是去朝鲜”<sup>[15]</sup>。的确，与院长发生冲突过后，马库斯的大学生涯已然宣告走向尾声，他被开除继而送往战场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一系列由身体欲望引发的事件中，马库斯的每一次选择都基于即时身体需求而非理性考量，欲望驱动的莽撞行为不断累积风险，使马库斯逐步丧失对命运的控制权，最终导致他战死朝鲜的悲剧。

## 5. 他者身体：征兵背后的政治驱逐

奥利维亚的身体是美国国内党派较量的战场，而马库斯的身体被送上战场同样投射出美国国内与国外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朝鲜战争正值美苏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中高度警戒，“出现了一种防止任何持有非正统的、左翼的政治观点或曾经怀有此类想法的人士出现的狂热执念”<sup>[20]</sup>，而美国式的正统的价值观大多源自于清教传统，保守主义人士信仰上帝，他们将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作为异己排除。而共产主义则是赤裸裸的无神论，“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反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还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在信仰问题上的一场殊死搏斗”<sup>[21]</sup>，这就使得并不信仰上帝或清教的美国人置身于成为“红色恐怖（Red Scare）”的危险。马库斯在与院长的对峙中大量背诵伯特兰·罗素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而院长“卡德威尔是这儿最虔诚的基督教徒”<sup>[15]</sup>，马库斯的行为对院长来说显然无法接受。院长宣称马库斯有权崇拜罗素，但同时也声明担忧马库斯在温斯堡“格格不入”，“有些问题似乎需要及时处理”。紧接着马库斯就以亡灵的视角回溯道：“那就是我为什么被征入伍和被杀害的原因”<sup>[15]</sup>。罗斯在此透过院长的话语和马库斯的回溯，暗示马库斯已经对国家机器构成了“红色”威胁，在冷战初期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将被斥为“红色”“他者”的身体送往战场的征兵，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色彩，其中彰显的恰恰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国内对异端意识形态的排斥与政治驱逐。

此外，尽管马库斯宣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学院在他入学伊始便为其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马库斯自身有意摆脱他的犹太身份，但他对奥利维亚的疤痕和自杀的想象却说明他的身体和认知已经被深深地情境化、犹太化了。在犹太律法里，屠宰手（shochet）要在喉咙处一刀完成对牲口的宰杀，并将牲口倒掉至流完血为止。马库斯将奥利维亚的自杀行为与犹太屠宰仪式平行，认为“那正是奥利维亚企图做的，依照犹太教规，用放干自己血的方式自杀”，“奥利维亚那道泄露秘密的疤痕，来自她试图对自己施行宗教式的屠杀”<sup>[15]</sup>。马库斯以自己犹太屠夫之子身份带来的认知惯性来想象和解读女性身体，这恰恰印证了情境化的身体叙事学观点——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依赖于阐释者的情境位置。马库斯对疤痕的屠宰联想，揭示了其作为犹太屠夫之子的身份困境，也正是社会与学院对犹太人施加的刻板印象，马库斯这类罗斯笔下的犹太男性总在追寻非犹太女性、摆脱那个生他养他的犹太共同体，而身体的犹太印记却早已暗中宣告失败。遗憾的是，无论马库斯是无神论者还是犹太教徒，他最终都逃不脱在温斯堡“被他者化”的命运。用校长的话说，温斯堡是一个培养道德、爱国和高尚个人的基地。这便是这座学院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规训和惩罚是它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库斯自己的欲望身体和奥利维亚的相互作用，小说中其他角色的欲望也引发了连锁反应，成为了推动马库斯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在和院长冲突过后，马库斯回到宿舍发现里面一片狼藉，他的私人物品被曾经的同性恋室友弗鲁塞（Flusser）当成了宣泄欲望的对象，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紧张焦虑使他盲目接受了考特勒的兄弟会邀请，并雇人代他参加基督礼拜的建议。这个“最终的错误”，成为了他被实际上不容宗教自由的校方开除的导火索。

纵观上述情节，菲利普·罗斯在《愤怒》中构建了一条由欲望身体驱动的叙事链条：两次关键的“亲密接触”引发人际冲突进而招致来自学校这个国家机器的权力审查，每个环节都由具体身体行动衔接。马库斯的每一次欲望满足都带来更大危机，他的欲望决策始终具有“当下性”，而其引发的后果又如同定时炸弹般延后爆发，如同滚雪球般将他推向绝境。马库斯·梅斯纳的每一次身体行动，都成为打破平衡、触发冲突的关键事件，推动故事滑向不可逆转的悲剧，他的身体是“叙事中的关键记号，叙事内涵的一个核心连接点”<sup>[12]</sup>。菲利普·罗斯通过这种严密的行动逻辑证明，命运的悲剧有时并非源于抽象的命运无常或历史的偶然相遇，而是个人的欲望身体和规训体制之间的必然碰撞。马库斯的悲剧性在于，他试图通过满足或掌控自身的欲望身体，他获得了个人认知层面的身体自由，欲望身体本身却沦为了权力的切入点。

## 6. 结语

布鲁克斯的身体动力学为认识身体的叙事功能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在解读身体时遭遇到了困境：仅关注身体的叙事动力学，则无法解释《愤怒》等小说中身体与疤痕此类意象如何承载性别、政治与宗教的多重所指；情境化的身体虽能揭示在不同语境下流动的身体，却不能深入历史、社会等宏观维度。这种关注欲望和叙事功能的理论首先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种族与阶级等意义上的身体，例如马库斯在屠宰房内劳动的、犹太的身体；其次，将欲望简化为“叙事动力”可能削弱身体所蕴含的政治批判性，例如奥利维亚的创伤身体更需置于冷战美国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布氏身体叙事学虽然有其缺憾，但作为一种叙事学理论，显然区别于流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经典叙事学”；同时，以“欲望”为焦点的叙事研究也拓展了精神分析学的解读潜能；在“身体转向”的潮流之下，其更是为身体研究在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菲利普·罗斯的《愤怒》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中的身体叙事是一部欲望与反抗的微观史诗，通过身体叙事学来解读，读者得以理解当代欧美小说家是如何通过身体及其欲望来构造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并将身体刻画成时代与社会的“印记”。

### 参考文献：

- [1] HIRTH B. Scandals and Battle Wounds[J]. Philip Roth Studies, 2021, 17(1): 8-27.
- [2] ROYAL D P. What to Make of Roth's Indignation; Or, Serious in the Fifties[J]. Philip Roth Studies, 2009, 5(1): 129-137.
- [3] SHIPE M. After the Fall: The Terror of History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8, 14(1): 1-24.
- [4] ALDAMA F L. Putting a Finger on That Hollow Emptiness in Roth's Indignation[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1, 7(2): 205-217.
- [5] BRÜHWILER C F. Political Initiation in the Novels of Philip Roth[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6] SHOSTAK D. Fictive Father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M].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 [7] MCKINLEY M. Blood, tradition, and the distortion of ritual in Philip Roth's indignation[J].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981-), 2014, 33(2): 186-201.
- [8] 李雨然, 杨金才. 菲利普·罗斯《愤怒》中的叙事策略及其政治意蕴[J]. 外语教学, 2022, 43(04): 100-106.
- [9]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10] 欧阳灿灿. 欧美身体研究述评[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02): 24-34.
- [11] 许德金, 王莲香.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04): 28-34.
- [12] BROOKS P.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3] 欧阳灿灿. 叙事的动力学:论身体叙事学视野中的欲望身体[J]. 当代外国文学, 2015, 36(01): 146-153.
- [14] 李俊宇. 存在、伦理、身份——论菲利普·罗斯创作中的身体叙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06): 56-61+78.
- [15] 菲利普·罗斯. 愤怒[M]. 张芸,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16] 薛春霞. 越界、争执与突破——批评家眼中的菲利普·罗斯[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7(03): 134-142.
- [17] 欧阳灿灿. 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8] JAHER F C.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hiksa[J]. American Quarterly, 1983, 35(5): 518-542.
- [19]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Routledge, 2006.
- [20] SMITH C R.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How the U.S. Government Suppress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ring Major Crises, Second Edition[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 [21] 王恩铭, 王卓. 战后美国保守主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 《为奴十二年》中的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

向君如<sup>1\*</sup>, 杨月妮<sup>2</sup>, 吴群涛<sup>1</sup>

(<sup>1</sup>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sup>2</sup>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第 8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除了讲述黑人群体被他者化的屈辱历史，还隐含着一种被种族化了的性别意识形态。结合他者理论分析发现，黑人男性的传统男性气质逐渐消弭，他们被迫赋予了过多的女性气质；黑人女性在保持女性气质的同时，被迫展现过多的男性气质。在美国流行文化中，黑人性别意识形态对立于白人性别意识形态，这被用于证明黑人文化的劣等性，从而为种族不平等制造了合理借口。因此，黑人无需通过迎合白人父权制的性别规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减少媒体对黑人群体同质化、刻板化的塑造是阻止白人霸权逻辑再生、实现种族平等的关键。

**关键词:**《为奴十二年》；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他者化

## On the Raced Gender Ideology in *12 Years a Slave*

Xiang Junru<sup>1\*</sup>, Yang Yueni<sup>2</sup>, Wu Quntao<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sup>2</sup>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86th Academy Award-winning film *12 Years a Slave* not only recounts the humiliating histor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s otherization but also implicitly contains a raced gender ideology. An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theory of the Other reveals that the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of African American men gradually diminishes, while they are increasingly assigned excessive feminine traits. Meanwhile,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hile retaining their femininity, are compelled to exhibit excessive masculine traits. In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the raced gender ide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s is positioned in opposition to that of white Americans, serving to justify the inferiority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reby providing a rationale for racial inequality. Therefore, African American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validate their worth by conforming to the patriarchal gender norms of white society. However, reducing the media's homogenized and stereotypical portrayal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s crucial to dismantling white supremacist logic and achieving racial equality.

**Keywords:** *12 Years a Slave*; raced gender ideology; masculinity; femininity; otherization

## 1. 引言

种族关系是美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也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心。荣获第 8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为奴十二年》改编自非裔美国人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说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作为美国北方黑人、小提琴家，所罗门被拐骗、继而被贩卖为奴，

在南方种植园遭受了长达十二年的奴役，最终获得自由。影片一经上映，就因其对黑人身体伤痕的直白呈现以及奴隶制对黑人的无情摧残引起了广泛热议。白人不仅制定法律和奖惩规训制度来控制黑人的身体和精神，还通过塑造一种被种族化了的性别意识形态来进一步巩固种族不平等。

黑人性别意识形态是指在后民权时代，当性别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加剧时，一种塑造黑人男性气质和黑人女性气质的系统意识形态。而黑人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把种族不平等的责任转嫁给黑人自身<sup>[1]</sup><sup>[2]</sup>，以合理化白人的种族压迫。该意识形态在《为奴十二年》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黑人群体在性别与种族交织压迫下的复杂困境。

学界对《为奴十二年》的研究成果颇丰，多聚焦种族主义、凝视、反凝视以及身份认同等议题。有学者关注到了黑人女性在性别与种族上遭受的双重压迫，但往往只是将这两种压迫简单叠加起来讨论，忽视了性别与种族的交叉性关系对黑人整体的影响。基于他者理论，剖析影片中的黑人性别意识形态，有助于厘清背后的种族压迫逻辑。

## 2. “他者”与后殖民批判

“他者”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就曾谈到“同者”（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自我”是认知世界的中心，而外部世界则是被客体化、被观察和被认知的对象<sup>[2]</sup>。黑格尔通过奴隶主和奴隶的辩证关系，论证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sup>[2]</sup>。20 世纪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进一步深化阐释了“他者”概念。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批判了西方意识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法，认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sup>[2]</sup>。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者的凝视有助于个人自我意识的塑造，但同时也意味着被凝视者被客体化、对象化<sup>[2]</sup>。列维纳斯则从伦理学角度强调，对于自我来说他者是不可知的，他者带有一种神秘感与威胁性。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就是自我不断消化、吸收他者，不断将他者纳入自我意识的过程<sup>[2]</sup>。

“他者”概念首先被女性主义引入，借以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sup>[2]</sup>。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他者”概念不再局限于性别领域，而是延伸到被种族主义、阶级制度等建构为他者的其他弱势群体。1978 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批评的问世，即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发难、诘问与批评、解构与重写<sup>[3]</sup>。“他者”概念被后殖民批评广泛运用于分析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在美国的种族语境下，“他者”概念常常用于描述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群体。这种他者化的过程与东方主义中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被视为东方主义的本土化表现。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支配、重构与权威建构的一种文化模式<sup>[4]</sup>。西方将东方塑造为一个静止、沉默的他者，只能由西方代为发声。为此，西方构建了一套表征体系、文化霸权与强势话语，以确立其对东方的解释权与支配地位<sup>[5]</sup>。具体而言，西方通过将东方建构为“非理性、静态、懒惰、纵欲、女性化”的他者，反衬出自身“理性、进步、勤奋、克制、男性化”的优秀品质，利用这一系列二元对立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西方霸权所构建的这种话语体系是与东方现实无关的“东方主义”，其本质是欧洲中心主义<sup>[6]</sup>。

西方以“东方化东方人”为目的的“权力与知识的共谋”至今仍在持续<sup>[5]</sup>。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这一文化霸权机制得以延续。影片通过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的塑造，将黑人再现为沉默的他者，巧妙为白人观众的道德视角服务。这正是萨义德所批判的“文化霸权”或“西方优越论”的具体表现：它并非直接宣称黑人是劣等种族，而是通过证明黑人不符合白人传统性别规范，将黑人归为不文明、不正常、不值得平等对待的群体，从而在文化层面合理化了对黑人群体的歧视与贬抑。

### 3. 黑人男性：被压制的男性气质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将黑白关系的逻辑拆解为：白人男性认为自己比黑人男性高等，而黑人男性则想要付出一切代价证明自己和白人男性拥有同等多的智慧，以换取认同，最终导致黑人男性生成一种自卑情结<sup>[7]</sup>。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承认了白皮肤的优越性，并将自己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视为缺陷<sup>[7]</sup>。

在语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同塑造下，白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主导和附属的关系。黑人男性被凝视、物化，最后成为了阳具（penis）本身，丧失了象征意义上的性能力<sup>[8]</sup>，成为了白人的工具和附属品。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白人通过身份降格、尊严剔除与规训机制等手段来压制、扭曲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

黑人男性气质的压制首先是通过身份的降格。在所罗门被拐卖初期，他被人贩子们痛打和凌辱，被迫承认自己是逃奴、被迫换上奴衣、被迫舍弃本名、被迫销毁身份凭证，甚至被迫在众目睽睽下洗澡。这一系列行为是白人霸权对黑人男性实施“去男性化”计划的第一步。在所罗门与木匠主管约翰·提比茨的冲突中，提比茨以“黑鬼”“畜生”等语言侮辱、攻击所罗门，甚至对其滥用私刑。他对忤逆者报之以咒骂，对反驳者报之以鞭打，对反击者报之以死刑，极力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讽刺的是，即便在白人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主管，也能在黑人男性身上找到优越感。黑人男性的身份降格和被迫顺从被白人至上主义者塑造成父权制定义的女性气质，并不断被传播、强化，进一步巩固了白人的权威和地位。

黑人男性在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面前也尊严尽丧，失去了在女性面前充当“保护者”的权利，男性气质进一步被压制。在电影中，福特与埃普斯分别代表“温和”与“暴力”两种风格。福特采用言语呵斥、心理威慑等方式压制所罗门的反抗意识，而埃普斯使用鞭刑、凌辱等方式来抑制索罗门的身体力量、精神力量。他们自认为白人阶层的规则和逻辑具有绝对权威性，任何质疑、挑战，甚至是形式上冒犯这种权威的黑人，都会被公开惩罚、凌虐。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惩罚常常会公开透明地在黑人女性面前进行，例如影片中帕茨目睹所罗门被鞭打的场景。这种仪式化的惩罚是对黑人男性的性别身份的彻底否定，使他们失去了刚勇的传统男性气质，被迫展现出脆弱、顺从等被白人父权制社会定义为“女性化”的特质，变得毫无尊严。

在白人女性面前，黑人男性也丧失了男人气概的表现空间，例如，白人女性埃普斯夫人警告所罗门：稍有不慎就会挨鞭子。这种规训表明黑人男性在白人女性面前必须保持沉默与服从。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黑人女性帕茨因被认为有错而被惩罚时，埃普斯夫人命令所罗门亲手用鞭子抽打她。这是典型的白人女性因肤色优越而对黑人女性的统治和掌控，也是黑人男性在复杂的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塑造中的困境：黑人男性不仅不可能充当“保护者”的传统男性角色，还要被迫成为白人女性的权力工具，成为压迫黑人女性的帮凶，从而在一次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违背自己的道义，一步步沦为丧失主体性的他者。白人女性并没有真正地将所罗门当作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她们也不希望所罗门拥有任何自主性和抵抗意识，因为在她们看来，在白人的权力结构中，黑人男性应该永远只是一个工具，甚至不如某些黑人女性。白人女性甚至认为，白人男性必须不断向黑人群体展示力量，以彻底根除其反抗的念头。因此，黑人男性被贬低为“弱小的黑人男性”，个人尊严全无。

所罗门深知，直接的暴力反抗只会像其他逃亡黑奴一样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伪装成顺从的奴隶，在繁重的劳力与精神压迫之余寻找机会逃离苦海。在思想进步的木匠巴斯的协助下，所罗门成功将求救信送至朋友手中，最终被从奴隶制中解救了出来。所罗门的隐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白人塑造的性别意识形态的被动策略，但他最终的反抗则是对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可以被视为一种被压抑许久的男性气质的最终爆发。

黑人男性气质的压制和扭曲还源于白人的规训机制。白人通过责罚、奖赏和训导等手段，框定黑人男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对于反抗的黑人男性，白人采取直接清除的方式，以维护其绝对权威；对于顺从的黑人男性，白人则通过奖励或降惩的方式来强化这种服从行为，让他们成为支持奴隶制的工具或帮凶。在南下的船上，所罗门遇到了两个黑人男性：一个是具有抗争精神的北方黑人，另一个则是苟且活着的克莱门斯。前者在救黑人女性伊莱扎时被白人刺杀，尸首被弃河中。这是对黑人男性在白人绝对权威之下无力感的形象呈现，同时也说明，在白人面前，任何试图展现自己传统男性气质的黑人都面临付出生命代价的风险。因此，黑人男性面临着两难困境：

由于自身尊严、权威与性魅力被白人压制，自己无法成为黑人女性依靠的对象，即使对黑人女性拔刀相助也无济于事。然而，若黑人男性不为黑人女性挺身而出，他们同样也会因为自己的懦弱无能而难以维系自身的男性气质。相比之下，克莱门斯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生存策略。他表现出一种犬儒态度，在黑人女性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摇尾乞怜，在白人的规训机制下逐渐被赋予顺从、软弱等“女性化”特点。但不可置否的是，克莱门斯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不单纯是他个人的选择，更是被压迫群体内部逐渐分化出来的生存策略。这种策略本身就是白人霸权统治的产物，它破坏了黑人内部的团结，从而使反抗难上加难。因此，在白人的规训机制下，无论反抗还是顺从，这两类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终究都会变形、扭曲。

#### 4. 黑人女性：性别气质的困境

黑人女性的性别气质特点比黑人男性更为复杂。种族、性别和阶级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sup>[9]</sup>。这一特点在黑人女性的双重工具化中有所体现：她们既要保持女性原有的气质特征来满足白人男性的性欲望，又被迫展现相当多的男性气质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遭受白人男性的压迫，黑人女性还要忍受白人女性的嫉妒、欺压和边缘化。

与白人女性不同，身为黑奴的帕茨不得不对白人男性埃普斯低眉顺眼，同时她凭借优秀的采摘能力，有着出众的经济价值。她的温顺性格与强大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埃普斯而言，成功征服这个既强大又极具女性魅力的帕茨，不仅能在一众黑奴面前彰显自身的权威，还能压制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来突出自身的男性魅力。埃普斯对帕茨的性骚扰不仅发生在夜晚，他还会在安息日时刻关注她的动向，对所有靠近她的男性都报以敌意，反映白人男性企图通过身体暴力来巩固自己性权利的心态。同时，黑人女性被塑造为强悍且能干的劳动者，她们的身体因此被合理化为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的资源，以便于种族资本主义的剥削。例如，像帕茨这样具有出色采摘能力的黑人女性就被称作“采摘女王”，但这一荣誉并未带给她实质性的地位提升，反而成为白人男性借此操纵黑人男性竞争心理的工具，从而提高黑人男性的劳动效率，为白人带来更多利润。黑人女性被迫过多展现的男性气质特征，还被用来压制黑人男性的尊严，因为与女性相比较更能削弱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而白人男性则自始至终保持最高权威，拥有最强的男性气质。

对黑人女性进行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塑造虽有利于白人男性，但也让白人女性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安。帕茨身上顺从的女性气质让埃普斯夫人心生妒火，为了维护自己作为白人女性的优势地位，埃普斯夫人使用了许多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毁坏帕茨的容貌、没收肥皂，以及施用身体暴力，来削弱帕茨的女性魅力。从埃普斯夫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她认为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女性气质是此消彼长的，通过削弱帕茨的女性魅力，自己的女性魅力便得到增强，证明自己更符合白人男性定义的标准，进而赢得白人男性的庇护和认同。埃普斯夫人即使有着优越的白皮肤，但她同时作为女性，在父权制体制下生活往往身不由己，她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是，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促使她成为种族不平等体系中的帮凶，她同时也是种族主义的施暴者。于她而言，伤害帕茨既能平息自己的妒火，又能警告丈夫，是她在维护自身在父权制体系内相对优势地位的策略。为在不平等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权力结构内部较为弱势的群体会对更为弱势的群体进行压迫，恰好符合统治者“分而治之”策略的利益，也说明边缘群体更容易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社会的不平等氛围因此被不断复制，形成恶性循环。

帕茨展现出的顺从的女性气质引发了白人女性的嫉妒心，她所具有的独立和自主意识也使她遭受到了白人女性的排斥和边缘化。帕茨拒绝埃普斯的性要求，这理应符合埃普斯夫人的利益，但居然反而遭到她的嫉妒。因为帕茨展现出的独立与勇敢，不符合包括埃普斯夫人在内的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所期待的“低等”人格设定，不利于白人女性种族优势的发挥。帕茨对所罗门示好，是她在黑人社群内部展现自己女性气质的一种方式，这也与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期待相悖。因为这是对埃普斯男性尊严的冒犯，是对白人男性权威的挑战。在白人男性主导下，黑人女性的身体和情感可随意被支配，帕茨的独立自主意识远远超出了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容忍范围，加剧了这种双重压迫。

除帕茨外，被迫与子女分离的黑人女性伊莱扎和委身于白人奴隶主的肖夫人也难逃他者化的牢笼。肖夫人为换取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牺牲色相，只敢暗中诅咒白人奴隶主肖。相比之下，伊莱扎的勇敢和智慧展现了她作为母亲的坚韧与不屈，成为极具正能量的黑人女性形象代表。她

曾在船上遭受男贩子的侵犯、羞辱，被卖到福特家后又被迫离开自己的孩子，在布道时因过度思念孩子，破坏了布道氛围，最终惨遭杀害。她曾屈从白人男性主导的奴隶制体系，成为男主人的情人，但在男主人去世后，她和孩子被卖到了南方，这一变故促使她开始与命运抗争，随时随地为孩子哭泣。尽管她力量微薄，却点醒了所罗门。与伊莱扎的交流不仅让所罗门认清了奴隶主的本质：让黑人男性丧失男性气质，沦为顺从的工具。还扰乱了白人男性福特所构建的以白人奴隶主意志为核心的精神体系，而伊莱扎的死亡则成为他开始身体力行进行反抗的导火索之一。

性魅力与顺从曾导致伊莱扎变得不幸，但女性气质中的母性又激起了她的反抗精神，使她展现出强大刚勇的男性气质。不同于帕茨，伊莱扎身上那股强烈的男性气质是被母性激发出来的，并非是被种族资本主义所塑造。由此可见，女性气质并非总是与男性气质相悖，女性可以展现男性气质中的英勇与韧性，男性也可以拥有女性气质中的温柔与细腻，性别气质的融合是人性的自然体现，不应被任何性别意识形态束缚。但遗憾的是，伊莱扎也未能冲破以白人男性为核心的奴隶制体系。在失去白人男性的庇护后，她沦为了白人女性的奴隶。

由此可见，黑人女性无论被塑造出何种性别气质，都将成为白人巩固自身权威的牺牲品，难以逃离种族、性别与阶级三重压迫。

## 5. 流行文化中的性别凝视与种族话语

电影《为奴十二年》通过构建黑人“女强男弱”的性别意识形态，契合了西方观众的道德立场与情感期待，这表明西方以“东方化东方人”为目的的“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在流行文化中不断被重构与再生产。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定义本身就存在刻板化问题。男性气质通常被刻板地与力量、果断、保护和主导等特质绑定，而女性气质则与温柔、顺从、关怀和从属等特质相联系。这些刻板印象被进一步以隐蔽却有力的方式固化和利用。流行文化，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常通过顶级男演员的女性化装扮来固化黑人男性传统男性气质微弱的形象<sup>[10]</sup>。黑人男性因而被塑造为“无能”“软弱”的模样，被遮蔽了人格的真实性和多样性。黑人女性则面临被社会和媒体过度男性化的困境，常被认为是强壮的、好斗的、吵闹的和争强好胜的<sup>[11]</sup>。她们被刻板地描绘成肥胖和过度男性化的形象。<sup>[12]</sup>而非白人女性在角色改造过程中也被刻意塑造成符合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形象，被描绘成狂野、性开放，成为被贴上“怪胎”标签的对象<sup>[13]</sup>。由此一来，黑人的性别表现便被有意地与白人的性别秩序相比较，服务于白人统治与剥削的合法性。因此，黑人女性作为他者，成为白人奴隶主的“女性景观”，她们的身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在白人凝视下逐渐削弱；黑人男性则成为白人权力的载体，承受“全景敞式凝视”下的肉体和精神折磨<sup>[14]</sup>。

从制作策略和摄影技术层面看，电影往往与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结盟<sup>[15]</sup>。在《为奴十二年》中，黑人男性无法获得在父权制中作为正常男性应具备的“保护者”“提供者”等男子气概。他们既无法通过展示传统的男性气质而获得认可、尊重，也无法通过抵抗白人权威而恢复男性气质。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压迫还会导致黑人男性将不满情绪宣泄给黑人女性<sup>[15]</sup>，而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并非是出于黑人男性自己的意愿，而是白人父权制压迫的向下转嫁。

萨布丽娜·斯特林斯（Sabrina Strings）认为，黑人女性的身体遭受着父权制与种族主义的双重异化，将肥胖污名化为粗俗的、不道德的，以此贬低黑人女性，有利于推动精英白人女性主流审美中的苗条身材成为正确的身体形态<sup>[16]</sup>。虽然父权制常常将女性气质与“顺从、柔美、脆弱”等特质捆绑，但实际上，父权制并非简单地以同一个模版定义所有女性，而是根据情况给不同种族的女性贴上不同的标签。具体而言，父权制将黑人女性体魄上的“坚强”“坚韧”等特质当作她们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特征，而不是对压迫环境的适应性结果，遮蔽了他们背后所承受的结构性压迫。这直接服务了种族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既然黑人女性本来就很强大，她们的身体理应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更糟糕的是，由于黑人男性处于弱势地位，黑人女性往往不得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这使得她们身上本就被本质化了的男性气质更加突出，巩固了白人的压迫逻辑优势。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黑人女性在外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作，在内要当家庭中的经济支柱，这符合白人男性对黑人性别意识形态的设想。这充分说明，性别气质其实是流动的、不断被建构的，所有被固化的标签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便于区隔不同的群体，并掩盖权力结构的不公。

通过对黑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形象的深入分析，柯林斯总结出好莱坞电影中所体现的黑人

性别意识形态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文化差异是维持种族边界的关键因素；其次，黑人性别意识形态呈现出黑人男性柔弱、黑人女性坚强的特点，与白人社会的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性别意识形态为种族不平等提供了借口，同时阻碍了黑人的反抗<sup>[17]</sup>。黑人性别意识形态被定位为白人性别意识形态的对立面<sup>[1]</sup>。因此，白人得以将黑人群体内部受损的价值观视为种族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当这种黑人性别意识形态被他们自己内化时，便会促使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相互指责，从而消除了种族歧视的存在与影响。在这种逻辑下，特定阶级的性别意识形态成为解释黑人贫困持续存在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便利工具<sup>[17]</sup>。因此，白人成功构建了一个种族歧视逻辑：当黑人群体的性别意识形态与白人主流规范完全颠倒时，便证明了其“文化劣等性”，从而为系统性压迫披上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合法外衣。

## 6. 结语

电影作为重要的流行文化载体，在反映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塑造着种族和性别话语。主流媒体对黑人群体性别意识形态的刻意塑造，会无意间迎合、延续白人的霸权逻辑，加剧了种族与性别不平等。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要避免给黑人贴上各种本质化的标签，并防止将黑人的价值框定在白人设定的规范当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是要求黑人达到某种既定的标准，而是承认性别与种族的流动性、多元性。因此，黑人群体无需通过迎合某种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相反，媒体应该更真实地呈现黑人群体在人格和性别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只有消除对黑人群体种族化的性别凝视，才能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和性别平等，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和美好的社会。

### 参考文献：

- [1]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 2011, (01): 118-127+159-160.
- [2] 赵侯,张学丽,张辉.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他者” [J].文艺评论, 2014, (05): 38-42.
- [3] SAID E W. Oriental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3.
- [4] SARWAR G, YAMEEN F, AIN Q. Review Of the Book âOrientalismâ By Edward W. Said[J]. Jahan-e-Tahqeeq, 2024, 7(1): 1300-1315.
- [5] 杨月妮,吴群涛.主流话语对“他者”的塑造——论鲍勃·迪伦的歌曲《埃米特·蒂尔之死》 [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3,36(02):72-78.
- [6] FANON F.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Charles Markmann, trans. London: Pluto Press, 1967.
- [7] ELLIOTT M. Reflecting the Man: Gendering Race in Paul Haggis’ s Crash[J]. Canadian Journal of Film Studies, 2017, 26(02): 117-133.
- [8] 康奈尔. 男性气质[M]. 柳莉, 张文霞, 张美川, 俞东, 姚映然,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2.
- [9] TART T T. The Emasculation of the Black Male Image: Building a Better Black Man [EB/OL]. The Linkedin. com. 2018-1-29.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asculation-black-male-image-building-better-man-timothy-tart/>.
- [10] ARANA B. The Masculinization of Black Women [EB/OL]. The Nubian message.com. 2022-4-14.  
<https://www.thenubianmessage.com/2022/04/14/the-masculinization-of-black-women/>.
- [11] KATE N, THREADCRAFT S. Perceiving the Black female body: Race and gender in police constructions of body weight[J]. Race Soc Probl. 2015, 7(3): 213-226.
- [12] 黄涛.从被凝视到反凝视：电影《为奴十二年》中的黑人身体研究[J].新余学院学报, 2018, 23(4): 100-103.
- [13] HOOKS B. Ain’ 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105.
- [14] STRINGS S. Fearing the Black Body: The Racial Origins of Fat Phobi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7.

# 从纸媒到智媒：时尚杂志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探析——以《时尚芭莎》为例

毕博<sup>1\*</sup>, 李英洁<sup>1</sup>

(<sup>1</sup>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在数字技术革命与媒介生态深度变革的双重驱动下，全球时尚产业正经历从“产品中心”向“用户中心”、“单向传播”向“智能交互”的范式转型。以《时尚芭莎》为例，系统分析其从传统纸媒向智能化媒体转型的实践路径与策略，包括全媒体矩阵构建、虚拟人IP开发、技术赋能内容生产等关键举措。可以发现，《时尚芭莎》以技术为轴、内容为核、生态为网，在传播力与商业价值上实现了双重跃迁，但同时也存在利用流量“割韭菜”、技术赋能表层化等问题。通过对《时尚芭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策略总结与问题反思，能够为其它传统报刊、杂志的数字化生存与转型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传播策略；《时尚芭莎》

## Research on the Cover Symbol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Harper's BAZAAR" Magazine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i Bo<sup>1\*</sup>, Li Yingjie<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ecosystem, the global fashion industry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a "product-centered" to a "user-centered" model, and from "one-way communication" to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Taking Harper's BAZAA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practical path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forming from a traditional print medium to an intelligent media,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ull-media matrix,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person IP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content production by technology. It can be found that Harper's BAZAAR, with technology as the axis, content as the core, and ecosystem as the network, has achieved a dual leap in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mmercial value. However, it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reaping profits from traffic" and the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summary of strategies and reflection on problems during Harper's BAZAA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the digital surviv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Harper's BAZAAR

- 92 -

作者简介：毕博（2001-），男，山西运城，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融合新闻

李英洁（1999-），女，山东泰安，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融合新闻

通信作者：毕博；通信邮箱：2071598538@qq.com

## 1. 引言

当今社会，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格局正在被互联网、大数据、社交媒体悄然构建。在数字技术革命与媒介生态深度变革的双重驱动下，全球时尚产业正经历从“产品中心”向“用户中心”、“单向传播”向“智能交互”的范式转型。根据麦肯锡《2024 全球时尚业态报告》，全球超过 70% 的时尚品牌已将数字化转型列为战略核心<sup>[1]</sup>。在如今这个全新的生态传播体系中，面对用户注意力碎片化、广告收入下滑、内容同质化等挑战，很多传统期刊已经淹没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转型迫在眉睫<sup>[2]</sup>。而《时尚芭莎》作为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时尚类期刊之一，在数字化时代仍旧具有较高的热度，现如今在新的传媒竞争格局中率先出击，成功转型，扭转了市场颓势，并持续为大众带来最流行的时尚元素和最新鲜的社会资讯，走在了期刊转型之路的最前沿。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时尚芭莎》从传统纸媒向智媒转型的路径与成效，揭示其如何在新的传播生态中通过内容创新、技术应用、商业化重构及用户策略等手段重塑品牌形象、持续引领时尚文化潮流，并总结出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可取之处，以期为其它传统报刊、杂志出版业的数字化生存与转型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

## 2. 《时尚芭莎》及其转型脉络

《时尚芭莎》的前身是 1986 年由中国中纺集团公司主办的刊物《BEST·CHINAFASHION》，旨在为中国纺织品的进出口服务，后来该杂志又以《BEST·中国时装》的方式在国内发行。2001 年 11 月，该杂志正式与时尚集团合作，更改刊名为《时尚·中国时装》，并由苏芒担任杂志主编。2002 年 9 月，又与全球著名时装杂志《Harper's BAZAAR》进行版权合作。2005 年 1 月，杂志更名为《时尚芭莎》。

### 2.1. 转型初期（2014—2017）：“全媒体网络+跨界合作”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sup>[3]</sup>。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时尚芭莎》借助京东平台，结合自身时尚特性，开启了“芭莎”电商化之路，延长了品牌商业链。与此同时，《时尚芭莎》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始提供电子平台阅读模式，陆续创办了《时尚芭莎》App、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等，拓展内容传播的新渠道、新网络。2016 年，《时尚芭莎》与《刀剑神域》(手游)携手打造动漫人物“桐人”和“亚丝娜”的“世纪婚礼”，引入二次元元素，成功与当下年轻文化挂钩，并联手移动直播平台“一直播”呼吁网民线上参与公益活动，打造“互联网+明星+慈善”的公益新模式，借助明星和公益的双重卖点，积攒了良好的品牌口碑。

### 2.2. 转型加速期（2018-2020）：“高质量出版+数字化重构”

2018 年 11 月，《时尚芭莎》所属的时尚集团宣布与数澜科技合作，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了统一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将数字化思想贯穿到内容的选择、安排、传播和反馈等完整过程中，实现了杂志内部的数字化重构，从技术和管理层面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2019 年，《时尚芭莎》首创沉浸体验式明星互动电子刊，如 2019 年 7 月推出的肖战和王一博封面电子刊等，借助明星效应吸引了大量年轻读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了时尚电子刊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同时也巩固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果<sup>[4]</sup>。2020 年，《时尚芭莎》继续深化数字化转型策略，不断优化内容形式和选题方向，打造了时尚芭莎 App、mini 芭莎微信小程序，同时打通 mini bazaar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b 站账号等与 Z 世代年轻群体的连接，通过多媒体形态的融合，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 2.3. 转型拓展阶段（2021-2025）：“虚拟艺术+先锋时尚+前沿技术”

随着元宇宙的出现，数字艺术藏品不断走红社交网络，绚丽的虚拟时装、动态变化的虚拟配饰等，一切都让数字艺术藏品变得更具体，对此《时尚芭莎》也开始涉足数字时尚与虚拟世界<sup>[5]</sup>。

2022年4月17日,《时尚芭莎》携手梵元科技和平行宇宙共同创作了以“力量即美”为灵感和主题的数字艺术作品——“芭鲨”元宇宙勋章,凭借全新的数字形式致敬了新时代的铿锵玫瑰,通过数字艺术收藏的形式取得了众多Z世代消费者的青睐。2023年1月,根据瑞银的一项研究,ChatGPT的月活跃用户约为1亿,根据Similar Web的分析,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已吸引了约17亿次访问,直至今日,ChatGPT引发的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依旧火热、依旧在改变人类对信息传播的使用和想象<sup>[6]</sup>。与此同时,《时尚芭莎》在2024年4月刊“未来艺术的叙事重构”专题,对AI时代的中国年轻艺术家:刘昕、费亦宁、余一萌等人展开专访,通过中国艺术的视角关注AI时代全球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趋势,探索后人类时代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另类生存形态。

### 3. 《时尚芭莎》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 3.1. “内容+技术”双轮驱动,打造精品阅读矩阵

在智媒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时尚芭莎》通过“内容基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在时装、科技、娱乐等领域构建起立体化内容生产体系,重构了时尚媒体的传播模式,为读者全方位呈现时尚潮流走向,成为智媒时代下“内容+技术”融合的标杆。2019年首创沉浸体验式明星电子刊,采用短平快的形式,利用碎片化时间触达用户,通过明星效应吸引广大年轻读者,扩大了市场份额<sup>[7]</sup>。如《王子异:多面表达,梦想向上》,用户可通过选择AB剧情发展路径,深度参与内容创作、沉浸式体验时尚资讯。2022年适逢元宇宙热潮,《时尚芭莎》选择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科技融合,共邀请8组数字创作艺术家为“来自中国”专题栏目打造虚拟世界中的东方世界,让读者以增强现实(AR)的方式感受特别的阅读体验;2025年,《时尚芭莎》与卡萨帝合作发布了《2025未来家生活趋势报告》,提出了AI作为“生活策展人”的概念,通过AI算法分析家居设计、用户行为数据,预测未来家居美学趋势,从而拓展了内容边界,也提升了在生活美学领域的权威性。

《时尚芭莎》在内容生产上奉行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塑造了“时尚潮流导向”与“人文精神传递”的双轨内容矩阵,以“纸媒(时尚+人文)”满足用户的深度阅读需求,以“公益(慈善+美育)”满足社会价值需求,形成了“内容-用户-品牌-社会”的良性循环<sup>[8]</sup>。2019年,《时尚芭莎》设立“她的力量时代追梦人”系列报道,以“女性议题”为核心,聚焦来自科学、艺术、体育、商业等领域杰出的70位中国女性代表,通过文本讲述赋予读者自信、勇敢、独立的精神力量,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以他人,见自我”的生命感悟<sup>[9]</sup>。2013年,《时尚芭莎》联合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发起“芭莎课后一小时”公益项目,旨在通过改造乡村学校美育空间,提升乡村儿童的审美素养与创造力。截至2025年,该项目已在全国21个省市建成了500余间美育教室,累计受益师生逾29万人,成功将时尚与公益完美联接,将向善向美的生活理念传递给广大读者。

#### 3.2. 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时尚消费新生态

面对用户阅读场景的碎片化迁移,《时尚芭莎》构建了“App+小程序+社交媒体”的多维传播体系和“全渠道+智能电商+消费闭环”的商业网络,实现“内容-互动-电商”的数字化延伸,有效提升了用户粘性。在新媒体传播矩阵上涵盖数字网络媒体如芭莎in官方App、电子刊、芭莎中文网、视频BazaarV,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多平台账号,通过打通内容分享的立体化渠道,实现了多媒体融合与矩阵搭建;在构建全方位销售网络上,《时尚芭莎》融合线上线下双渠道,为用户打造了更便捷的时尚消费体验,线下借助书店与报刊亭触达读者,线上布局智能电商销售网络,如通过微店渠道在芭莎微信公众号设置入口,读者可轻松订阅纸质期刊;且微店还拓展了文创产品销售渠道,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现“即看即买”操作,达成“内容-种草-交易”的无缝衔接。通过一系列多元传播与销售网络的整合举措,《时尚芭莎》将期刊阅读与购物体验紧密相连,形成从碎片化触达到消费闭环的传播模式,在满足读者时尚资讯获取与购物需求的同时,拓宽自身商业版图,为时尚媒体的商业运营提供范例。

#### 3.3. “虚拟人IP+跨界合作”,拓宽产业边界及品牌形象

《时尚芭莎》通过多维度创新融合举措,打破了产业边界,在科技、文化、公益等多领域协

同发展，成功塑造出具有深度内涵与广泛影响力时尚品牌形象。在虚拟 IP 打造与运营方面，《时尚芭莎》利用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技术精心塑造虚拟数字人 IP 形象“芭鲨女孩”，赋予其独特的形象与性格，线下于多个城市热门商场开展联动巡展，如宁波万象城的雕塑与封面展、杭州来福士的主题“公寓”等，实现 IP 形象实体化落地。2022 年，《时尚芭莎》与虚拟人@IamReddi 主理的元宇宙数字饰品潮牌 Otamakee 共同推出“Shark the Meta”虚拟数字耳饰系列，将鲨鱼、机械、海洋等元素与“芭鲨女孩”IP 深度融合，发行的 6 款数字藏品刊登在 MiniBAZAAR 七月刊饰品栏目，创造出元宇宙潮流饰品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 NFT 领域首次以“加密皮肤”理念发售数字商品，通过 AI 技术实现 IP 的动态进化。在跨界合作方面，联合演艺界首创“BAZAAR 明星慈善夜”，设立“芭莎公益慈善基金”，并开展多项公益项目，如“芭莎·课后一小时”美育项目及“致美计划”等，将时尚与慈善无缝衔接；2020 年与华为合作推出 AR 杂志展，通过华为 P40 系列手机打开“华为 AR 地图”应用，使用户可置身于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数字世界，实现了“时尚+科技”的场景延伸。

## 4. 《时尚芭莎》的转型冷思考

### 4.1. 粉圈规则下的销量狂欢

粉丝群体具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在粉圈文化中，粉丝往往对偶像有深厚的情感投射，愿意为支持他们而消费，并通过消费来展示和满足自己的归属感，从而形成一种基于粉丝和偶像关系的经营性创收行为性质的粉丝经济<sup>[10]</sup>。《时尚芭莎》曾利用“粉圈规则”和“粉丝心理”来拉高杂志销量，即利用粉丝需求通过限定购买方式以换取打投的资格提升销量。这一模式将粉丝对偶像的支持与消费行为直接挂钩，利用粉丝的“群体认同感”和“趋同心理”<sup>[11]</sup>。若不参与消费，便被视为“不够爱”，从而激发粉圈内部的攀比心理。在形成集体性购买偶像刊物这一风潮后，群体内部产生大规模的从众行为，开始跟风购买从而进一步拉高杂志销量。作为公共媒介，《时尚芭莎》本应承担引导健康消费的责任，但其“割韭菜”行为却传递了扭曲的价值观，过度强调“流量即销量”，将粉丝的自我价值与消费能力捆绑，加剧了社会比较心理，也进一步陷入“数据竞赛”而非“内容竞赛”的行业逻辑，久之，便会大大削弱媒体公信力，使公众对时尚刊物的信任度下降。

### 4.2. 技术赋能的表层化困境

现阶段《时尚芭莎》的技术应用未能充分发挥技术的价值和潜力，仍需聚焦技术赋能的深层瓶颈。在技术服务上，尽管其推出电子刊、APP 等数字产品，但互动功能缺乏有效引导，如电子刊互动提示缺失、交互流程不匹配，导致用户体验割裂；APP 改版后削弱社交属性，失去用户反馈渠道，技术支撑与编辑策划脱节，难以长效满足读者需求。在技术应用范围上，只是与数藏科技公司进行简单的合作，技术实践多集中于数字藏品开发、元宇宙概念拍摄等表层场景，区块链、增强现实（AR）等技术未能深度融入出版流程<sup>[12]</sup>。当下，《时尚芭莎》应当积极思考时尚期刊如何与新技术相结合，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优化交互设计，唯有突破技术赋能的表层化困境，方能推动出版融合向深度发展<sup>[13]</sup>。

## 5. 传统大众杂志、报刊的转型借鉴策略

### 5.1. 坚持用户导向与内容优化思维

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杂志、报刊面临巨大的转型与生存挑战。从受众变迁来看，读者向用户转变，其需求趋于个性化、多元化。在内容生产上，传统杂志、报刊需秉持以用户为本位理念，定位不同人群需求打造个性化“精品日志”，持续输出精品内容，满足用户多元需求，积累品牌优势，进一步提升读者忠诚度，实现从内容到经济效益的转化<sup>[14]</sup>。

### 5.2. 多元渠道融合与社交化拓展

传统报刊、杂志应着力构建全媒体营销格局，整合媒体资源打造立体矩阵，若条件允许可在 - 95 -

短视频、直播领域布局，培养主播、创作视频内容以拓展线上渠道。《时尚芭莎》通过多渠道分区域管辖，借助网络开放性高效传播，促进了纸刊与电刊协同发展。其它同类传统报刊、杂志可以利用社交平台升级传播机制，借助“时尚+明星”跨界组合方式吸引粉丝群体，而粉丝在社交平台的分享、抢购与传播，可有效拉长数字期刊的销量<sup>[15]</sup>。从信息传播层面来看，传统报刊、杂志要发挥专业把关作用构建 PGC 生态，注重内容质量与分类专业性，同时加强 UGC 与 PGC 合作，利用网络社群汲取信息，依据媒介融合特性契合用户喜好，以实现传播内容全覆盖，逐步提升品牌影响力与传播力<sup>[16]</sup>。

### 5.3. 重塑产品价值，创新变现模式

传统报刊、杂志在数字化浪潮下需要突破编刊局限，拓展业务边界，探寻跨产业合作契机以催生新增长点，在转型中以知识付费替代部分发行收益，借助种草式传播促使读者重复购买实现多次盈利<sup>[17]</sup>。在盈利模式，可采取线下活动与线上门店双向互动拓展广告营收的渠道，尝试探索电商路径，借助内容与品牌优势实现跨界合作，开发文创产品、IP 营销延伸产业链，从而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盈利模式的多元创新，提升报刊、杂志本身的知名度与竞争力，为融合传播发展注入活力。

## 6. 结语

《时尚芭莎》在数字化进程中积极应变，通过精准的受众定位与内容创新，实现了与读者的深度互动，其转型策略涵盖多维度，如打造多元 IP、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拓展营销渠道、依托智能技术等值得传统报刊、杂志学习。未来，随着智能传播技术的持续发展，纸媒业应秉持创新精神，紧密结合时代需求与自身特色，深度挖掘受众需求，以优质内容为核心，借助数字化力量实现品牌重塑与价值再造，在变革中谋求可持续发展与新的辉煌，为读者与市场持续贡献出更优质的内容与产品<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孙传爱.文摘类杂志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以《青年文摘》实践探索为例[J].中国数字出版, 2024, 2(03): 82-87.
- [2] Jin Y .Chinese Fashion in China's Fashion Magazines (2005-2015)[J].Fashion Theory,2024,28(5 -6):579-612.
- [3]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J].今传媒, 2015, 23(08): 52.
- [4] 任佳雯.用户体验视角下明星电子刊热现象研究——基于《时尚芭莎》的个案研究[J].声屏世界,2021,(05):61-62.
- [5] 浦格菲,黄雨麒,冯文婷.奢侈品品牌数字藏品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中英文), 2025,27(03):54-64.
- [6] 万涛.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媒介传播的创新思考[J].视听,2025,(06):86-90.
- [7] 杨洋.从明星电子刊看期刊数字化的发展与嬗变[J].新媒体研究,2020,6(13):86-88.
- [8] 刘果,任佳雯.效忠从属·话语书写·文本消费——明星电子杂志《时尚芭莎》大众文化转型的三个维度[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21):187-193.
- [9] P. S C . “Shop it. Wear it. ‘Gram it.’ : a qual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women’ s glossy fashion magazines and their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with Instagram[J].Feminist Media Studies,2020,20(1):86-103.
- [10] Peng R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Online Fan Communities Based on Celebrity Micro-blog Super Topic[J].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2023, 5(6):01-06.
- [11] Lee Y ,Park S .Classifying and Characterizing Fandom Activities: A Focus on Superfans’ Posting and Commenting Behaviors in a Digital Fandom Community[J].Applied Sciences,2025,15(9):4723-4723.

- [12] Seferoğlu T ,Yıldız G § .Tracing fashion transformations: a comprehensive visual analysis of fashion magazine covers[J].*Semiotica*,2024,2024(261):167-208.
- [13] 贺芋婷.融媒体环境下时尚杂志数字化营销策略研究[J].传媒论坛,2023,6(01):58-60.
- [14] 陶玲.时尚杂志品牌活动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研究[J].传媒论坛,2025,(10):52-55.
- [15] 尹潇.SoLoMo 场景下时尚杂志的转型——基于时尚芭莎电子刊的个案研究[J].东南传播,2020,(07):95-98.
- [16] 刘洋.传统杂志如何活用新媒体[J].记者摇篮,2024,(05):144-146.
- [17] In H K ,Sil M Y ,Bin Y N .A Strategy for Converting from Printed to Digital Magazines : - Focusing on the Brand Posi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pular Magazines [J].*Journal of Digital Convergence*,2016,14(8):127-136.
- [18] Luo J . “At a Loss What to Do” to “Past Dark Willows and Flowers in Bloo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per Media in the New Media Era[J].*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2023,7(9):9-16.

# 数字媒体时代地域的“消失”与“回归”—— 从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谈起

邓梦圆<sup>1\*</sup>

(<sup>1</sup>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梅罗维茨在其代表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构建了媒介情境论，认为物质地点在电子媒介时代已经不再是影响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后提出的“球土化社会”等概念则对媒介情境论进行了完善。在数字媒介技术迅速革新的今天，从梅罗维茨的理论出发对当下媒介环境进行分析，会发现社会公共场景实现了更普遍的融合，在许多方面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仍呈现分离状态。但数字媒体时代还出现了新的传播特征：位置参数重新得到强调，身体在场的意义受到更多关注。尽管数字媒介对地域的超越更为显著，但是物质地点的重要性并未持续下降，反而在某些方面重新得到关注与强调，场景的地域语境与媒介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一致性。

**关键词：**数字媒体；消失的地域；场景；位置；身体

## The "Disappearance" and "Return" of Place in the Digital Media Era — Starting from Meyrowitz's No Sense of Place

Deng Mengyua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masterpiece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Meyrowitz constructed the Medium Theory, arguing that physical location is no longer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social behaviour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concepts of "glocalization" put forward since then have improved the media context theory. In today's era of rapid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ie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media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yrowitz's theory reveals that social public scenarios have achieved more widespread integration, while in many aspects, social locations and physical locations still present a state of separation. However, the digital media era has also seen the emergence of new communication features: the parameters of location have been re-emphasis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ysical presence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Despite the more pronounced transcendence of place by digital media,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location has not continued to decline, but has instead been re-emphasised and re-attended to in some ways, and the geographical and media contexts of scenes have become somewhat congruent.

**Keywords:** digital media; No Sense of Place; scenarios; location; body

## 1. 引言

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理论思想集中表述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他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在于其促使角色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进而引发社会行为的变化。梅罗维茨的整个分析逻辑建立在英尼斯（Harold Innis）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以及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的基础之上，基于此构建出“媒介-场景-行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发展出“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的分析逻辑。在梅罗维茨看来，电子媒介生成的“新场景”（即媒介场所）促使新行为产生，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信息场景的容纳或排斥<sup>[1]</sup>，而传统的物质地点则退居次要位置，成为“消失的地域”。

《消失的地域》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美国普及并对日常生活产生显著影响的背景下，其论述主要基于电视这一电子媒介。梅罗维茨认为，电视的社会意义的重点不在于播放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其作为一种共享的场地，观众通过切换频道即可共享不同地点的社会事件，从而“连接”不同地点，实现场地共享<sup>[2]</sup>。他同时也意识到新一代电子媒介将对其理论提出新挑战，因此持续发展其媒介情景论。

上世纪末，梅罗维茨提出“球土化社会”（glocalization）概念，将“全球化”（global）与“本土化”（local）相结合，认为全球与本土开始融合在一起，人们不再只是在经历简单的同质化变化，而是既在融合又在分化。后来，梅罗维茨进一步提出“反思的自我”和“普遍化他域”理论。“反思的自我”指电子媒介使得个体有更多机会和能力，通过跨文化信息流通去探索和反思自己的身份；“普遍化他域”则指电子媒介极大拓展了人们的感知领域，使得个体虽身处本地，其判断与决策却主要基于各种媒介共同构建的外部观点，而非纯粹的本地经验<sup>[3]</sup>。这实质上是电视所营造场景的“升级版”，地点日益成为“经历的背景”，人们仿佛生活在由互联网营造的普遍的他域之中<sup>[4]</sup>，延续了《消失的地域》的核心观点。尽管电子媒介呈现出普遍的他域，但个人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却愈发依赖全球与地方的交汇互通，两者相互包含、不可分割。“地方”的地位由此获得重新承认，“空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回归。梅罗维茨通过这一修正，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其媒介情境论的空间叙事<sup>[5]</sup>。

## 2. 数字媒体时代地域的“消失”

梅罗维茨的理论在数字媒体时代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当前，智能手机无疑是具代表性的电子媒介，其搭载的各类APP构成了用户日常接触的多元化场景，传播样态亦呈现出更精细的细分类型。分析这些传播样态与社会场景及“地点”的关系，依然可以窥见电视时代延续下来的部分特征。

### 2.1. 社会公共场景更普遍的融合

梅罗维茨引入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场景”概念并予以拓展。戈夫曼以实际的物质地点定义场景，梅罗维茨则转向信息流动的模式，将“场景”定义为超越现实地域的“信息系统”。物质地点创造的是一种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传统媒介创造的是中介交往的信息系统，而电子媒介则消除了现场交往与中介交往的差异，催生出全新的社会场景<sup>[4]</sup>。这些新场景普遍具有公共性，电视提供的信息场景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公共场景，不同类别的群体（如不同年龄、阶层等）能够同时接收相同或类似内容，被纳入统一的信息场域。这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群体间的信息隔离，实现了大规模的信息共享。相比印刷媒介时代相互隔离的信息系统，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模糊了其边界，信息场景超越了物理场景的局限，使得过去分属于不同群体的社会公共场景走向融合<sup>[2-2]</sup>。

电视时代初步实现了群体信息的共享与不同群体公共信息场景的融合，而数字媒介则推动这种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一方面，数字媒体时代的跨圈层事件显著增多。当代社会圈层文化在网络媒介中日益凸显，与此同时，跨圈层传播也成为重要的社会信息流通特征<sup>[6]</sup>。例如，近年来有关进博会的话题吸引了多元的意见领袖参与传播，带动了政府人员、企业人员以及个人用户等不同群体人员参与讨论<sup>[7]</sup>，形成一种临时性的融合场景。再如前些年“土味视频”从快手向微博等

平台的扩散过程，即是典型的从圈内到圈外的跨圈层传播案例<sup>[8]</sup>，两个平台用户群体差异显著，却通过内容创作与传播产生共鸣。另一方面，所谓“信息茧房”呈现着动态解构趋势。从受众角度看，个体的信息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存在主动寻求多元信息的“破茧”动力，信息获取量与途径均在拓展<sup>[9]</sup>。从技术角度看，智能分发算法虽偏好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但其中也包含相互矛盾的信息，同时，平台为扩大用户基数和市场，也倾向于挖掘并推送用户潜在的兴趣点<sup>[9]</sup>，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圈层信息流通预留了通道<sup>[10]</sup>。此外，数字媒介时代的信息流速发生质变。重大事件的扩散从传统媒介的数天甚至数周，压缩至数字时代的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社会热点高频更迭。由此可见，无论从社会群体覆盖的广度，还是信息流动的速度来看，数字时代的社会信息整合实现了量级上的跃升，社会信息实现更广泛的共享，不同群体的公共信息场景基于更加开放的信息系统实现更为普遍的融合。

## 2.2. 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分离

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地点是界定社会信息系统的关键，人们需通过特定物理入口（即固定的门）进入特定场景，而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梅罗维茨指出，社会交往性质的核心决定性因素不再是物质地点，而是信息流动模式，电子媒介重构了原先由物质地点界定的场景框架<sup>[2-3]</sup>，削弱了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例如，电话挑战了原先距离设置出的限制，使人们从一个位置连接到另一个位置变得容易起来，电子媒介打破了社会地点与固定物质地点之间的联系，社会场景不再仅依赖于物质地点存在，两者呈现出一定的分离状态<sup>[2]</sup>。

如果说电子媒介（如电话、电视）兴起时信息环境与物理环境“隔离的消弭”还只是一个起点，那么如今，信息环境已经拥有了远超物理环境覆盖力、影响力潜质，这意味着“位置”要素在信息环境与物理环境中的关系从博弈走向融合，它们各自构成日常生活中的两重独立时空——“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sup>[11]</sup>。在此背景下，社会场景对传统功能型物质地点（如银行、商店、办公室等）的依赖显著弱化，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状态进一步深化。例如，直播这一传播样态正是一种典型表现：观众实时接收来自远端直播间的视听信息，并通过评论等方式获得主播的实时反馈，这种实时性加深了观众的直观感受，交互的即时性远超电视，在更深维度上消解了物理距离。除此之外，电子转账、移动支付的普及，使人不再需要前往银行、餐厅、商店等固定地点进行交易；移动通讯使人能够在信号覆盖的任意地点打电话、发信息、传送文件，不再需要前往设有电话或传真机的地点去实现信息交换；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的即时信息推送，也使人不必再局限在家中等待固定时间去接收电视播放的信息。因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变得空前显著。

## 3. 数字媒体时代地域的“回归”

梅罗维茨关于空间地域的论述经历了从“消失的地域”中地域的“消失”到“球土化社会”中地方的“回归”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完善的动态过程，这表明对地域意义的理解需避免绝对化，而应进行多维度考察。当前，随着数字媒介普及，媒介传播从无差别的大众传播转向分众化传播，算法下的内容分发和受众的自主选择使得社会信息系统在构建中出现了新的现象<sup>[12]</sup>。

### 3.1. 位置参数的重新强调

在电视、固定电话占据主流的电子媒介时代，梅罗维茨用信息系统取代物质地点来定义场景，将媒介作为中介纳入其中，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域概念的模糊。然而，数字媒介（尤其是移动设备）则与人的身体共处统一位置空间，并随身体移动而移动。这使得社会信息的接收与传递，在相当程度上复现了口语传播时代的某些特征：信息内容常与用户所处的即时物质地点高度相关，而不再如早期电子媒介那样导致信息所代表的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关系的显著弱化<sup>[12]</sup>。

位置媒体（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的兴起是地域语境与媒介语境重新匹配的集中体现。如今的位置媒体，一般是指以数字地图为基础，整合定位、导航、支付、社交、游戏、娱乐等多重功能的位置服务网络<sup>[13]</sup>。这种媒介形式将用户位置信息深度绑定于传播交流过程中，能够根据移动设备的实时位置直接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从而引发传受双方的互动<sup>[14]</sup>。例如，地图导航类APP会依据用户实时位置推送路况数据；大众点评等本地生活类APP则基于用户物理坐

标生成周边消费场所的精准推送；甚至像今日头条等信息分发平台也会利用用户的位置信息推送地方资讯。正如雷尔夫（Edward Relph）所言，数字媒体如果不能增强地方体验，就不太可能被广泛采用<sup>[15]</sup>。位置属性在移动媒介的各类应用中显然已必不可少，成为媒介实现其服务功能的基础要素。

如果说位置媒体的广泛应用是物质地点向媒介信息系统的一种温和渗透，那么IP属地信息的强制公开则以更显著的方式重新凸显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新浪微博始，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相继上线显示IP属地信息的强制性功能，使用户的网络虚拟位置与个体肉身位置深度绑定。IP属地的可见性，通过平台定位功能将身体位置外化为网络标识，促使曾被互联网冲刷的“地方感”重新回归，个体的数字交往在位置可见状态下产生了一种基于地方的新连接关系，位置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标识和所指意义<sup>[16]</sup>。

### 3.2. 身体在场的意义回归

对地域空间的讨论必然涉及其背后的一个关键要素——身体。身体是社会个体的生理基础，是自我意识的源头，空间意义的生成往往根植于身体的行动体系与实践模式。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观点深刻指出，身体的空间性是一切知觉活动的基础，知觉作为身体与世界相连的界面，使得空间唯有在与身体发生关联时才得以存在并获得意义<sup>[14-2]</sup>。

纵观人类的传播变迁史，媒介技术的演进本质上是传播边界持续扩张与具身性限制逐步消解的双重进程。在口语传播阶段，人类信息交互严格受限于身体可及的空间与时间，而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中介使传受双方得以脱离身体与物质空间的束缚进行跨时空交流。梅罗维茨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都改变了信息围绕身体所处地点进行传递的传播模式<sup>[2-5]</sup>，身体在场不再是信息传递的必要条件。如果说麦克卢汉的感官平衡理论强调了人的身体感官，那么梅罗维茨对此理论的疏离则凸显了其媒介情景论中身体的缺位。然而，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正重新聚焦身体维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梅罗维茨理论中的“离身性”（disembodiment）盲区。在短视频等媒介实践中，身体既是表达工具、互动载体，也是意义生成场域。当短视频观看者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基于身体的实践行为参与特定情景讨论时，他们互为意义生产和分享的“合作者”，而这种合作与共享正是由每个参与实践的能动身体所共同创造的<sup>[17][18]</sup>。

新一代传播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呈现着双重面向。一方面，技术越来越深地嵌入身体，如媒体平台日益重视用户在媒介使用中的多感官交互体验。另一方面，技术通过模拟或代偿部分感官，实现虚拟身体的远程在场<sup>[19]</sup>。例如，元宇宙作为一种“颠覆性媒介”<sup>[20]</sup>，旨在构建一个可以借助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开展所有活动的三维虚拟共享世界<sup>[21]</sup>。而元宇宙模糊真实与虚拟界限的特性，超越了对在线、虚拟或数字空间的现有讨论<sup>[22]</sup>，也正深刻重塑着身体、地方与技术的关系。当然，这种虚拟在场本质上是心理层面的、想象性的和感受性的，与现实世界中真实身体的具身在场感仍存在着根本性鸿沟。

人类传播从整体上看是沿着身体在场、离场与再在场的逻辑发展演进的<sup>[23]</sup>。在个体化时代，怀疑、焦虑、断裂与冲突凸显的背景下，身体作为维持个体日常世界意义系统与自我身份连贯性的基石，其功能日益彰显<sup>[14]</sup>。因此，当个体借助地理位置构建自我概念时，身体的在场变得不可或缺。身体的在场意味着深度的参与，是融入现实情境、感知生活镜像的基础。这呼应了雷尔夫关于位置与身份认同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点的世界，并在此中拥有和认识自身的位置<sup>[24]</sup>。媒介实践从“媒介在场”向“具身性在场”的转向，实质上正映射了从虚拟生存回归现实实践、由赛博空间复归物质性地方感的内在诉求。

## 4. 结语

数字媒体时代无疑延续了梅罗维茨关于地域“消失”的核心洞见，然而，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发展和普及，并没有使物质地点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反而在位置参数、身体在场等方面重新得到关注与强调。移动互联网作为媒介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其与个体身体位置的紧密耦合，这促使电子媒介时代（以电视为代表）彼此分离的“媒介语境”与“地域语境”重新整合，媒介信息与物质地点再次密切关联起来。如今的媒介平台如果不以现实的物质地点为基础要素，也就难以向用户精准推送契合其实际位置与个体需求的内容。由此，物质地点的意义在数字媒体时代

重新显现出来：它不再是印刷媒介场景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物理容器，也不完全是电视时代被媒介逻辑所消解的对象，而是已然演变为媒介语境建构的基础性参数与意义生成锚点<sup>[12]</sup>。在这个意义上，“地域”在数字媒介时代实现了其辩证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麻小影. 互联网时代地域的“存在”与“消失”——从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出发[J]. 新媒体研究, 2018, 4(14):114-115+124.
- [2]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M]. 肖志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3] Meyrowitz Joshua. The rise of glocality[J]. A sense of plac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2005:21-30.
- [4] 陈长松, 傅鹏. 地点, 消失的地域？——对梅罗维茨“场景论”中“地点”的考察[J]. 南方传媒研究, 2023(1):84-90.
- [5] 陈长松, 蔡月亮. 技术“遮蔽”的空间：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初探[J]. 国际新闻界, 2021, 43(7):25-42.
- [6] 马佳琪. 粉丝群体网络行为的跨圈层传播现象探析[D]. 海南师范大学, 2021.
- [7] 汤景泰, 陈秋怡, 高敬文. 传播网络与跨圈层传播：中国主场外交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J]. 新闻大学, 2020(8):56-70+128.
- [8] 程鹏. “土味视频”跨圈层传播中的他者化建构[D]. 苏州大学, 2021.
- [9] 赵庆来. “信息茧房”：在形成与解构之间[J]. 青年记者, 2021(20):26-27.
- [10] 谢岱杉. 窄化与破圈：推荐系统对跨圈层传播的两种作用——基于哔哩哔哩的数据挖掘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22, 8(18):114-118.
- [11] 周勇, 何天平. “自主”的情境：直播与社会互动关系建构的当代再现——对梅罗维茨情境论的再审视[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12):6-18.
- [12] 梁琨. 超越的空间：梅洛维茨媒介场景理论的空间观[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0(2):209-210.
- [13] 张昊臣. 视差中的城市：位置媒介与场所营造——基于3组项目的案例分析[J]. 建筑学报, 2020(5):101-107.
- [14] 徐苒, 刘明洋. 论人与位置媒体的空间关系[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2):140-146.
- [15] Relph Edward. Digital disorientation and place[J]. Memory Studies, 2021, 14(3):572-577.
- [16] 韩佳良. 位置可见状态下的个体数字交往研究——以公开IP属地为例[J]. 青年记者, 2023(16):98-100.
- [17]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34.
- [18] 束秀芳, 王桂梅. 短视频：把沉默的本质引向表达——价值观念传播的身体现象学考察[J]. 青年记者, 2023(7):60-63.
- [19] 孙雅然. “身体在场”的回归：电子游戏中的身体实践探究[J]. 视听, 2022(4):48-51.
- [20] 汪怀君, 高天甜. 元宇宙时代人的深度媒介化的潜在风险与发展路径[J/OL].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8.
- [21] Dwivedi, Yogesh K, et al. Metaverse beyond the hyp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emergi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2, 66(102542):1-55.
- [22] Fraser Emma. The future of digital space: Gaming, virtual reality, and metaversal thinking[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24, 14(2):347-351.
- [23] 曾琼. 在场、离场与再在场：传播演进的身体逻辑与传播的身体递归[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11):154-161.
- [24]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ness[M]. London: Pion, 1976:40.